

102. 05. 31 海官41年班校友蒞校參訪





## 102. 06. 04 龍舟隊授旗暨精神講話



## 102. 06. 11 新四項訓練課程





**102. 06. 14 敦睦遠航訓練支隊返航歡迎會**



**102. 06. 20 正期102年班學資頒授典禮**





102. 06. 20 護旗交接暨指揮權轉移典禮



102. 06. 26 屆退人員歡送茶會





**102. 06. 27 校長陳少將率隊蒞樹德科大觀摩**



**102. 06. 28 士官102年班學資頒授暨授階典禮**





No. **3**  
Vol. **32**

Quarterly 2013.08

發行人／陳新發  
總編輯／劉玉珉  
主編／劉廣隆  
執行編輯／何愛珠  
攝影／劉廣隆 林文炫 趙尉翔  
發行單位／海軍軍官學校 [www.cna.edu.tw](http://www.cna.edu.tw)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02年08月發行第32卷第3期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36年6月  
定價／新台幣230元  
電話／(07) 5813141#781806 (07) 5855493  
社址／813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669號  
電郵／[navalofficer@mail.cna.edu.tw](mailto:navalofficer@mail.cna.edu.tw)  
印刷／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401廠南部印製所  
本校保有所有權利，刊物內容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刊同時刊載於 <http://www.mnd.gov.tw/>  
GPN/2003600006  
ISSN/1997-6879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及網路書店 04-22260330  
臺中市中山路6號 <http://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及網路書店 02-25180207  
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http://www.govbooks.com.tw/>



版權所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欲利用本刊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及書面授權。

- |  |               |                         |                    |                        |
|--|---------------|-------------------------|--------------------|------------------------|
| 80   | 74            | 54                      | 50                 | 36                     |
| Re-examining the US “Six Assurances”<br>to Taiwan 張競 陳玉珍 | 美國海軍憲法號軍艦 翟文中 | 東南亞區域整合過程中地緣因素影響之研究 何耀光 | 精益求精、落實聯興演習之作為 曹正綱 | 臺灣週邊海域的海底地形與海洋測量介紹 毛正氣 |





# 海軍軍官

08 老兵滄桑海上憶往

——八二三砲戰美樂艦被敵擊燬記 陳降任

18 美國海軍官校 (USNA)，創校逾一個半世紀以來的

沿革與發展 陳立中

30 念茲在茲——淺談初任官經歷 吳佳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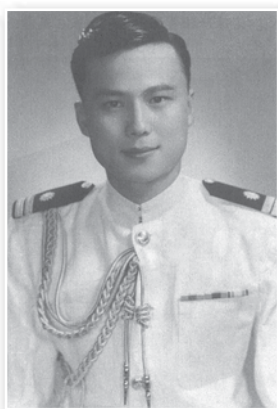
Contents

# 老兵滄桑海上憶往

## 八二三砲戰美樂艦被敵擊燬記

著者／陳降任

海軍官校39年班航海科  
歷任海軍淡水巡防處長、漢陽號驅逐艦長、驅逐艦戰隊長、攻擊支隊長  
曾兩度出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



作者陳降任上尉時的戎裝照。

### 海軍艦艇油漆學問世

民國39年流行英文「VIP」這個字，使我憶及當年在英國一個叫「SPIV」的字，愛開玩笑的會叫對方「SPIV」，當時坊間的英漢四角辭典查無此字，我一時興起，寫了一篇小品，題為「SPIV」，在台灣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副刊發表，「SPIV」是「VIP」的反義，我覺得能被中央日報副刊採用好高興，因此引起我寫作的興趣。

39年我在少尉階內，完成一本《海軍艦艇油漆學》，海軍總部將初稿送給海軍機械學校校長及海軍第一造船廠廠長審核，經通過後，由海總出版發行，該書對海軍艦艇保養著有成效，海總

頒發獎金九百元，相當我兩個月的薪俸，後因各單位迴響，次年又獲頒海風獎章一座。50年秋我任登陸第五四戰隊長時，海總要我撰寫一本《海軍LSMR5吋火箭砲之保養、維護、訓練及威力發揮之計畫草案》由海總發行，給各有關單位參考，此書是作者依據個人工作經驗與心得寫成，對海軍戰力似有貢獻。

### 美樂艦曾逃過一劫

閱讀多篇金門八二三砲戰往事，近日又有報載：八二三驚魂有老兵山居40年消息，使我想起海軍二四二號美樂軍艦，在金門料羅灣灘頭，慘遭中共岸砲擊燬的往事。

悠悠歲月流逝，迄今已是半個世紀，想起民國43年11月至46年6月，我曾在美樂當過兩年半的艦長，長年在台灣海峽乘風破浪執行外島運補任務。當時國共交戰，我也先後多次與彼岸海軍接觸。

43年11月1日，筆者蒙蔣中正總統單獨召見，派任海軍二四二號，美樂軍艦艦長，令人難忘的是44年4月1日黎明時刻，我率美樂在小金門灘頭下卸軍品，突然遭到中共岸砲轟擊，彈落四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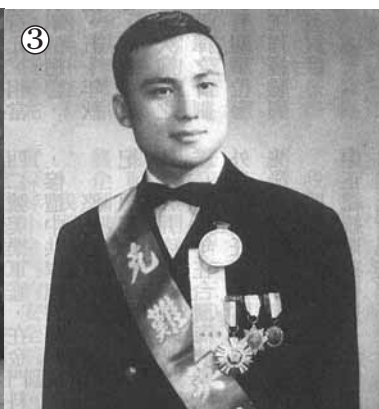
1. 作者陳降任曾任DD15漢陽號驅逐艦艦長。
2. 作者陳降任當選國軍第十九屆戰鬥英雄，接受藝人劉明佩花。
3. 作者陳降任與英國國會議員隨船考察北海航行安全，為英國WMN報紙刊出。
4. 2001年暑假，陳降任與夫人陳明律教授及女兒陳涵琳攝于倫敦街頭。
5. 作者陳降任舊地重遊，全家在英國倫敦塔樓留影。

幸好潮水正在上漲，即用全速退出灘頭，安全撤離，因而化險為夷，使美樂軍艦逃過一劫，因此我與美樂軍艦深具情感。不料3年後，美樂軍艦終於在47年9月8日下午兩點半鐘，在金門砲戰期間，仍被連續發射的中共岸砲擊中，燬於料羅灣新頭八號灘頭。

美樂是海軍一艘中型登陸艦，曾有光榮戰史，以掩護威海衛、劉公島駐軍撤退著名，37年2月參加上海、廈門、汕頭保衛戰及南日島登陸戰著有功績。

## 我被稱為金門之鰲

43年冬，中共岸砲向金門發動砲戰，從此小金門便陷入中共岸砲的射程內，航道全被封鎖，致該島的正常補給被迫停歇，原有的灘頭無法使用，新的灘頭又尚未找到，美樂軍艦奉令冒險擔當開闢新航線的任務，這項艱巨的使命，第一次是在35哩的風速下，小心謹慎的通過一條僅可容身的狹窄航道，最窄處只有艦身的一倍，即使沒有中共岸砲威脅，在航行上也極危險，為了避免被敵方發現，只能利用黑夜航行，沒有燈光，缺



1. 作者陳降任在英國倫敦大飯店，坐在英王曾經坐過的專用椅子上留影。
2. 1954年12月，陳降任艦長（右三）與金防部副參謀長唐靜海代將（中）攝于金門料羅灣美樂軍艦旁。
3. 作者陳降任1956年1月1日，當選第六屆克難英雄。
4. 陳降任與夫人陳明律教授。

乏導航標誌，又無可供參考的航行資料，一不小心，艦身擱淺，等到天明必然為對方岸砲擊毀，一切作業都在摸索中進行，風大流急暗礁林立，有賴全體官兵用命，仔細合作終於完成運補任務。贏得海軍稱道，並為小金門的守軍官兵視為恩人，筆者，陳降任被稱為「金門之鰲」，在海陸協同作戰上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駐軍師長張文博將軍見到我時，第一句話便說：「你們實在太好了，我們從未見到有像你們這樣熱心的人，有了你們，我們的腰都撐直了，等於是我們的恩人。」先後九次補給糧彈達一千四百餘噸，使島上守軍不虞彈械糧秣匱缺。最後一次是44年1月19日的深夜，當時風速高達50哩以上，我們謹慎地完成了任務，深獲友軍讚揚，甚至該島的炊事

兵也都含淚致謝，我與美樂駐蹕金門期間，深獲金防部司令官劉玉章將軍的欣賞與嘉許。

44年3月30日深夜00:30~01:30時，中共快艇兩艘突襲金門料羅灣，被我艦發現，當即備戰啟航單艦奮勇將其擊退，使其偷襲企圖無從得逞。

我與美樂在金門駐防期間，為確實探尋小金門的安全航道，曾在八級風以上及敵前砲火控制下，自動深入險惡地區探測小金門登陸灘頭，繪製詳圖，並繕具小金門運補報告書，對航行登陸之安全，發揮很大的功效，除蒙敘獎外，海軍梁序昭總司令特此通令全軍官員，本此克難精神爭取榮譽。當時我被海軍當局譽為「沉默英勇的戰鬥者」，被友軍稱我為「金門之鰲」，終於在



44年底被膺選為第六屆國軍克難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揚。44年及46年2年的年終考績特優，為全軍上尉之冠，44年度比序第1，46年度比序為1比820。遂於46年六月被派到美國受訓，並接收124韓江號巡邏艦，回國整訓後即參加戰鬥行列，納編北巡支隊，於47年6月10日夜晚9點46分參加閩海平嶼戰役，激戰19分鐘肇致敵艇兩沉兩傷。6月22日凌晨參加四姆嶼戰役擊沉敵艦兩艘，可算是戰績輝煌。

赴美前我將美樂軍艦移交給陸軍大學出身的何忠華艦長，他與我同是留英海軍重慶艦人。

47年9月，我因戰功奉令於93軍人節，代表海軍謁謁總統，並向蔣公致敬。旋因八二三金門砲戰，韓江艦馳往支援，在敵方岸砲熾烈轟擊下出生入死，執行閃電、轟雷、鴻運等作戰計畫之護航任務，在槍林彈雨中圓滿完成使命。

國防部青年日報社《奮鬥月刊》，89年10月1日出版五六四期，內有一篇子魚寫的「金門之鰲」一陳降任戰功彪炳，誰能吞山嚙海，指揮若定，陳降任當之無愧。

## 美樂被中共岸砲擊燬

47年金門823砲戰爆發，美樂軍艦在艦長何忠華率領下，奉令執行閃電計畫，滿載彈藥、豆油及油麻袋等共計1320噸於9月8日02:30時離馬公駛往金門，11:50時抵達料羅灣，當即搶登新頭八號灘頭下卸軍品，不料12:33時，中共圍頭、蓮河及大嶝一帶岸砲集中火力，朝向新頭灘頭上的美樂軍艦瘋狂轟擊，肇致下卸部隊負傷數人，

餘眾紛紛疏散，下卸作業頓告停歇。13:37時敵方岸砲射擊更加猛烈，何忠華艦長即向南巡支隊報告，請示行動，奉示為「繼續下卸」，何忠華為貫徹命令，下令官兵嚴守崗位，靜待下卸部隊前來繼續下卸。此刻，敵砲彈紛紛落在艦艏左右兩舷附近，破片橫飛，何忠華隨被彈片擊中胸部輕傷，但深感任務重大，仍囑官兵沉著鎮定堅守崗位，約13:38時，敵砲射擊仍然猛烈，灘頭下卸部隊未見動靜，何忠華請示南巡支隊長轉知下卸部隊盡速來艦下卸，然因敵砲彈落該艦周圍數以千計，致下卸部隊實難到達灘頭。約14:13時，美樂右舢帆纜倉庫中彈，經派第一修理班前往檢查，發現水線以上被擊，約百徑兩呎大洞，人員無傷亡。14:18時美樂終於奉令退灘，隨即抽放壓艙水，左右擺動全速退灘之際，於14:21時該艦艦尾機艙及坦克艙連續中彈十餘發，第三號20公分砲的彈裝手及輪機長均負輕傷，機艙與坦克艙同時起火，火焰熾烈漫延，雖經全力搶救，然因艦尾裝載之油麻袋、豆油及該艦原有的汽油兩桶全部燃起，火勢猛烈無法撲滅，稍時連裝載之砲彈及送藥包繼之開始爆炸。14:26時何忠華請示南巡支隊長可否棄艦，然因電機停頓對外通訊受阻無法連繫，何忠華只好毅然下達棄船命令，官兵陸續跳水登陸。14:30時官兵相繼跳海，敵砲對美樂及灘頭砲轟仍然熾烈，受傷官兵約三十餘人，何忠華在艦上前後巡視一周確定已無人員留艦，他才最後一人跳游泳往灘頭。何忠華離艦約兩分鐘，大火沖天，裝載與該艦所配之砲彈、火箭猛烈爆發，14:32時轟然一聲震驚全金門，艦體自駕駛台爆炸分為兩段，煙硝直沖

雲霄，在空中形成一驚人的罩狀雲，猶如一原子罩。美樂爆炸後，敵砲暫停射擊，約於15:00何忠華偕金門巡防處李監察官，隨同救護車即赴灘頭巡視，並搶救受傷官兵送醫，清查人數失蹤五人。9月9日15:00時在最低潮時，何忠華帶著五名官兵，游泳登艦檢視損耗，並尋找重要文件，美樂除艦艙及傾斜的駕駛台露出水面外，餘均被水淹沒，電訊室全被焚毀，彈藥庫內的彈藥均已爆炸，艦艙內部更被炸得支離破碎，全艦無一物倖存。

823砲戰轉眼50周年，馬英九總統特於97年8月24日前往金門發表深具意義的重要談話，「從殺戮戰場到和平廣場」，強調「戰爭沒有贏家，只會造成遺憾，不能再讓兩岸人民有共同的遺憾。」呼籲兩岸和解休兵。筆者以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不能重演過去國共內戰所造成的遺憾，以達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古有道德倫理。

## 奮勇搶救貨輪失火

一艘停泊在基隆港三號碼頭卸貨的巴拿馬籍貨輪「紅葉號」，在61年7月20日上午11:10時，起火燃燒，火勢猛烈，我奉令擔任現場救火總指揮，調派在港各艦救火隊官兵四百餘人，其時基隆港務局的港務長王庭篋曾向我建議，將其拖往港外施救，以免波及港區安全，為我斷然拒絕，經三小時的奮力搶救，最後終於將其撲滅未釀巨災，因維護港區安全著有功績，獲頒三星海風獎章一座。

## 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

63年6月奉調驅逐第十二戰隊長，兼攻擊支隊長，曾兩度出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統率兩國海軍一流戰艦數十艘，曾出任斯職者在海軍將領中鳳毛麟角屈指可數，誠為我畢生最大的榮幸。

畢生曾獲頒忠勤、干城等勳獎章24座，並膺選為第六屆國軍克難英雄，19屆戰鬥英雄及愛民模範。61年5月為海軍代表，參加全國各界代表團恭賀總統連任新職。62年10月31日代表海軍，參加中華民國恭賀蔣公八秩晉七華誕致敬團。

## 退伍後出任商輪船長

65年4月1日奉准提前退伍，應美商西方公司之邀，出任「WODECO VIII」石油探測輪中國籍船長與英籍船長及一德籍船長三人輪番操船，該船從艙面副水手長、機艙幫規至高級船副與老規（輪機長），一律聘僱歐美人士，船上成員連同各國探測專家與工程師，約有一百五十來人，型同一迷你聯合國，整天24小時作業，日夜不休。我可說是第一個華人，擔任這種世界上為數不多造價高昂的特殊船舶，管理西方屬員的船長。

況且，海軍出來轉業商船，未經船副階層的磨練，而直接擔任船長者我很幸運算是空前絕後惟一的人，即使曾任海軍艦隊司令者，也是從大副幹起，海軍中將多人也只能做到見習船長。當時我的月俸相等於內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一年所得加年度獎金的全部總和，內心深感榮幸。後轉任環球線船長至83年9月退休。

81年1月17日曾為英國國會議員及BBC記者等



一行隨船考察北海航行安全，對該輪表現甚為滿意，在當晚，英、法、德、荷等國各電視新聞及無線電廣播中播出，次日各大報章以整頁新聞與照片刊出，為中華民國揚名西歐。

## 英倫趣聞往事留痕

初到英國，發現英國人輕聲細語禮貌周到，公共場所免不了開口就是「Excuse me」、「Please」、「Thank You」這些常聞的詞語，但他們與人分別時，不說「Good Bye」，而講「Cheerio」，不可隨便說「Bye-bye」，記得一次我在蘇格蘭愛丁堡一位教授家作客，臨別時，我順口說「Bye-bye」，那教授指正我「Bye-bye」是對心愛的異性用語。二十年前我去英國舊地重遊，「再見」改為「Good by」了，再也聽不到「Cheerio」；也無人知道與人道別會用「Cheerio」，也許是受到強式美語的影響。

回想當年到英國皇家海軍受訓，政府為激勵士氣，期盼在國際間展現中華民國新海軍的新形象，在軍餉上比照英國海軍待遇發放，並享有優厚的福利。英國是海軍大國，三軍以海軍為首，待遇也優過陸空軍。二戰之後，英國百廢待興，物資匱乏，仰賴國外進口，民生方面仍採納戰時的配給制度，購買穿著需要購物券「Coupon」，食物要食物卡「Ration Card」，我們也逐月領有，好方便外出購物或上館子用餐。那時候英國老百姓每人每月只有一只雞蛋，海軍軍人則是每周一只，海軍用白脫油塗麵包，鮮雞蛋，罐頭牛奶，平民吃人造瑪琪琳，平日吃雞蛋粉和脫脂奶粉。英國本土香煙稅金很重，售價昂貴，海軍享

有免稅優待，鐵盒二十五支裝的三五牌香煙馮五先令，但問津者不多，後來到了直布羅陀，只要一半價，但煙絲倒很便宜，五百公克大聽的煙絲只有五先令，人們都是自己動手用煙紙做成自捲香煙，英文叫做「Tickler」，大家都在採用，真是價廉物美。

二戰之後，傳統的英國幣制，一英鎊兌二十先令，每先令合十二便士，鎊是紙幣，先令為銀幣，便士是銅幣，另有一種半克朗(Half Crown)的銀幣，合二·五先令，但從未見過一克朗的銀幣，當時一英鎊相等於四美元。餐館一頓便餐約五先令，軍人俱樂部用餐只要二先令足夠，但都要給食物券「Ration Card」。

英國海軍平時每年有三次長假「Long leave」；春假、暑假與年假(聖誕與新年)，每次兩周時間，發給我們一張通用火車免費票，每次總是三兩好友結伴出發，先去中繼站倫敦一遊。

記得中學英語課本中有一篇題目是(London is a greatest city of the World)(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的確今人嚮往。然後再去事先約好，熱愛中國海軍的英國家庭，接受免費住宿的享受。

至於娛樂方面，先談電影，多數電影院是連續放映，一張票可以泡上半天。那時候所謂二手煙這個名詞還未出現，所以影院裡可以吸煙。當時還沒有電視，電影院生意興隆，假日常常客滿，看電影必須排隊：出來幾個再放進幾個，票價分一個半先令、兩個半先令及三個半先令等三

種，購買門票也是一絕，票房會高喊「三個半兩位」，在排隊中前面如無人答應，後面想買的就有人上前購買。當時英國電影院內裝潢漂亮古色古香金碧輝煌，冬天開放暖氣，十分舒適。歐洲夏天並不炎熱都無冷氣裝置。看完一部長片，燈光放亮休息十分鐘，觀眾可上上廁所，或去休息大廳吸煙、喝咖啡、吃點心，同時舞台上升起一架很大的扇形多層鍵盤風琴，琴師手腳並用演奏戰時熱門的流行歌曲，銀幕上用幻燈片打出歌詞，一位盛裝的性感小姐手拿麥克風即席領唱，全場觀眾大聲合唱，群情高昂。某日，台下有幾位中國海軍學生在場，那領唱的歌星機靈地高聲唱出《中國男孩巧遇中國女孩》的流行歌曲，並走下台來在中國海軍學生的臉頰上獻上香吻，留下鮮紅大唇印，全場鼓掌、歡笑、口哨、尖叫、頓腳，一片歡騰，也使得這幾位中國海軍一時亂了手腳，趕緊衝往洗手間照著鏡子把紅唇印洗去的趣事。

其次，就是交際舞，英國各地舞廳林立，設有大小樂隊伴奏，但無舞女，都是舞客購票入場，票價約兩三個先令，女士票價是男士的一半，分下午與夜晚兩場，各三個小時。二戰期間英國青年男子都到海外打仗去了，國內變成女盛男衰，我們中國海軍到了英國，許多人會去學習交際舞，不需幾個小時，人人都可輕易學會上場應付了，進入舞廳可以挑選中意的小姐跳舞，只要走到小姐的面前彎身說「May I」，對方就會起身隨你走入舞池婆婆起舞，只要彼此高興聊得暢快，就可邀其坐在一桌成為固定舞伴，甚至交換通信地址交往朋友，並相約下次再來跳舞。

在英國跳舞途中是允許別人拍肩說聲(Excuse me)，就把你的對象換成他或她的舞伴了。也有些舞廳採取「女士邀請」「Lady Choice」，樂得男士坐著等候女士前來邀舞的韻事。

至於劇院票價較貴，一般為五先令，嚮往者較為不多。

英國的公共汽車都是紅色的雙層巴士，年輕人都往上層去坐，將底層留給年長或婦幼殘障者乘坐。票價一般為二至三便士。倫敦的地鐵(捷運)起價為六便士，遠程最高可達五先令。

英美海軍軍艦上一些專用名詞相同，十分特別，如左舷叫Port，右舷為Starboard，地板稱甲板叫Deck-不同層面和部位的甲板有不同稱謂，艦艏叫Forecastle，通常縮寫成FX，艦中叫Top deck，艦艙叫Quarter deck，官廳(官員飯廳)叫wardroom，房艙叫Cabin，廚房叫Galley，醫務室叫sick bay，廁所叫Heads。英國海軍女兵叫WRENS(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為皇家海軍婦女輔助服務隊的縮寫，因缺少母音不能拼讀，所以加上一個「E」字，她們專司軍需或文書職責。美國海軍女兵叫WAVES(Women Appointed for Voluntary Emergency Service)，就是美國海軍婦女預備隊的隊員。

1948年5月19日，重慶號巡洋艦在英國樸茨茅斯舉行了隆重的接艦典禮，5月26日啟程回國，6月7日駛離直布羅陀，6月8日進入地中海，當天風和日麗水平似鏡，重慶號停航兩小時，施放了深水炸彈作為演練，順便驅趕鯊魚，大家紛紛跳



水盡興暢泳」為一極難得的快事。

## 英國艦長船長位高俸厚受人敬重

昔日英國艦長、船長位高俸厚，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少年時一心嚮往海軍，1770年冬某日，報載海軍上校莫雷·薩克林出任「雷勝納勃」號艦長的消息，為納爾遜所悉，喜出望外，因薩克林是他的舅父，當時十二歲的納爾遜立即上艦隨舅父出海學習海軍。那時艦長任命能夠上報足見其地位在社會上受人器重。

英國是海權國家，到了18世紀後葉，進入納爾遜時代，大英帝國與法、西艦隊爭霸海權，全國朝野寄望海軍艦隊，致艦長地位備受重視與尊敬，並屢蒙喬治國王召見，當時艦長薪俸與屬地總督相同。

1846年一位英國人到上海，在外灘外白渡橋旁，黃浦路十五號創建一家「理查飯店」(Richards Hotel)，計有130個客房，在當時是上海第一家全歐式的觀光飯店，其設備與倫敦、紐約一流飯店相似，尤其是飯店裡裝設了中國第一座電話，寬大的大廳在高挑的天花板用彩色凹凸玻璃裝飾，顯得格外亮麗豪華，是歐美駐華人士上流社交場所，也是交際舞最佳的場所，耗資龐大，其創辦人就是曾任皇家海軍的理查艦長。後來轉手後，接辦者也是一位皇家海軍退伍的艦長。

20世紀初葉，張勳復辟，在香港請到兩位在港裝卸貨物的英國商船船長，同去澳門商談復辟事宜，足見船長地位崇高受人重視身價不凡。

## 我國艦長與船長

我的年代，中華民國海軍的軍艦，區分四級，三級艦編制為少校艦長，二級艦中校艦長，一級艦上校艦長，特級艦資深上校艦長，各級艦長的任命，依序上升，或高一級艦的副長升任次一級艦艦長。海軍官校畢業生並不是人人都當得上艦長，但身為海軍，自然期盼要當艦長為夙願。能當到驅逐艦特級艦艦長的就不多了。我們留英海軍重慶艦人與留美海軍八艦人，來到台灣的約有五百多人，但做過驅逐艦艦長的只有十四人。留在大陸的重慶艦人約有五百多人，他們現在參加上海歐美同學會留英海軍分會，現任會長是浙江大學出身的胡步洲，並兼任歐美同學會的理事。留美八艦人較重慶艦人少，他們參加上海歐美同學會、留美海軍分會，現任會長是交大的陳同慶。

我那時候艦長的任用，不論軍艦級別全都是總統蔣中正單獨個別召見，親自核定任命的，這乃是出任艦長的殊榮，因為威權時代，老蔣總統是不輕易見人的。

我當船長雖時代變遷，但我行走世界各地，船長地位依然受人尊敬，使我印象深刻的幾件事：某次船抵美國紐奧良靠泊碼頭後，我下船到碼頭工人辦公室借打電話，見到碼頭工人辦公室的經理站立起來，將座位讓給我坐，好慢慢講電話，他說：「You are old man」(你是船長啊!)這裡的old man不當老人家解，是指船長意。碼頭工人辦公室不是船務代理行，讓我免費撥打電話，不但驚吵到他人而且還佔了不少便宜，但經

理對我真是禮遇有加，那是他對我職位的一種尊敬，使人難忘。

其次，某日船抵埃及，代理行為我安排開羅一家頗為高級的牙醫診所看牙，見到埃及牙醫師對我畢恭畢敬，開口「Yes Captain」閉口「Yes Sir」，使我感到溫馨舒暢。後來我去星洲看牙，是一位十分俏麗留英的女牙醫，對我態度溫雅有禮，也是口口聲聲「Yes Captain」，令人聽得舒服透了，這兩位牙醫對我來說是從未有過的超級禮遇與尊敬。再是某日我到比利時請代理行為我安排一輛車子上街，來的是黑頭賓士轎車，由一位三十出頭一身鐵灰色畢挺的套裝，長得十分亮麗的小姐駕駛，先為我打開後座車門，等我上車後，返回駕駛座駛往市區，車程約半個小時，我聽到她說得一回流利英語，口氣溫柔尊敬，也是滿口的「Yes Captain」，「Yes sir」，歐洲人的英語一般不靈光，尤其是法國人，所以我能夠與這位美女駕駛用英語交談的確十分開心，當抵達市區後，她又下車為我打開車門讓我走下車來，其是一大享受，的確是香車美人，令人難忘的陶醉。船長每到一港，幾乎必有代理行的招待，記得某次船到泰國曼谷，代理行經理邀我與船上大副、老規（輪機長）、報務主任前往一家著名的海鮮餐廳享用美食，餐後欲邀我們去做三明治馬殺雞為我婉拒，泰國有名的人妖秀早已看過，我想去看Floor show（夜總會舞台歌舞秀），結果載我們去一家高級私人俱樂部，聽歌星唱歌和舞女跳舞，並有名牌美酒與水果點心招待，途中那經理起身邀我一起去化裝室，方便後，洗手間裡有侍者手捧香噴噴的毛巾侍候，

原來那經理是專門為代我付給小費而去洗手間的，從此可以看出他對船長的敬意，也使我感到窩心。

## 海軍英文與商船英文

海軍軍官的英文程度普遍很好，主要是海軍官校術科全是採用美國海軍官校的課本，抗戰前馬尾海校的航海、輪機教官是聘請英國海軍擔任的。像前參謀總長劉和謙上將（官校36年班畢業）與三八年班的前海軍總司令葉昌桐上將，都是一流的英文高手，我留英海軍潛艇班同學都有很好的英文，江蘇教育學院畢業的王季文，曾為皇冠雜誌連續撰文10年，出版過《英國、美國、法國床邊故事》3本及《宋詞英譯》問世，為世界各大圖書館典藏，頗受好評。近時又為《騰王閣》譯成英文。今年夏天，他為「中華民國筆會」以名詩人夏菁的一篇《灰鯨落海》詩篇，譯成英文，在《當代台灣文學英譯》發表，受人喜愛。另有一位出身上海聖約翰大學唐瑩南，為人謙虛，處事低調，英文造詣更是高段，約於45年前，某次，美國太平洋海軍總司令來台訪問，在三軍大學發表演講，老蔣總統在座聽講，就是由他擔任同步口譯，很得好評。很抱歉，談到敵人的英文，實在不怎麼樣，有時候我一開口，就被內人譏笑，最了解我的就是以上這兩位好友，因為我不時向他倆請教。

商船船員英文普遍不錯，駕船口令用英文，航泊記事簿（log book）一定是用英文寫，當一個船長英文實在十分重要，因為船上一天24小時無論人、事、物都要保持記載，尤其是對人、對



貨、對船的安全，一旦發生差錯，都要以英文書寫海事報告，在抵達港送請公證行辦理簽證，船公司憑以向保險公司索賠。船上有本船長夜令簿(Night Order)，我始終逐日以英文寫載，以備不時之需，我寫的海事報告(Sea Protest)也讓我船副影印留著，等當上船長可以拿來參考，像船員在船生病、工作受傷、打架、碼頭工人在船工作受傷、人員落海或死亡，機器故障，惡劣天候貨物損傷、船機受損、掉錨、擱淺、碰撞，裝貨後遇到退潮使船底貼到海底等，都要立即寫出，作為公司保險理賠依據。我自認我所寫的英文海事報告內容八九不離十，當我退休時，原擬將其出版，不但華人船長可以選用，即使外國船長也可借鏡，因為我在世界各國都找不到一本相同範例的書本，在台灣數十年前基隆港務局的沈繩一船長曾寫過一本，因時代變遷，貨櫃船問世，他寫的那本也就無效了。我退休時，考慮到出版是一個麻煩問題，結果就此擱下，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可惜，畢竟時間在跑，今天的狀況與前不一樣了，我的時代也已落伍了。我在船上，凡跟我同船的大副都受過中華民國船長公會舉辦的船長訓練班訓練，他們都希望我去教航海英語，好讓學員學到真正航海英文，他們的師資是請到留學美國多年的女性碩士甚至博士，當然，英文刮刮叫，文法也是一流，但她們不懂船長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英文和航海術語。事實上，前船長公會的秘書長易鵬，他曾邀我去教航海英文，但是我之所以退伍去跑商船，為的就是要去賺錢，所以也就不了了之。沒想到我這庸庸的英文，卻能遊走商船綽綽有餘。

## 英國的炸魚與薯條

我在英國海軍學習待了不到3年，30年前我提前退伍下來，我做商船船長長達十多年，其間到倫敦去過無數次，在食物上，最使我嚮往的就是去嚐嚐價廉物美的炸魚與薯條，它是英國最平民化的餐點，不是昂貴的大餐，但只有在「Fish & Chops」的專賣店，用鰻魚與薯條油炸的才夠道地也最便宜，用油紙與舊報紙打包外帶，熱呼呼的非常美味。2001年暑假，我與家人去英國旅遊11天，有天在一家大飯店晚餐，主菜竟然是Fish & Chops，原先讓我一喜，但做得完全不夠道地大失所望，最後在回國當天，上午在倫敦自由活動，當我們走回旅館路上，在街道旁見到一家Fish & Chops專賣店，我們以四英鎊(約台幣180元)買來兩大片炸魚和薯條，回到旅館，熱呼呼地大快朵頤，真是好吃極了，稱得上是不虛此行。

總之，大飯店或Pub(酒館)都不如路邊Fish & Chops攤子供應的好。過去我跑船時在澳洲雪梨，也吃過Fish & Chops專賣店的炸魚與薯條，但風味不及英國的正宗。

台北過去有一家英國人開的菜館，位於林森北路，館名叫犁？，二十多年前曾去用餐，我點了炸魚與薯條 一位四十來歲十分標致的英國老板娘一直盯著我們並一再詢問口味如何？說實在的這是我在台灣吃到惟一可口的Fish & Chops，可惜後來這館子關掉了，雖然陸陸續續台北開了幾家類似的店，我們都去吃過，但再也吃不到原味了。 🍷

# 美國海軍官校(USNA)， 創校逾一個半世紀以來的 沿革與發展

著者／陳文樹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現職於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工程司

## 壹、美國海軍官校是培育海軍軍官 的主要搖籃

位於馬里蘭州、安那波里斯市的「美國海軍官校」(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USNA)，係由聯邦政府設立的四年制海軍軍官學校，與旨在培育陸軍軍官的「西點軍校」(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鄰近紐約市)、「維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位於維吉尼亞州的萊辛頓市)，以及「美國空軍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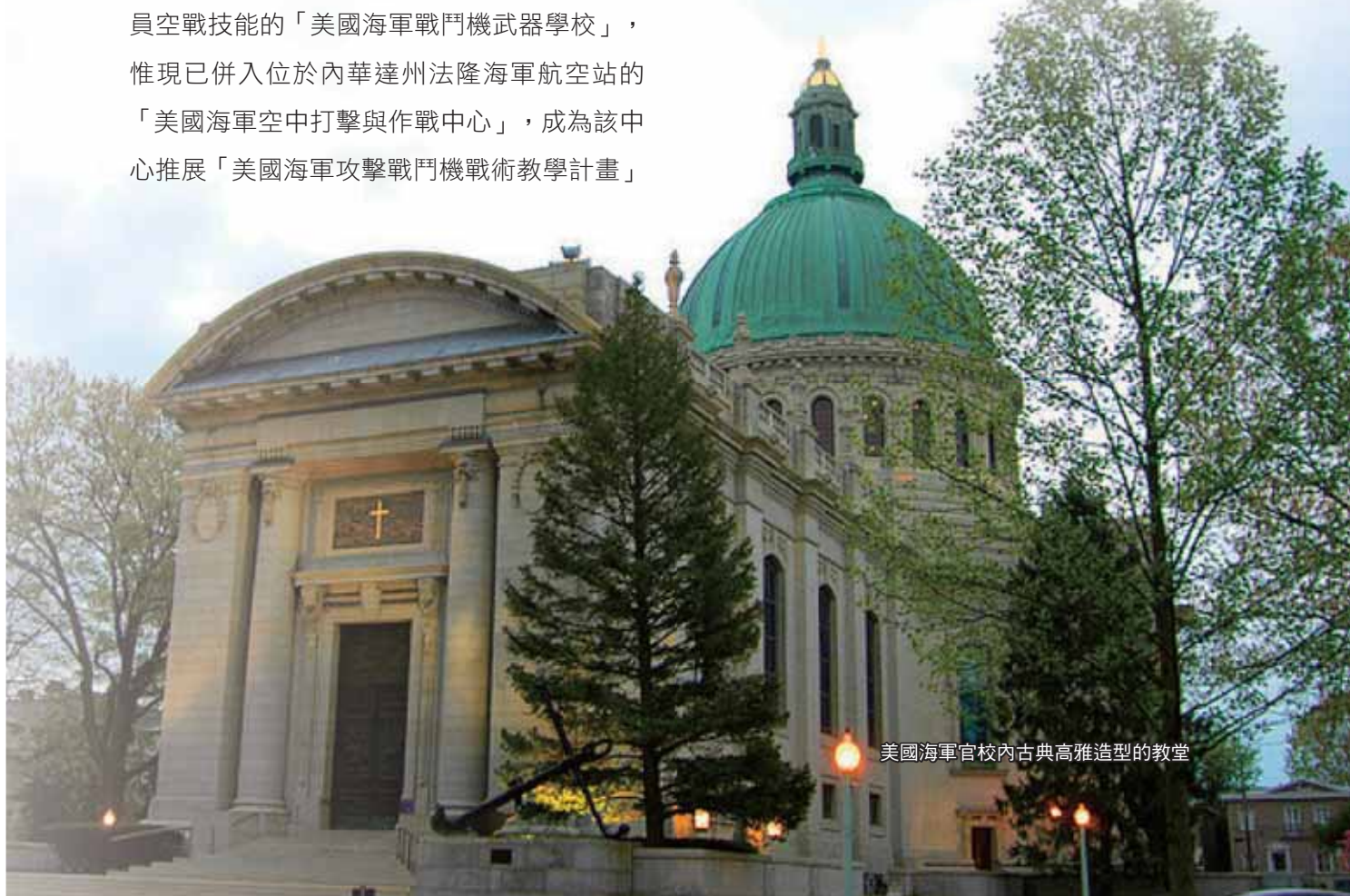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位於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市)，同被視為是最具典範的正統軍事院校。另外，美國亦有其他十餘所各具不同體制的公、私立軍校，如南卡羅萊納州的州立軍事學院(The Citadel, 又名城堡軍校或色岱爾軍校)、佛蒙特州的私立諾威治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以及各有不同就學年限的軍事預校(Military junior college)，均是有意投身軍旅者得以報考修業的軍事學校。

美國還有若干兼收軍校生和一般生的大學院校，但並未在其校名上顯示出軍校的特性，例



如創校於1929年、位處北加州舊金山灣區威勒赫(Vallejo，係以西班牙語發音)市的「加州海洋學院」(California Maritime Academy<sup>1</sup>)即然，是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的成員之一，由於入學甄試時篩選極嚴，故獲得通過入校者皆有極佳的素質，亦是全美七所知名海洋院校之一。美國海軍部尚自行設立有數所具備教育訓練功能的學校，像是於1969年3月在加州米拉瑪海軍航空站創建、旨在培養海軍飛行員空戰技能的「美國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惟現已併入位於內華達州法隆海軍航空站的「美國海軍空中打擊與作戰中心」，成為該中心推展「美國海軍攻擊戰鬥機戰術教學計畫」

(United States Navy Strike Fighter Tactics Instructor program)的訓練基地。此外，海軍另於羅德島州紐波特市的寇斯特島(Coaster Island，Newport，Rhode Island State)上設有「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NWC)，乃屬培育高級軍官和將領的進階軍事學院，在於進行美國海洋戰略與政策研究分析、國家安全戰略決策訓練和聯合作戰課程傳授討論，與美國海軍學院無隸屬關係。



美國海軍官校內古典高雅造型的教堂

除了就讀軍事院校以外，欲於日後投效軍事行伍的青年學子，亦可選讀已加入「儲備軍官訓練團」(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ROTC)的美國大學，在學期間接受適當天數的軍事訓練，日後得以儲備軍官身分進入軍旅。聯邦政府會在同意兼採“ROTC”機制的大學內，提供所需的軍事教育師資、武器裝備，利用天數較長的假期調集報名入選的學生，施予一定天數的軍事訓練，並且亦對學生在就學期間給予學費、生活費上的補助；相對的，學生畢業後則須服役一定年限。

美國海軍官校是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軍官本科教育學校，依據統計資料顯示，每年現職中的海軍軍官，皆有近約75%的比例是來自海軍官校之畢業生，而在最近十年來，每年踏出USNA校門的畢業生，皆維持於1,000~1,200名左右。其他的海軍軍官取材管道，尚包括有「甄選轉服役」和「進修轉服役」等。甄選轉服役係招募優質的大學畢業生成為海軍軍官（其他軍種亦有相同的甄選轉服役制），我國過



世界最大航空母艦「雷根」(Ronald Reagan)號

去曾施行的「四年制志願預官」即沿採該等制度而實施；進修轉服吸役則是遴選表現良好的士官兵至一般大學攻讀，俟其取得學位後晉升軍官並延長役期。

## 貳、位於美東、馬里蘭州的美國海軍官校，創校歷史和經過

美國海軍的建構，可追溯自獨立戰爭(War of Independence, 亦稱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即「美國革命戰爭」)期間倉促設立的海上部隊，但是該時的海上部隊並無法和已具漫長歷史和堅強武力的英國海軍抗衡，係經由艱苦的陸地戰役方才致勝建國。在華盛頓總統連任的第二年、即1794年，國會正式通過組建美國海軍的法案並逐漸發展海軍；1845年，波爾克(Polk, James Knox)總統指示「海軍部」(Department of the Navy)成立了一所專門訓練海軍軍官的學校，並經海軍部部長--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選定位於華府東方約50公里的馬里蘭州首府--安那波里斯(Annapolis)郊區設校。校址距馬里蘭州最大城--巴爾的摩亦不過咫尺之遙，當地原是一座瀕臨切薩比克海灣，而且又有塞文河從近旁流過的陸軍「塞文堡軍營」，設校之時校園僅及10英畝，因為用地狹小兼以究屬草創階段，故在同年10月僅招募50名學生，並即於同月10日正式開學授課，此正是其校慶日訂為10月10日之由來，恰與我國國慶同日。初期的美國海軍官校曾分別隸屬於「海軍後勤暨水文署」及「海軍航海局」麾下，至1867年方才直屬於海軍部。



屬海灣城市的安那波里斯，係一座建於殖民時期的歷史名城，其名稱源起於17世紀時英國王室家族內、名為“Anne”的公主，而馬里蘭州之名(Maryland)，則是源自斯時的英格蘭瑪麗女王(Queen Mary)。俟1783年初，已於「獨立戰爭」獲勝的美國，即於戰後短暫期間設立的首都--安那波里斯的州議會大廈，再次召開「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通過美、英兩方於巴黎簽訂的和約草案，甚具歷史意義；惟後來選設首都時，出席者曾考量的因素之一，是初建國家的美國尚無堅強的海軍，日後恐難以抵擋來自海上的敵對國家艦隊之攻擊，遂將首都從沿海城市遷移至離海岸稍遠的華盛頓去<sup>2</sup>。目前，安那波里斯人口僅約為3.8萬，遠少於同州另一著名港城--巴爾的摩(Baltimore)，但則仍是深具蓬勃發展意象的海灣城市，同時亦是馬里蘭州政府機構所在教和高科技公司密集的重鎮。

1861年初，美國爆發「南北戰爭」，同年5月學校遷往羅德島州的紐波特(即今「海軍戰爭學院」所在地)，迄1865年7月再遷返安那波里斯，不少從官校畢業並效忠北方聯邦的幹部，紛紛從美國東部海域的海事戰爭中嶄露頭角，成功封鎖東南海岸以防止南方邦聯軍隊，從盤據於今日拉丁美洲地區的西班牙殖民勢力中取得補給，對南北戰爭的及早底定裨益良深。之後的二、三十年，美國版圖迅速西推至太平洋岸，一舉而為兼擁瀕臨兩大洋縣長海岸線的新崛大國，而此際亦正是自15世紀起由狄亞士、哥倫布等航海先驅所開啟的「大航海」時代以



植設於校內的潛艇部隊創設百年紀念碑

來，帝國殖民主義風潮最興盛猛烈的時期，各海權壯大強盛國家競相組建遠洋艦隊，如火如荼似的在海外各地侵略掠奪。

國勢日漸強大的美國，對於控制海洋的渴望，非但無意瞠乎他國之後，還亟思超前領先，尤其是在其於1898年對西班牙「誘戰」成功，取得多處由西班牙割讓、轉讓的殖民地<sup>3</sup>，並因從西班牙手中輾轉獲有菲律賓以及關島等群島，而可將海權勢力大舉擴張至大太平洋。戰史學者接認為，美國自建國後首次對外展開、且頗具規模性的海戰，正是出現於美西戰爭中的加勒比海海域和東南亞的菲律賓海域，並於上述各海域中次第告捷，獲致了超乎預期、甚



海軍是美國最大的軍種

為豐碩甜美的戰果，從而更加明瞭船堅砲利之可貴。

接著，美國又觀睹到崛起於東亞的日本，由於海軍實力日漸增強，乃可繼1894年的「甲午戰爭」擊敗大清北洋艦隊後，又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大敗自歐洲趕赴屬我國緣海之渤海一帶馳援的俄羅斯「波羅底海艦隊」，而躋身世界強權之列等事例，爰愈益深刻的體認到建構龐大堅強海軍的重要性，而號稱是「海軍幹部搖籃」的海軍官校，受重視程度亦是跟著大幅提升。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更是舉國動員，挹注大量經費以壯大海軍艦隊實力，亦尅制了在偷襲珍珠港之後，曾經稱霸浩瀚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長達半年以上的日本海軍聯合艦隊。

自1899至1906年，美國聯邦政府海軍部連年均撥置巨額的經費，以供擴張海軍官校校園和增建各種進步完善的設施，校園面積迄1950年時已擴增至338英畝。1930年10月25日，美國「大學聯合會」通過海軍官校為其成員；1932年，國會再制定法案，授權官校可授予畢業生

學士學位；1937年，國會又通過將學士學位榮銜溯及自官校成立以來所有的畢業生；另自20世紀中葉起，海軍官校即長期被選列為全美最著名的50所大學院校之一。在創校辦學的第14個年分，畢業自美國海軍官校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sup>4</sup>)，於日後被尊譽為「美國海軍之父」；自第二次大戰爆發起，更有數名因為累聚戰功而晉升至五星上將的海軍將領，如恩斯特.金恩(Ernest Joseph King)和威廉.尼米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等人。而曾於1907年首位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美國人--阿爾伯特.邁克爾遜(Albert Michelson，波蘭裔，因發明「光學干涉儀並使用其進行光譜學和基本度量學研究」而獲獎)，以及於1977年就任為第39任美國總統的卡特.詹姆士(Carter James<sup>5</sup>)，亦均是畢業自美官國海軍官校的高材生。

1975年10月，國會先授權素來觀念新穎、作風進步的USNA，得以率先招收女學生(翌年、即1976年，國會再度通過全美所有軍種院校，皆開放招收女學生)。迄今，女學生約佔USNA全體學生總數的15~18%，必須與男學生攻讀同樣的課業，接受同樣的訓練<sup>6</sup>。自1845年建校以來，以至於今(2013)年的168個年頭，USNA已經培育成將近9萬名的畢業生進入海軍的行列，追尋「乘長風，破萬里浪」之美夢，踐履「翱翔七海，我武維揚」之重任。另亦有多名海軍官校的畢業生，於役畢後轉入至各項領域乃至於職業籃球或職業橄欖球，且均有極為出類拔萃的表現。按照美國太空總署於2005年1月發布的資料顯示，迄當月止自海軍官校畢業而於後來轉



職成為太空人者共有51人，乃是美國所有大學院校之畢業生當中居冠的學校，而首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雖非自USNA畢業者，但則曾任職海軍飛行員三年，並曾投入韓戰。

## 參、學校特色和蘊涵的教育理念

美國海軍官校的招生委員會，每年均會從將近2,600~2,700名、17~20歲的申請入學者當中，招收經評審合格且通過考試、近約1,300名的青年入校就讀，申請入學者必須先得到「具提名資格者」諸如國會議員、海外領地總督的推薦方得受理，另對於軍人子女、服役中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子女，陣亡、傷殘、失蹤戰士子女以及外籍軍校生…等，得給予特定的保障名額。申請入學者若未通過評審、考試，但是被認定是具備潛力者，可允許先進入預備學校補實基礎教育，一年後若經過測試合格即可直接進入海軍官校，或是改至另一所位於康涅狄克州的美國海岸防衛學院就讀。

大都是始建於20世紀初期的校內建築物，係採用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貌，初臨乍望之下，真令人猶如身處古昔的宮廷院落，然而內部之教學器材、實習設施卻皆是極為先端進步的新式配備；較諸上(19)世紀的校園、房舍，近乎是重新改造過般的，不但景致煥然一新，亦配合時代的遞嬗演進，採用嶄新的學制和課程體系。自20世紀初，學校大舉改造校園環境和教學方式起，USNA受政府器重和民間青睞程度，已逐漸和另外兩所具悠久歷史和美好聲譽

的陸軍官校--西點軍校及維吉尼亞軍校並駕齊驅，而且乃是以凌波禦濤為志向、亟思遠航萬里的莘莘學子們，「心嚮往之」的首選軍事院校。

20世紀期間，學校亦曾數度的擴建、增建，因此校園內頻可見到各自蘊涵古典風韻或呈現新穎造型、獨特風格的教學大樓、藝能教室、活動中心、圖書館、實驗室、教堂(有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等不同的教堂寺院)或學生宿舍、商店區，並且早即已是美國全境極其著名的「建築群落」之一<sup>7</sup>。環境十分清新優美的校園內，在多條林蔭道路下鋪設有磚砌的步徑，各廣場、樓舍前端、活動場址入口或轉角區以及庭園林景內，屢可見到昔日縱橫大洋的美國海軍英雄塑像，與在於傳揚愛國情操的紀念碑，俱是校園內鼓舞學生步武效法的精神指標。

美國海軍軍官學校的教學重點，在於將經過評選、性向合適的優秀學生，培養成具有堅實航海學識和專業技術能力，同時具備強健體魄、奮發進取意志的海軍軍官或海軍陸戰隊軍官。由於海軍生涯中除了接敵作戰、捍衛海疆之任務外，必須經常接觸到機械器材、電力設施、控制儀表和各式各樣的資訊、通訊配備，因此官校的學系是以理工科系為主，此在其他軍種的著名軍官學校亦然。在品德操守上，學生最基本的標準是「榮譽準則」中所揭櫫的「不說謊、不欺騙及不偷盜」，不過學校或自治團體對學生們的實際要求，當然比基本品德



原陳放於美國海軍官校內，班克羅夫特大樓前方的青銅古鐘，真品已於1987年由美國海軍官校歸還予日本沖繩政府。

標準高出甚多，甚至常以各類捨己救人、捨身報國的範例為教材，以達到潛移默化、不扶自直的薰陶效果。

為凝聚學生團結一致、重視大我，以及發揚團隊精神的意志，學校會要求學生皆要加入一隊以上「團隊性運動競賽」之隊員，參加校內各系或全美各院校之間的競賽，不僅讓成員藉由競技鍛練體能、琢磨技藝，亦從競賽過程中培養上下配合、同心協力的情感，以爭取團隊的勝利。日後，一旦面臨各類大小規模的作戰，均能摒棄自我保全的狹隘意識或強逞鬥狠

的英雄主義心態，而秉持堅忍到底的毅力，同時發揮密切聯合、協同支援的意念，求取最佳的戰果。在對外參加大學院校之間的運動競賽，海軍官校的球隊係以「山羊比爾」作為其吉祥物，而歷年來最受注重的球賽，乃是最能象徵軍人勇往直前、朝向目標奮力挺進而不退卻的橄欖球(或稱美式足球)競賽。

海軍官校係以古希臘神話中，海神波西頓(Poseidon)手持武器--「三叉戟」作為校徽，校徽下緣明確標示著以拉丁文寫成的格言--“ex scientia tridens”，其字義為「從知識至三叉戟之路」，意即必須習取高深的學識和技能方得有效制海、克敵致勝。惟用以勉勵學生的格言或銘語，倒並非僅是係上述一語而已，另有「榮譽、勇氣和奉獻」以及「卓越但不高傲」等，旨在隨時提示學子允宜敦品力行、莫植操守，在精實專業的學能以外，亦應同時培養高尚正直的人格，甫能報效國家，奉獻人群社會。

邇來諸年，學生自海軍官校畢業成為軍官之後，有分發至水面艦艇、潛艦部隊者，有分發至海軍航空隊者，亦有分發至陸戰隊、海豹部隊者，並再各視分發部門而接受不同期限的銜接訓練，此等在職訓練以分發至海軍航空隊所必須接受長達24個月的專業飛行和戰鬥訓練最為漫長，蓋自1940年代以來在全球各處海域所爆發的大規模海戰，不少的大型戰艦或航空母艦被敵方戰機所投彈(或發射飛彈)炸沈或重創者，已遠多於被敵方艦艇發射的魚雷或炮火擊



沈、重創者，此亦顯示出從海面、海底延伸至空中的攻擊和立體化戰鬥，在海軍陣容中日趨重要的特性。

## 肆、校內的教育訓練和稱譽遐邇的榮耀事蹟

通過評審和考試而於每年7月初進入學校的新生，必須秉持堅定的毅力以度過第一年，儘速融入與往昔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而亟待適應的新環境。他們必須修習和一般大學院校相似、屬於通識性的共同科目和航海基礎課程，以及身為軍人所必要的基本教練，俾在日常生活中隨時端正容貌儀表，控制情緒和舉止，熟練團體作息，同時養成正確判斷事務、有效應對處置的能力。擺脫「新鮮人」身分的二年級學生，開始修習專門性課程如進階航海課程、軍事工程課程、海軍學術課程以及領導統禦課程，停止於課堂講授的暑假期間則會分發至各個不同艦隊，接受夏季航海訓練，並承擔艦上勤務和輪班，嫻熟海上生活狀況和艦艇進出港口灣澳時必要留意的事項。

三年級學生在課業上已涉獵導航、輪機課程，各種攸關海軍工程、電力(電子)設備系統、海軍武器系統的進階專業課程，深化的領導統禦課程以及海事法令課程…等，並逐級運用電腦學習各種軍事推演；在暑期中，既要運用官校內的教育用艦艇進行實務操作和戰術訓練外，亦會被派往多處海軍基地去，登臨現代化的戰艦、核潛艇、兩棲艦艇和親身試乘各類

海軍戰機，學習具有多種變化而必須因時、因地制宜的接敵作戰技能，如海面作戰、水下作戰、兩棲作戰、航空作戰和立體化作戰，兼習身處船艦時應備的良好習慣和社交禮節。三年級學生並需加重學長角色以指導新學員，且輪流出任學生自治團體和社團負責人或幹部，強化其領導交誼能力。

進入至第四學年，學生處於課堂學習高階課程之時數已相對較少，對機器設備和戰技、戰術的實習課程增多，並會隨艦至海外港口從事敦睦訪問，同時廣泛性的實習導航、操作武器、觀測天象、判定船艦方位距離和指揮調度船艦，乃至於演練佈署艦隊…諸項，並填寫航行訓練日誌，摘要記錄值班情況。不過，有部分的四年生則會被調派至夏威夷的陸戰單位或位於加州彭德爾頓堡(Camp Pendleton Calif.)的第一陸戰師去，與陸戰隊地面單位及航空兵單位中的長官、士官兵共事並培育技能。而且，學生在宿舍大樓--「班克羅夫特大樓<sup>8</sup>」內的輪值幹部勤務，亦是由四年級的學長督導執行，從複雜多元的生活圈和學習環境中，培養其進階領導能力。

四年有成，經由軍事教育的洗禮，官校例年來皆是於五月下旬舉行盛大隆重的畢業儀式，儀典結束後千餘名學子則在經由授階並兼取學士學位下，正式晉列為海軍軍官。較之於一般大學，官校的畢業典禮尤為隆重，頻可見到冠蓋雲集之景象，總統、副總統或國防部長經常於典禮中勉勵學子，同時發表政策性演說。歐



校內的班克羅夫特 (Bancroft) 大樓, Bancroft 為推動創校的將領。

巴馬總統在甫就任之2009年，即應邀蒞臨出席美國海軍官校的畢業典禮，歐巴馬總統當年在致詞時勉勵畢業生「力量來自勇氣，為榮譽獻身」，並宣示將嚴正打擊恐怖主義以及持續壯大海軍暨海軍陸戰隊。爾後數年，歐巴馬總統果如其然的，於亞洲地區增加部署海軍武力，特別是東北亞的東海、東南亞的南海和西亞的波斯灣，惟是否造就或反而影響區域穩定，尚待政治上的運籌帷幄，方能更進一步的觀察評析。

去(2012)年的海軍官校畢業典禮，是在5月29日舉行，由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E. Panetta)發表演講，馬里蘭州州長奧馬利(O' Malley)、海軍部部長馬伯斯(Mabus)、海軍作戰部部長喬納森上將以及海軍陸戰隊司令詹姆斯上將、數名艦隊指揮官…等人皆應邀同慶，場面熱鬧無比。典禮結束後，官校畢業生往往會按例將禮帽拋向天空，作為最後一刻的

官校學生生涯之休止符。此一和其他軍種官校所共有的習俗，連年以來皆已是「不可免除」的儀式，原之意義究係象徵心情上的釋放解脫、或是寄望海闊天空或是寓意高飛升榮，已難查悉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於宣示畢業生即將告別校園，邁入軍官任期並承擔更大責任的人生另一階段。

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於畢業後，是依據所學專長和部隊需求名額進行分配，大多數的畢業生係投身至艦隊、海軍航空部隊或陸戰隊去履新，並須服役5年以上，惟有逾六成的比例者皆會繼續留任於海軍達十年以上，且不乏有以「鎮濤伏波、櫓櫓為家」作為其終身志業者。故而，長期以來，海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一直是美國海軍軍官幹部的主體，嗣後亦將如斯，永矢不渝。初任軍官者，在2~4年內大都可以明確選定所欲終身投效的專業領域，如本文前所述及的美國前總統卡特，自其於海軍官校畢業後即皆任職於潛艇部隊，或投效於核子動力潛艇的應用研發領域。

經由官校訓練洗禮的海軍軍官在服役階段，無論是從美國的本土地、領海疆域而至遠駐於海外的艦隊上，皆能將沿續使命、傳承榮譽引為自立立人的海軍軍官特質，並發揚光大海軍素所引以為榮，冒險犯難、無遠弗屆之精神。此等備受各界推崇的表現，一如海軍軍官學校所標榜之教育理念一般，在於貫輸學生責任感、榮譽感和忠誠感，造就兼具領導統禦能力和管理政府部門才幹的海軍中堅良材。



## 陸、中、美兩國海軍官校之間的交流活動

過去多載，我國雖然每年皆有大量學生渡洋前往美國留學，但是卻極少有選讀美國軍事學校者，特別是由其聯邦政府設立的正統軍官學校。在柯林頓總統任內晚期，由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改善，爰突破既有限制，開始接受台灣軍校生赴美國軍官學校就讀，並將此等作為視為美國與我中華民國加強軍事交流合作的指標之一，是極具實質意義的作法。由於海軍久來即是國際軍種，經由教育交流和交換學習，可跨越既定藩籬而引入新穎的思考模式，習取別具心裁的教學理念，以達到變革創新的目標。

西元2000年，我國即曾選派優秀學子赴美國海軍官校攻讀，並已於2004年順利畢業，就學期間曾特別登上美國「神盾級」(Advanced Electronic Guidance Information System/Airborne Early-warning Ground Integrated System, AEGIS, 即「空中預警與地面整合系統」)軍艦見習，度過為期三周的艦上訓練。之後，亦陸續有學子踵繼其後，經我國海軍選派赴USNA就讀；另亦有若干高中(職)畢業學子，係選讀於其他州立軍事學院如色岱爾軍校之海軍類科，俟學成後再加入海軍行列。

至於來台留學的美國籍大學以上學生，雖然是與年俱增，而且亦有數不少的其他邦交國軍校生在我國軍校留學者，但是倒極罕有美籍軍校交換生就讀於我國軍官學校的情形，容待他

日得有創例。惟包括我海軍官校在內的各個軍校，則會利用假期較長的暑假，邀請美國各軍種的官校師生前來參觀訪問，從事另項層次的交流活動，實我雙方咸可從交流過程當中相互學習；反之，亦有我國軍(民)大學院校師生，組團前往美國軍官學校參訪之事例。

在實務上，中、美軍事學校之間的組團交流訪問，常係透過在美國軍官學校任教的華裔教授協助安排，俾可愈為順利的進行，引進對方教學特點或思維見地，以改善己方未盡完美之處。例如，校區的環境是否宜由學生班隊劃分責任區以打掃維護，並藉以養成負責盡職的信念，則有不同的見解。美國海軍官校乃是將維護校園環境和清潔衛生事務，委由專門業者承包，官校生除了在入學訓練時曾體驗其事外，其他時間則不需親自處理，因為USNA認為由國家投注高額經費以培育的官校學生，有愈高階、愈重要的課業亟待盡心戮力的學習，無庸耗費時間於枝節末微之事務上。其餘在維護校園安全、防止歹徒入侵方面亦然，除了課程學習上的需要之外，無需由學生輪流站哨守衛，而將戍守校園之任務，授由專責之部隊肩負之。

另有一項備具趣味性之事，係早在36年前、即1977年4月下旬，我國一支由台中宜寧中學派出的青棒勁旅球隊，在赴美進行巡迴友誼賽時，便曾和美國海軍官校中，由一年級學生組成的球隊比賽過，且以7：2的比數獲勝。當年的海軍官校學生總隊長--溫納菲德將軍，不



美國海軍官校鳥瞰照片。



官校學生手持指揮刀，練習操演。

僅曾致贈每位宜寧中學棒球隊隊員一枚官校徽章，並提供官校車輛接送球隊，場面和睦溫馨，斯時安那波里斯市或馬里蘭州的媒體皆曾詳盡報導，亦曾見諸國內各報章媒體，迄今令人難忘。

## 柒、結語

海軍是美國軍力最浩大的軍種，其人員總數、裝備價值和國會每年通過的預算額度，皆是各軍種之冠，出掌國防部轄下諸部門或膺任「聯合參謀會議」成員暨高層首長者，亦以海軍將領為最眾。美國憲法明文賦予國會「配備和保持海軍」的權力，即使逾半世紀之久的「冷戰」已告結束，美國海軍依然保存壯大聲勢和揚威全球海域的艦隊武力，近數年間大都維持著近約50萬名現役和備役的海軍人員、接近三百艘的現役軍艦和逾四千架的戰機。依據美國《國防新聞週刊》(Defense News Weekly)、《詹氏戰艦大全》(Jane's Fighting Ships)等軍事刊物，於2012年所作的調查統

計，冠居舉世之首的美國海軍艦艇總噸位，竟然比排序於其後的17個國家所有海軍艦艇噸位之總和還多，而且此一紀錄在8~10年內尚不致於有大幅的變化。

艦艇、戰機固然是信而有徵的實質配備，操之於人的層面，則是同等重要之無形戰力，新世代軍力的整備奠基，正是由「船堅砲利」和「優秀官兵」兩者，相輔相成所構組形成的，任何一方的消滅折損，皆會明顯削弱整體的戰力。有鑒於此，培育美國海軍軍官的首要重鎮--美國海軍官校，自1845年設校之後始終是以邁向一流學府、培訓一流海軍幹才為職志。歷經168年來，既是校譽輝煌的軍事名校，亦是長期躋列為美國境內優質大學院校行列的學府；另一方面，有志入學、投效海軍勁旅的傑出青年，則可經由在校期間嚴格的培育訓練，成為海軍的新血輪和日後領導美國海軍的高階骨幹，並成就其經由軍旅歷練以報效國家的宏大使命。

多年來，USNA同時亦為社會上的海、空(含太



空)運輸業界，以及航貿業界、各類工商業界培養出大量的人才，此等菁英良才昔日在學、在營期間，奠基的軍人武德(智信仁勇嚴)及效忠國家部隊的忠勇軍魂，日後於其年事稍長，卸下軍職轉而服務社會時，俱能將堅固不摧的「錨鍊精神」，轉化為對任職機構或企業的赤膽忠誠。在面對複雜的工作或繁重的壓力時，不僅能秉具昔日航行海洋的不撓不懈意志予以克服，完成企業交付的使命，並且能秉持勇於承當、追求完備的精神，盡善盡美的貫徹任務，以致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在甚多方面，遠較畢業於一般院校者，更能受到國家各界的垂愛青睞和延攬任用，並得廣續發揮昔日所學以轉效於社會。此一特點，倒並非獨見於美國，在同樣設立有海軍官校和其他軍官學校的我國亦是然也。

在我中華民國和美國，受過海軍官校四年教育訓練，和薰陶默化的學子，都能將嚴明的「親愛精誠」校訓銘記於心，而且是終生不移其志的奉行無渝，足為民眾的優良表率。另則經由眾多校友們，長久以來在軍旅行伍和諸多業界累聚的績效和信譽，使得官校的美好名聲愈益獲得大眾的信賴，亦愈可激勵畢業於國軍預校或高中(職)之學子，萌發親赴就學的決心，期盼在「有為者，亦若是」的鞭策下，於日後榮膺為縱橫萬里江洋，守護廣大領海的海上棟樑。而我海軍官校的口碑，不僅得以更普遍的傳頌全國、全球，學校亦能愈益屹立不搖的永續長存。👁️

## 參考資料

- 1 “California Maritime Academy”在設校初期，係名為“California Nautical School”，即「加州海事學校」，旨在教授航運技術、海商法令和經濟、管理等課業。十年後、即1939年時，該校方才改易成現今的校名。
- 2 美國是以1776年，由出席「大陸會議」之代表在費城召開會議，並於7月4日通過《獨立宣言》之年，作為其立國年分。獨立戰爭結束並完成制憲後，美國先於1788年9月以紐約市為首都，故1789年選出的首任總統華盛頓便是在紐約宣誓就職；1790年，美國改以費城為首都，因此在1793年連任的華盛頓，即改於費城舉行就職典禮。而繼華盛頓之後，續任的傑佛遜總統於其第一任期間，主導選定新首都的地點後(係以首任總統華盛頓之名為名)，則於其連任就職時，改於華盛頓宣誓上任。
- 3 自1895年起，古巴民眾重再醞釀反抗西班牙殘暴統治的聲勢，並且付諸行動。而美國原本即對於歐洲國家將勢力伸及國疆周旁甚為反感，遂先於1898年初要求西班牙停止鎮壓古巴境內反抗組織，國會並授予總統使用武力的權利。4月下旬，美國派艦封鎖古巴港口並拘留一艘西班牙商船，再也沈不住氣的西班牙遂向美國宣戰，早即準備多時的美國旋即翌日復對西班牙宣戰，終於爆發了「美西戰爭」。惟有不少歷史學者皆認為，美國是為了奪取原由西班牙控制的加勒比海殖民地，而蓄意發動美西戰爭，學者甚至提出論證指出，美國早自19世紀中葉，即多次在古巴境內鼓動民眾挺身對抗西班牙政權，俾再乘勢作為。
- 4 1859年畢業於海軍官校，後來被尊譽為「美國海軍之父」的馬漢，在其軍職期間曾兩度擔任美國海軍官校校長，著有《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海軍戰略》等巨作；美西戰爭爆發後，原已退休的馬漢又被聘請為「海軍戰略委員會」委員。他的海權論述曾獲得德皇威廉推崇為「一流的著作，所有的觀點均具經典性」；而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英國海軍大臣的邱吉爾，亦表示「世界上最具典範的海軍理論，乃創始於美國的馬漢將軍」。現今，美國海軍軍官學校的教學大樓之一，即是以馬漢之名命稱。
- 5 卡特係於1947年從USNA畢業，在海軍服役11年，並以海軍上尉軍階退役。海軍生涯期間，卡特大都任職於潛艇上，並曾投入「美國核潛艇之父」--海曼·李高佛(Hyman George Rickover)麾下，從事第一批核動力潛艇的研究工作，退役後曾返回其喬治亞州之故鄉，經營以產收花生為主的農業。
- 6 按照法律規定，女軍官在預計不會有戰鬥任務時，可在任何艦艇上任職180天以內，亦可擔任艦載機的飛行員。就實務上統計，大多數自USNA畢業的女性軍官，係任職於行政、通信、情報、工程、水文和電腦資訊等部門。
- 7 例如在1963年，美國聯邦政府即核定海軍官校之校舍為「國家歷史建築物」，而且本所屬於公開化校園的官校，每年得吸引超過100萬人次以上的觀光客，前往校內的開放區造訪。
- 8 在以「創校人」--班克羅夫特之名命稱的宿舍大樓(Bancroft Hall)前方，原本植立有一座鏽跡斑駁的琉球青銅古鐘，是1854年時率領艦隊為美國「打開東方大門」的海軍指揮官--培里(Perry)，停泊於尚屬獨立王國的琉球之際，從王室奪取而載回美國，並陳放於海軍官校校內的戰利品，如附圖，而培里的肖像則懸掛於班克羅夫特大樓的一樓大廳內。在昔年帝國主義廣泛暈染瀾漫之下，強國時有侵佔掠奪之舉，惟鑒於奪取古物究屬不當，且陳放於校內有違文明教育之風，故該青銅古鐘已於1987年，由美國海軍官校歸還予日本沖繩政府，現陳放於沖繩首府--那霸市內，官校則改而陳放「複製品」(replica)，以訴說這段史實。

# 念茲在茲——淺談初任官經歷

著者／吳佳蓉

正期99年班  
歷任承德軍艦中尉槍砲官，現為迪化軍艦中尉射控官

陸海空軍是國家的軍隊，也是全民的軍隊。國軍官兵來自民間、鄉里，受人民百姓的付託，執行保國衛民的使命，透過服役將這份熱愛鄉里的情懷，轉換為熱愛國家的大愛；而部隊風氣之良窳，實繫於各級領導幹部，國軍幹部更是部隊中激濁揚清之梁柱。

長期以來，由於國內政治環境、社會情勢丕變，使得當前國軍面對的思想防線，與過去相比截然不同。台灣長期財經局勢發展，滋長了功利主義，亦沖淡了國防憂患意識，全募兵制、精粹案及建軍規劃等國防轉型的改革，法律修正軍公教人員稅收，加上近期各軍事演習，部分媒體對國軍督促有加，或有斥責情事，對國軍幹部造成極大負面影響。目前，社會上一些邪風惡習，諸如營私貪利的觀念、虛矯粉飾的習性、投機取巧的行為、好逸惡勞的心態，造成公理秩序日趨廢弛，社會風氣日趨敗壞，並逐漸向國軍幹部，甚至全體陣營侵蝕。

我們現在的處境，正如一艘漂泊海上的一艘船，前面狂風巨浪，茫茫大海駛往何方？

這條你我必經軍官之路，外界眼中的光鮮亮麗，世俗瞧的穩定高薪，惟有身歷其境的你我

方能深刻體會，當媒體沸沸揚揚名嘴批判時，那刻苦銘心的痛、那聲嘶力竭的憤怒。所以，我們說這一切來自一種絕決的深思，不斷的自我反芻，其中有著意志和勇氣的定位。

海軍官校學生在軍官養成教育階段，除學習專業知識陶冶德行、增進軍事素養與鍛鍊強健體魄外，另有一項重要的學習歷程與目標，就是學習領導統御與指揮，以勝任艦艇部隊帶兵與領導任務，奠定未來軍旅生涯之發展基礎。

## 環境不能改變，調適心態

軍官的角色要求遠多於一般老百姓生活的社會角色，所以軍事院校在四年中提供的各種教育訓練和磨練，實比一般民間企業更過之無不及。甫進入部隊後，會發現事情並不如想像中單純，冗繁的行政程序、僵化的官僚制度、多變的命令與要求，在在構成挑戰並形成挫折，有些無法認同接受，更多是因資歷不足而迫使自己面對複雜的環境，並身處殘酷的現實。但請永遠記得，身為軍官幹部與企業領導者最大不同，在於不能逃避許多攸關道德價值的困難抉擇，只有設法解決問題，不逃避責任，國軍才能擁有不斷進步的動能。



每每一段時間，小道消息快速流竄，「聽說又有初官不想上船，吵著調至陸地單位。真的假的阿？」進而浮出檯面演變成「〇〇軍艦初官表示壓力過大，住進精神病院。」而後看笑話似的開始推論「應該再不多久，就可順利調陸了！」極度不願意聽聞諸類話題，實在不曉得自己，同樣走出那莊嚴官校大門的自己，該用何種情緒來回應。

艦艇單位很苦嗎？是啊！對海軍不了解的人而言，真的很苦。所以，經過四年官校洗禮的海軍軍官更應該能坦然面對現實環境，善於適應變遷，以客觀的態度面對現實環境，冷靜地判斷事實，理性地處理問題，並適時調整，保持良好適應狀態。逆境之中，只有抬頭勇敢面對的人，才有可能戰勝困難。曾經一份商業週刊在畢業季後發表一份報告，提到「很多年輕人，從校園步入社會後，對社會環境有著諸多的不適應。有些年輕人，認為社會太殘酷，因此採取了消極的抵觸情緒，最終只能和社會格格不入，成為社會的棄兒。」

在資訊公開透明的現在，網際網路與資訊流通下，許多官校生甚至打從剛入學時，已經探聽到未來畢業後之升遷發展，提早為自己規劃藍圖，不只完成心理建設，更以無比勇氣面對，而非落荒而逃。

放眼望去，現在大環境下艦艇單位上仍有許多優秀前輩及學長姐們，依然持續奮鬥著，我們應該體認到，軍隊永遠不會像你期待那樣，單位也不可能總是舒適的環境。調整心態，累

積缺乏的條件和能力，自然而然會漸入佳境；如果還是覺得和部隊格格不入，不妨試著改變自己某些觀念甚至做法，來適應現行環境，擴大生存空間。裝瘋賣傻來逃避面對，絕對不能將責任撇得一乾二淨，甚而留下壞名聲及往後嚴重病史紀錄。

### 充滿激情，務實踏實

許多社會大眾對軍隊的刻板印象為呆版、墨守成規等，殊不知海軍軍官學校除了制式的軍官養成教育外，逐步趨向於多元合理化的大學教育模式，近幾屆畢業的海軍軍官在脫離了以往強壓打罵式教育後，更富有創意、活力及自我想法。如同現今競爭激烈的商海，要想在職場站穩腳步，在工作中表現出色，就必須有快速回應的能力，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進而表現出你的才能，取得輝煌的成績。《這是我們的船》一書作者麥柯爾·柯維指出：「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信念：一旦出發就不能回頭，也不允許回頭。一旦我們下定決心，就要在前進的道路上毫不猶豫、竭盡全力，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遇到困難，我們可以隨時應變，做一些策略上的調整，改變一些方法，或做一場必要的修整。但絕不能做讓人鄙視的逃兵。」

我的艦長常鼓勵艦上之官員：「做任何事情，要有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起來才是巧實力。」意思是在原有的良好裝備、硬體設備及現行的規矩制度下，更要時常思考，動動腦筋，打破一成不變，總是循規蹈矩絕非好事，

鼓勵身為幹部的我們，更應去設想多元的執行方式，有效地完成任何一件事情。

為官路上，必定是遵循體制、服從上級命令，但內心可以是海闊天空、靈活運用。時代潮流浩浩蕩蕩在進步，憑著新創意，可以把枯燥、千篇一律的訓練變的生動有趣，讓生命充滿活力；藉著新思想，可以讓相同的任務有更卓越的執行方式，達成最終圓滿結局。除了當下，你我絕無法穿縮其他過去或未來時光，而未來只不過為即將來到的現在罷了，「今日事，今日畢」勿蹉跎時間，支配主宰自己生活中每一刻。

## 階級，是國家賦予的；尊敬，靠自己去爭取！

韓愈的「師說」提到：「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這句話對於現今講究專業化、學術化及技術化的時代，真是再貼切不過了；國軍部隊現今需要的是「專家」，各個領域都有「狀元」。「聞道」不分年紀大小、先後順序，打滾多年的人不必倚老賣老；最不樂意聽到有人臭屁說：「我吃過的鹽比你走過的路還多。」等類似話語。對於學有專精的人，又何必在乎年紀大小呢？

俗話說：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職責所在，就必然要對業管的職掌及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熟悉，也唯有如此，才能在指導下屬時，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軍中成員術業有專攻，

可說是人才濟濟，臥虎藏龍。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保持謙虛態度，隨時請教學習，隨時抱持一切從基礎的工作開始學習與扎根底態度。階級，是國家賦予的；尊敬，靠自己去爭取！在歷任職務中，有不會不懂的，只有多開口詢問，翻閱參考圖書技令，學習放下身段自然知識就會增長。

每一年鳳凰花開時，官校應屆畢業生雪白制服披上金黃條橫，開始躍躍欲試，準備成為國軍新血。同時，內心卻有著種種擔憂浮動：「渾身上下均一股菜味，聽說不容易帶領部隊中資深士官長。」「聽學長說前幾個月都不能下船放假。」

資深士官幹部會不會吃定資淺軍官？當然，一定會！進入部隊好比出社會歷練，已經不是國中、高中生老師一步一步指示教導你按部就班進行，連學習範圍都替你圈好了。軍官階層在現代海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領導者的特權，也是沉重的負擔。軍官每任一至兩年，時常可見新任職的軍官被賦予的任務是毫無經驗，幸運些的，可以接觸到及時的訓練或受訓訓期搭配，大多皆是各顯神通，積極的軍官運用多種方法，靠人際、靠經驗、藉由苦學及舊檔案，使自己盡快進入狀況；相反的，無法主動積極的軍官，靠上級的督導、靠長官的責難鞭策，使自己了解業務職掌。在軍事養成教育中，我們或多或少產生了由上而下被動的接受，可以說是服從表現的錯覺。現代的軍官幹部不能故步自封，惟有不恥下問、主動接觸



了解業管的職掌範圍，並積極融合運用新知完成每一任務。

階級，是國家賦予的；尊敬，靠自己去爭取！

### 效法好榜樣，以他人為借鏡

三五成群義氣憤慨地討論：「唉！又是一個官僚。」左一句，「反正大家都是混口飯吃，隨便啦！」右一句，另一個再補充一句：「階級高不一定能力強，官運比較好阿！平時撫ㄟ拜拜啦！有拜有錄用！」

肩上的橫槓說粗不粗、說細亦不細，像個夾心餅中的餡兒，夾在上頭長官和下頭士官兵，或比你更資淺軍官之間。「真不知那些長官在想什麼，換個位置就換個腦袋。」部隊中三不五時的言語浮動，在心情憤恨不平下的有意或無意地脫口而出，時常或多或少造成部分人的傷害，如履薄冰謹慎檢討下，自認為愧對肩上重責大任，有句話說：「將帥無能，累死三軍。」軍旅生涯中，隨著各項職務之調整，會遇到許多不同領導風格上級長官，誰不想在軍中這條無法回頭之路，能有機緣和心中理想長官共事，無法掌握並選擇追隨什麼樣風格的領導者，多多少少夾帶著些運氣成份存在。從媒體新聞報導及軍中許多案例宣教上，不佳事例總及時更新公告週知，除自省外，我們更應當期勉自己別成為別人口中官僚下的產物。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部隊團體生活下，一定有你可以認可及尊敬的某些做事方法或待人接物態度，進而學習效法對方的優點；相反的，對於那些你無法認同，甚至為一己之私不合乎規定之舉止，切記！以這般缺點好好自省以做為自己的警戒。「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這是唐太宗廣為流傳的一段話。善於學習他人經驗，善於取他人之長的人，當然亦從不羞於向他人請教。

### 隨時充實自我能力

另一個隨時需要充實自我本職學能之原因，即是日新月異的知識，配合著經驗一代一代傳承，考量時代變化與現實環境，禮記：「學然後知不足也。」人之處世，必經學矣；學而為用，用之，知之不足，常爾！知之不足，方知再學；然後知：用無止涯，學無止境，人之於世，學、用無休矣。人類絕非如同科技片中可隨時下載更新的電腦一般，你我都是在這條「官路」上不斷學習新專業知識，並運用於操演或任務上，也就是這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敗、迷惘夾雜，讓你我有了無與倫比的奮發圖強充實再出發動力。其實在歷練過程，內心的靈魂在瘋狂成長，每一天看似空虛底忙碌學習，但每一天你都不空虛。

誠如古語所說：萬物靜觀皆自得、處處留心

皆學問。軍隊外頭是更寬廣的世界，時代在進步，大環境不斷在改變，科技快速發展，必須不斷保持吸收新知，與自我充實之習慣，以掌握社會、國際間脈動。

有次閒聊時，朋友無意說道：「我們的志願役幹部，大多都沒有什麼自信可以在退伍後好過。」是的，情緒是可以被傳染的，所以在一起的志願役幹部大多都是如此的擔憂：「退伍後該做什麼？」因為待在軍中數年，已經輸人家一大截。

身在不是富裕人家，在進入官校受軍事教育前，多多少少在外頭小小打過短期工，老實說即使到現在，我一點都無法肯定的說，我認為自己適合擔任軍官幹部。偶然聽到一位學長述說：「不是別人看不起志願役幹部，而是志願役幹部看不起自己。」

我很認同這一句話。

在軍旅生涯中，除非休假或受訓，擔任軍官幹部很難有完整的時間可以自我學習及充實。因此，必須養成善於利用鎖碎時間，例如會議進行前等待時間、搭交通工具的路程等，用於不斷累積；或是運用片刻之沉思，或讓腦袋放空休息片刻，說不定可無意獲得靈感或解決難事之道。時常可見，安排單位聆聽講習或受訓期間的課堂時間，太多幹部總呼呼大睡，東倒西歪外加呼聲作響，甚至聽聞休假時間規律的單位人員，夜夜成群結隊相約到網咖消遣、KTV飲酒歡唱作樂。捫心自問，這樣的幹部如何有

資格怨聲連連，嘆軍中待遇不佳，怨單位不夠人性化，見到如此狀況，往往那句「不是別人看不起志願役幹部，而是志願役幹部看不起自己。」總浮上心頭。

## 修身養性，休閒娛樂

不論時代、環境如何改變，從小到大，個人的品格素質是極其重要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與所做的每一件事同等重要，言行一致，使自己一言一行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品質，發揮誠信這一待人處世的規範。大學之道：「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論壇如火如荼辯論著：軍服等同於軍人武德，到底換下了身軍服，是如同評論家所說跟一般老百姓沒兩樣，亦或是批判家說軍人就是軍人，改頭換面依舊是軍人。難道說醫生脫下了白袍，社會大眾就不會拿審視身為醫生的道德標準來評論嗎？任職教師授課以外之時間，即可為所欲為，忽視一個教師本身應具備的品格素質嗎？

其實，這是個簡單的原則。高標準的道德力量是沒有任何東西可取代的，絕對不能對現今渲染、文飾扭曲之事實讓步。

部隊的生活原本就充滿緊張與忙碌，每日按表操課、照章行事，照計畫實施訓練，總有接

不完之突發及緊急狀況，或是長官臨時交辦事項，因此，如何拿捏事情底輕重緩急及任務重點，在從容不迫下，時效內完成交辦任務，顯得異常重要。禮記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即做任何事之前應有充分準備、立定目標，才不容易臨陣出差錯而影響工作成效及個人情緒。時時看重事前整備工作、周延底計畫、積極底協調事宜，盡可能設想並排除可能遭受到的困難，盡早提出解決方法或備用方案。如此一來，可以避免老處在一匆促緊張忙碌的工作環境。

艦艇單位任務吃重、事務龐雜，與陸岸單位相比，工作與任務執行時壓力確實相對較大，隨著階級與職務不同，肩上所承受之重擔亦不同，時常不僅僅單一任務，而是同時執行好幾項任務，幾乎是二十四小時作業，而衍生之壓力，影響著健康、睡眠品質、用餐心情等。釋放工作與生活壓力的方式因人而異，盡可能依自我興趣去選擇規劃。利用工作之餘的休假，於生活中培養出正當休閒娛樂，無論靜態的琴棋書畫四藝，或動態踏青旅遊，皆可更充實人生。軍旅生涯只是人生的一段歷程，並不是全部，無論是管制年限或服役年滿，總有離開軍中回歸社會的一天。

不要說部隊限制多多，在限制之中還能活的充實、活的快樂，這才是最大意義。軍旅生涯是苦亦或樂，取決於自己用何種心態與方式去面對適應不同環境、長官同僚、單位特性與工作項目，試著融入單位的組織文化；軍旅生涯

儘管難料，卻可以管理，如同跑步一樣，上坡靠衝勁、下坡靠智慧，中間需要配速與堅持，快一點、慢一點都沒關係，但記得，一定要步步踏實走完。

曾經，在瑣瑣碎碎的繁雜裡，自行咀嚼著那令人喘不過氣的壓力，一次一次地在無垠的絕望中，奮力向上爬，原以為只要跨過了這一步，生命就會有所不同，然而反覆的挫折、失落、無力感一波一波侵襲，是孤單的，心跳無力喘息，在日復一日的混亂情節中；唯獨耿耿的意志及直直的信念緩緩堆疊、延伸，相信皎亮天梯總有成形一天。在這條為官之路上，懵懵懂懂、誤闖誤撞到今天，尚不夠資格研究摸索傳承已久之「為將之道」，倒是有些說來不怕給人笑的感觸。依舊還在艦艇上摸索我的「為官之道」，而這些簡單的原則，就讓它繼續如燈塔般導引總是迷失困惑的我吧。👁️

## 參考書目

- 1 楊樂，西點軍校給青年的16個忠告，海鵲文化。
- 2 Samuel Smiles著，劉曙光、宋景堂、劉志明譯，品格的力量，立緒出版社。
- 3 Edgar F. Puryear, JR著，陳勁甫譯，為將之道，麥田出版，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策劃，承繼光榮傳統，迎接人生挑戰，青年日報社。
- 4 Rhonda Byrne著，謝明憲譯，祕密，方智出版社。
- 5 麥科爾·柯維著，喬木譯，這是我們的船，海洋文化出版社。
- 6 丘樹華，迎風巡航：拉法葉艦航海日誌，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臺灣週邊海域的海底地形 與海洋測量介紹

著者／毛正氣

海軍官校77年班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海洋環境科學碩士(1992)

美國海軍參謀學院56期(2000)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海洋暨大氣科學博士(2006)

- 一、台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碰接交界，海洋地形與板塊運動息息相關，重要構造有：東海大陸棚、沖繩海槽、琉球島弧、琉球海溝、菲律賓海海盆及南海海盆等。
- 二、台灣附近海域的海底地形，台灣東部離岸數公里處，深度已達1千公尺以上，西部台灣海峽大部分少於100公尺，僅在海峽南部有些地方深達1至2千公尺。
- 三、我國目前尚未有法定的機構，專責發展、取得和傳播海洋科學和技術的資料，若能及早建立資料庫整合平台及資源共享機制，可有效落實海洋環境資源運用及保護。

## 壹、海底地形構造的成因

海底地形與板塊構造是息息相關的，雖然，海底地形僅為海床表面的形貌，板塊構造卻是涉及至整個岩石圈；要了解板塊構造，必須從地質、地球物理等許多相關的地球科學來著手。<sup>1</sup>海地地形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大陸邊緣、洋底盆地和分裂洋脊（*rifting ridge*，又稱為中洋脊*mid-ocean ridge*），大陸邊緣是位於大陸和海洋盆地之間的過渡地區，因此，在其間的地形與兩者皆有關聯；大陸邊緣涵蓋了整個海洋面積20%。典型型態包括大陸棚、大陸斜坡和大陸隆堆

（*continental rise*）；太平洋因形成較古老，大陸隆堆則被海溝所取代，東、北、西三方面亦被海溝所環繞，因此，大陸棚的寬度要比大西洋的窄得多。<sup>2</sup>

### 一、大陸邊緣的海底地形：

#### （一）大陸棚與大陸斜坡：

「大陸棚」為海岸線向海延伸之淺海地帶，其平均坡度僅有千分之一，其傾斜度自海岸附近向外緣逐漸增大，直到棚界（*shelf break*）其傾斜度才陡然增加，大陸棚之下的地殼仍屬於大陸地殼，但其厚度逐漸往棚界處變薄。棚界之處的水深平均約為130公尺，

最深之棚界位於南極大陸外海，可達550公尺，大陸棚上的地形起伏很少超過20公尺（圖1）。大陸棚的寬度不一，可窄從幾公里至寬過400公里以上；一般而言，其平均寬度大約為78公里。最寬的大陸位於北極海內。

從棚界往下，坡度突然變得陡峻的斜坡地稱為「大陸斜坡」，大陸斜坡的坡度都陡於2度以上，平均約為4度，多數大陸斜坡坡度都較陸地上的山脈為緩，但是其斜坡超過35度者仍不在少數。大陸斜坡的範圍很窄，多半不超過200公里。斜坡上的地形非常複雜，有的地方會排列著一系列的斷層崖。

## （二）大陸隆堆與深海沖積扇：

在大陸斜坡之下，若沒有海溝，則為坡度緩於大陸斜坡的「大陸隆堆」，或稱「大陸隆起」。這個寬度介於100至1千公里之間的大陸隆堆，其坡度介於1/100與1/700之間，地形起伏很少超過40公尺。大陸隆堆下之地殼已屬於海洋地殼，不過，其上所覆蓋之沈積物係從陸地上經大陸棚、大陸斜坡而沖刷下來的，故名大陸隆堆。在此隆堆之上，常會形成巨大的錐狀或扇形的沈積地形，這稱為深海沖積扇（deep-sea fan），與陸上之沖積扇或三角洲相類似；大陸隆堆按其斜坡度亦可分為上部隆堆和下部隆堆；上部的坡度要比下部陡。

## （三）海溝與峽谷：

典型的太平洋大陸邊緣，在大陸斜坡之下就是水深達5千公尺以上的海溝。海溝的走向多

半平行於大陸邊緣，是海洋地殼隱沒於大陸地殼之下所形成的板塊邊界。海溝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東、北、西三面，大西洋只有波多黎各和南三明治海溝，印度洋中就僅有爪哇海溝。海溝是地球表面最深之處，馬里亞納海溝的挑戰者深淵（Challenger Deep）之深度可達11,034公尺。海溝的底部被沈積物所填平。海溝兩側有許多斷層造成台階地。海溝的斜坡在靠近陸地的這一面要比靠洋的一面來得陡。

此外，在太平洋的西側，海溝靠近陸地側會產生一連串的島弧；但在太平洋的東側，這些島弧被陸上的山脈所取代；這些島弧和山脈都是因海洋板塊隱沒於大陸地殼之下，受到高熱而熔融後，沿著裂隙上升，在地表隆起所形成的火山。大陸邊緣之各種地形，常有許多峽谷切過，稱之為海底峽谷。這些峽谷多半是陸上的河流向海底延伸形成的。在大陸隆堆上的海底峽谷之出口處，多半有沖積扇的堆積。海底峽谷除了延伸的河谷之外，也會因斷層、濁流等其他原因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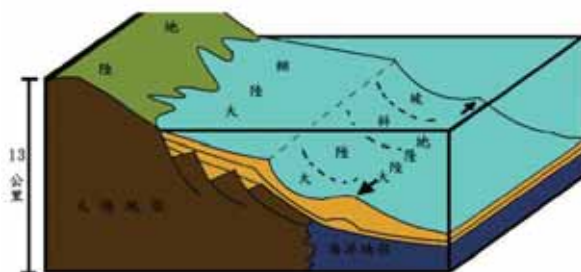


圖1 大陸邊緣的海底地形。（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教育網）

## 二、臺灣週邊海域的板塊運動與海底形成：

台灣位於太平洋的大陸邊緣上，但其大陸邊緣的海床地形並不是典型的太平洋型，反而與大西洋型大陸邊緣相類似，這種特殊的海洋地形是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相碰撞而造成的（圖2），這個交界面，即在「琉球-台灣-菲律賓」島弧系列上的轉折點；因此，台灣四周的海底地形與板塊運動息息相關。在台灣四周有關的板塊構造單元包括：亞洲大陸邊緣（亦即東海大陸棚）、沖繩海槽、琉球島弧、琉球海溝、菲律賓海海盆、綠島至巴浦耶海脊，馬尼拉海溝及南海海盆（圖3）。

台灣陸上的中央山脈是因為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碰撞而隆起，這使得台灣海峽北部形成一個堆積的海盆；這個海盆可分成三個盆地：台灣以北，東海大陸棚下的「台灣盆地」、介於北港-澎湖基盤高區和觀音陸棚之間的「北部盆地」、北港-澎湖基盤高區以南至台灣灘之間的「南部盆地」。

台灣東部外海則為一連串複雜的構造帶，台灣東部的海岸山脈即為菲律賓海板塊之前緣，這板塊向西北之擠壓力，使得台灣西南方之基盤下陷，同時造成從義竹到台灣灘之間的東北-西南走向之旋轉斷層，北部盆地受到此擠壓的影響也產生構造變形；這些海盆上堆積著大量的沈積物，單單新生代期間（最近6,500萬年）就沈積了2公里以上的厚度。這些沈積物主要都是從中國大陸被沿岸流所帶來的。<sup>3</sup>

## 貳、臺灣週邊海域的海底地形概況

台灣因地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洋板塊交錯帶，地形構造複雜，有海脊、海盆、海溝、海底峽谷、斷層、火山及平坦等各種地形分佈，雖其是位於島弧中一個不算大的小島，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對研究海洋地質的科學家而言，已更凸顯出其重要性。

台灣四周的海底地形非常複雜，以空間分布特性，分區概述：臺灣北部海域（包含東海）、臺灣海峽、臺灣東部海域、巴士海峽及南海等5部份（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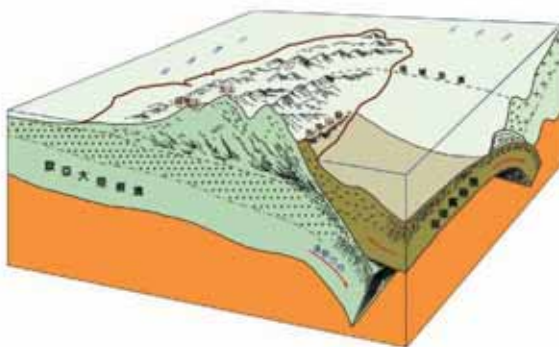


圖2 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相碰撞而造成台灣島。  
(資料來源：<http://tw.myblog.yaho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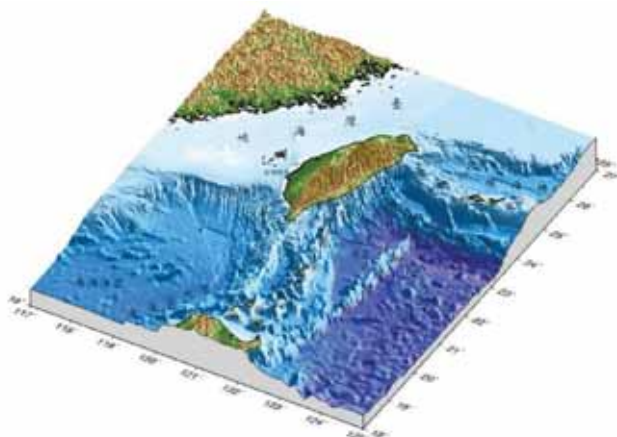


圖3 臺灣週圍數值地形立體投影圖。(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 一、臺灣北部海域：

本區水域位於台灣北端，北接東海，與西太平洋相通，其海底地形係由西北向東南大幅下降的大陸斜坡，其大陸坡僅下降至2千多公尺的沖繩海槽，海槽最深為2,270公尺，沖繩海槽是一個島弧後的海盆，本區西北屬淺水海域，東南屬深水海域（圖5）。

本區西北海域，水深100公尺的等深線從台灣北端經彭佳嶼北方，往東北一直延伸至韓國濟州島的南方，水深200公尺的等深線從台灣東北角經彭佳嶼南方，向東北延伸至日本九州的南方；這個深度內的範圍都是平坦的大陸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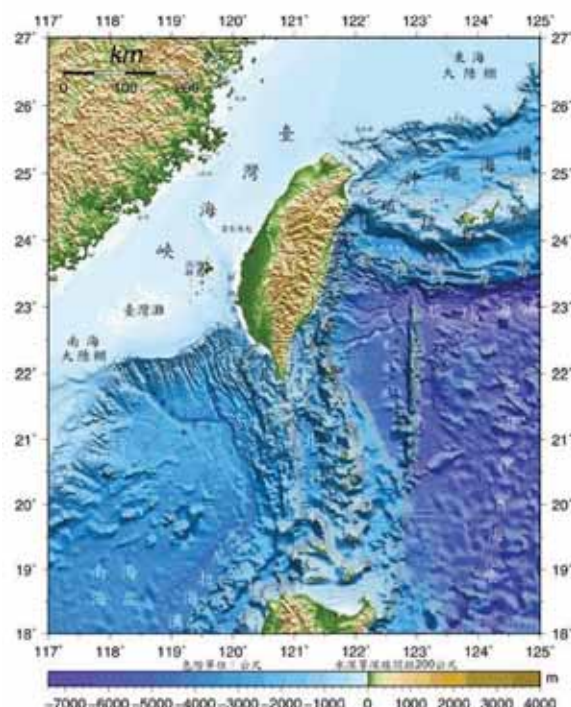


圖4 臺灣週圍海域地形圖。（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本區東南海域，水深由50公尺急降至800公尺後，再緩降至1,600公尺，平均水深約800公尺，其主要地形為沖繩海槽橫切在大陸棚邊緣與琉球島弧間，形成以蘇澳外海向東北方延伸的陡峻海溝，水域內有基隆海谷、棉花峽谷及北棉花峽谷等明顯地形，琉球島弧由日本南方一直延伸到宜蘭外海，咸信龜山島就是琉球島弧的最西端；東海大陸斜坡上則有許多海底峽谷發育，包括基隆海谷、棉花峽谷和北棉花峽谷等。

## 二、臺灣海峽：

台灣海峽之深度絕大部分淺於100公尺，屬淺水海域，臺灣海峽北端，北接東海，其海底地形係為平緩的大陸棚，水深由50公尺至100公尺，平均水深約80公尺（圖6）；100公尺的等深線從台灣北端經彭佳嶼北面，一直往東北延伸至韓國濟州島南面；200公尺的等深線也從台灣東北角經彭佳嶼南面，向東北延伸至日本九州之南；淡水河西北方離岸40至50公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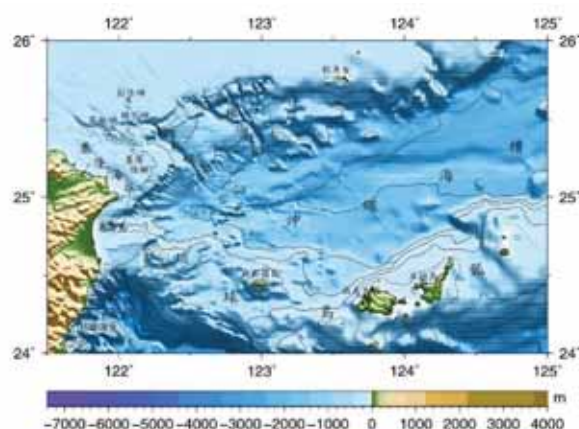


圖5 臺灣東北部海域海底地形。（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外的海床上，有一處比較深的凹地，該處的水深可超過100公尺，被稱為「觀音凹陷」。

澎湖群島週邊海域，其海底地形係由北向南大幅下降的大陸坡，水深由50公尺緩降至200公尺後，平均水深約100公尺，屬淺水海域。澎湖群島四周的海床則有許多礁石，深度變化稍微大一些，澎湖群島與台灣島之間，是一個北窄南寬的海槽，叫做「澎湖水道」，也就是漁民俗稱的「黑水溝」，澎湖水道為一細砂質海床，其水深介於100至200公尺之間。

澎湖群島西南方有一處淺灘，稱為「台灣灘」，水深淺於40公尺，屬於淹沒的水下丘陵，最淺的地方大約只有10公尺，低潮時甚至

可能會露出水面；台灣灘的東邊為東北-西南走向之「八罩水道」；<sup>4</sup>濁水溪外海為一分布廣範的沙質海床，深度不及40公尺，這個海床上的沙質沈積物主要自於濁水溪；台中至安平一帶外海，距岸15公里以內，水深都不及40公尺，沿岸淺灘以及堰洲島散布很廣，適宜作海埔新生地。

台灣海峽南端，南接南中國海、東接巴士海峽，且與太平洋相通，其海底地形係由北向南大幅下降的大陸坡，水深由50公尺急降至1千公尺後，再緩降至3千公尺，平均水深約1,200公尺，屬深水海域。澎湖群島以南是被動型大陸邊緣的海底地形，水深從100公尺下降到高雄西方外海200公尺的大陸棚邊緣，再往南則為坡度介於3至16度之間的大陸斜坡，稱為「高屏斜坡」，其上有高雄峽谷，它橫切過此大陸斜坡，高屏溪所挾帶之砂泥，使這個峽谷愈切愈深。<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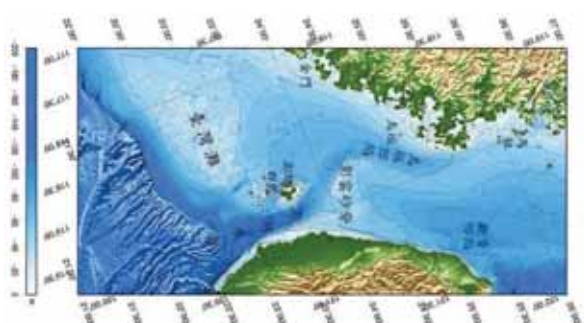


圖6 臺灣海峽海底地形。

(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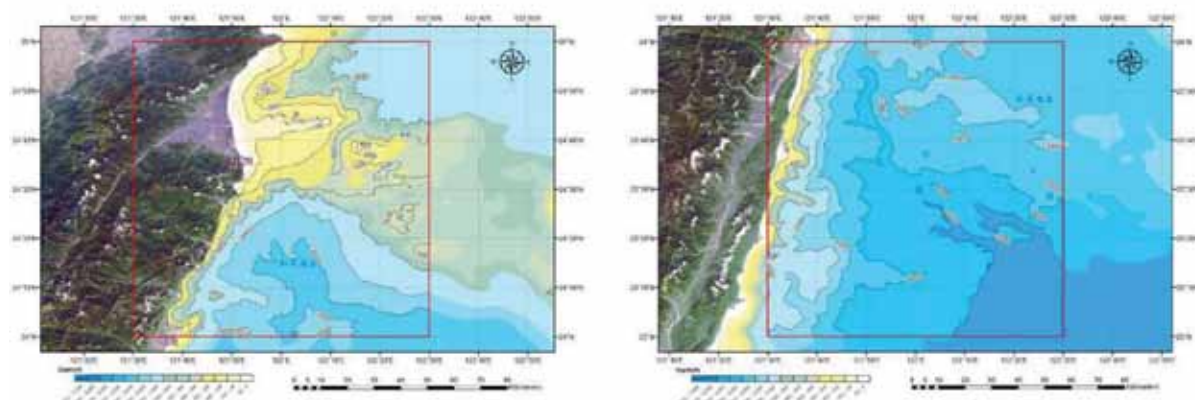


圖7 (左)蘇澳沿海海底地形；(右)東部近海海底地形。(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 三、臺灣東部海域：

台灣東部海底的深度變化極大，沿岸無大陸棚、大陸坡陡降，自蘇澳以南至花蓮附近，鄰近海岸水深即達1千公尺、再向東驟降至3千公尺、離岸25公里則可驟降至5千公尺以上，本區平均水深約3千公尺，最深處達6千公尺；海底地形屬板塊隱沒區，包括島弧、海脊、海槽和海溝，均呈東西走向。以下再細分3區說明：

#### (一) 蘇澳沿海：

本區水域位於台灣東北端，北接東海，東與太平洋相通，其海底地形係由西向東大幅下降的大陸坡，水域內有和平盆地及琉球島弧等明顯地形，水深由50公尺急降至2千公尺後，再緩降至3千公尺，屬深水海域，海流較急（圖7左圖）。

宜蘭外海的龜山島，一般認為是琉球島弧（琉球群島）之西端，從蘇澳外海往南是一寬廣的海盆，稱為「南澳海槽」，它的水深介於

2至3千公尺之間，是由弧前海盆構成，由東至西依序為：和平海盆、南澳海盆、東南澳海盆。南澳海槽之南，即為水深在4至6千公尺之間的「琉球海溝」，這個海溝的西端因被台灣陸上所流下來的沈積物充填，在花蓮東南外海20公里處，這個海溝就被填平了，琉球海溝之西端可能與台東縱谷之北端相連，成為菲律賓海板塊之西北界線。

#### (二) 東部近海：

本區水域位於台灣東部，水域內有花蓮峽谷等明顯地形，其海底地形水深由50公尺急降至5千公尺後，地勢陡峭，屬深水海域（圖7右圖）。

自蘇澳以南至花蓮附近，1千公尺等深線接近海岸（如花蓮北方的和平，1千公尺等深線離岸不及5公里），且1至3千公尺間的等深線間隔甚密；花蓮至台東之海岸山脈外海的大陸斜坡上，有不少海底峽谷切割過，這些海底峽谷多半是在大陸棚邊緣所堆積的砂石，經地震而形成濁流，在大陸斜坡上向下切割而形成的。

#### (三) 大武沿海：

本區水域位於台灣東南端，南接巴士海峽，東與太平洋相通，水域內有南縱海槽等明顯地形並有綠島及蘭嶼等島嶼是地形顯著區域，其海底地形水深由100公尺急降至1千公尺後，再急降至4千公尺，平均水深約2千公尺，屬深水海域，海流較急（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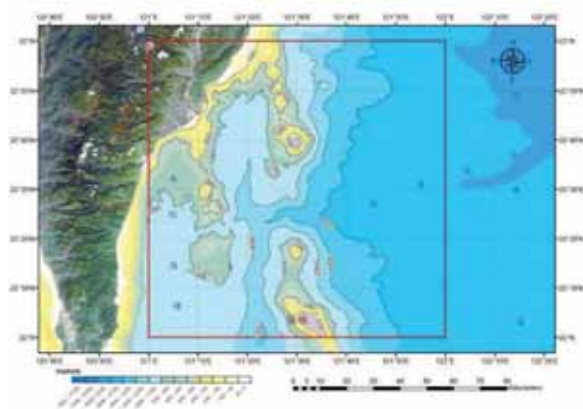


圖8 大武沿海海底地形。（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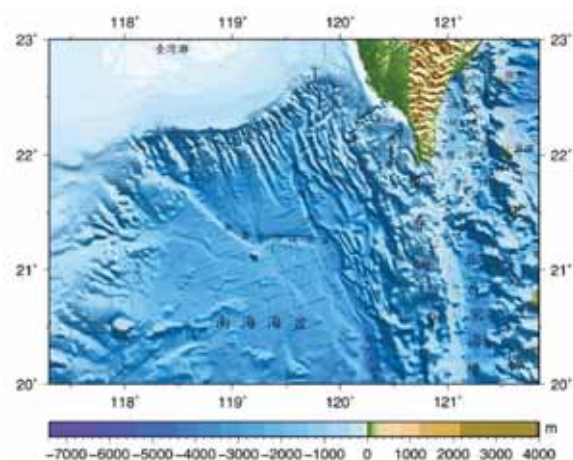


圖9 巴士海峽海底地形。

(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台灣東南外海與綠島、蘭嶼之間的海床上，為海脊和海槽相互平行的地形，恆春海脊是台灣陸上中央山脈之南延；南縱海槽則為台東縱谷向南延伸的地形、花東海脊為台灣東部海岸山脈向南延伸的地形、台東海槽為一弧間海盆，位在呂宋島弧和花東海脊之間，深度達2500公尺、呂宋島弧為一火山島弧，往南可以一直延伸至菲律賓東北的巴浦耶火山弧，而露出海面的地形就是綠島、蘭嶼和小蘭嶼等。綠島和蘭嶼之間其實並不連貫，中間突然下沉到3千公尺深，顯然這兩個島是在不同時期形成的。在呂宋島弧的東方，就是深度達4千公尺的菲律賓海海床。

#### (四) 巴士海峽：

本區水域位於巴士海峽，西接南中國海，東與太平洋相通，水域內有高屏峽谷、枋寮峽谷及恆春海脊等明顯地形，其海底地形水深由50公尺急降至1千公尺後，再降至3千公尺，平均水

深約1千公尺，屬深水海域，海流和緩（圖9）。

大陸斜坡（高屏斜坡）上有高屏峽谷切過，由高屏溪所挾帶的大量泥沙，使這個峽谷愈切愈深，另有一系列海底峽谷，由西北至東南依次為澎湖峽谷、壽山峽谷、高雄峽谷、高屏峽谷、枋寮峽谷及紅柴峽谷；由於這些海底峽谷具有陡峭、狹窄的地形，因而形成特有的水文、地質及生物特性。恆春海脊是中央山脈向南延伸的地形，南縱海槽則為台東縱谷向南延伸的地形。

### 五、南海海域概況及海底地形：

南海即為「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因位居中國大陸南側得名；其東西寬約1,500公里，南北長約2,700公里，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半封閉海域(semi-enclosed sea)，面積有35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邊緣海（圖10）；地形非常不規則，平均水深約為1,212公尺，西部、西南及南方較淺，水深不及200公尺，中央深海平原水深則達4千公尺，最深處甚至達5,559公尺，海盆平均水深有3,500公尺。<sup>6</sup>環接南海邊緣的陸地，西瀕中南半島、南臨馬來西亞、蘇門答臘及婆羅州、東接菲律賓群島，北以台灣海峽鄰接東海，西南則依序以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巽他海峽(Sunda Strait)、龍目海峽(Lombok Strait)及望加錫海峽(Makassar Strait)鄰接印度洋，東南以巴拉巴克海峽(Balabac Strait)鄰接蘇祿海(Sulu Sea)，

東以呂宋海峽(Luzon Strait)鄰接太平洋；沿岸週邊共有9個國家，依逆時鐘次序為：中共、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汶萊、菲律賓及中華民國（台灣）。

南海的海底地勢西北高，東部和中部低，深度比渤海、黃海或東海都要深，除了北、西、南等三面靠陸地附近的地形較平緩外，中部和東部水深大都在2千公尺以上，最大深度5千5百餘公尺。南海海盆四周邊緣分佈著大陸棚；大陸棚以外為階梯狀下降的大陸坡，南海大陸坡圍繞著海盆四周可分為4個區：北陸坡、西坡階地、南陸坡和東陸坡。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島等即為分佈在大陸坡山脊上的礁島，在大陸坡的終止處進入南海深海盆地。分布於大陸棚的外側，一般位於水深150至3千5百公尺之間，地勢向中央海盆呈階梯狀下降。<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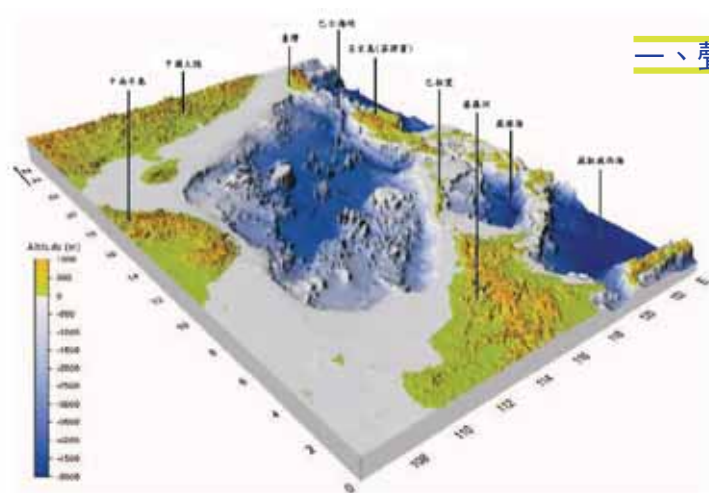


圖10 南海海底地形立體圖。  
(資料來源：Wang and Li 2009，作者修訂)

## 參、海底地形的測量方法

為了精確的掌握海底地形起伏，需以艦艇或各類水上載具實施水深量，一般海洋測量艦均安裝有淺、中、深海測深儀，其測深能可從2公尺至1萬2千公尺，同時具有多波束測繪系統，可快速、精確進行測深作業，大幅縮短作業時間並配合資料處理軟體，於艦上作業即可繪出海底三度空間立體地形圖（圖11）。此外，目前也有以飛機空載的測深光達做為近岸海域、河川、湖泊等較淺水域的測深手段，以取代傳統水深測量方法。

水深測量係以點或線之方式進行，即使點與線之密度很大，對某些特殊地形地物，如突礁、沉船等障礙物，仍然會有遺漏之可能。故過去對某一特定海域或因特別之需要，除做一般水深測量外，常須另作掃海測量，目前因水中音響儀器進步，此等傳統掃海測量，已由側掃聲納測量所取代。<sup>8</sup>

### 一、聲納測深系統(單波束)：

聲納系統按發射聲源之有無可分為主動與被動二類型。主動聲納系統本身發射聲波，同時監聽此聲波在遇到障礙物時所產生之回聲；被動聲納系統本身並不發射聲波，僅監聽存在於介質中之聲響。對於一般之主動聲納系統（如：測深儀、側掃聲納等）而言，基本上可包含四個部分，即：轉換器

(transducer)、發射器(transmitter)、接收器(receiver)、與控制及顯示裝置(control/display)。

聲納系統的核心部分為可將能量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的轉換器。對於大多數聲納系統而言，此部分為一壓電晶體(piezoelectric crystal)，此晶體為一種陶瓷材料，當作用於外加電壓時，會改變其物理形狀。此裝置能將發射器所產生之振盪電場轉變為機械振動。此種振動以振盪壓力的形式傳入水中，即所謂的聲脈波(sound pulse)。聲波依循水之聲學性質往遠離聲納系統的方向傳播，當觸碰到海床或水中之目標物時，此聲波的一部分會反射回聲納系統並感應轉換器。

用來產生聲脈波的轉換器同時也是用來監聽回聲的裝置。在監聽回聲時，轉換器中之材料感應聲壓的變化，並將此種振動轉換成電能。此電能將由聲納系統中之接收器加以偵測與放大。

此外，整個聲納系統尚需包含能進行控制功

能的單元，此單元在於精確計時，使各個部分之運作能同步進行。通常，此單元皆包含可顯示所接收之訊號的顯示裝置。聲納系統事實上並非量測深度或距離，其真正量測與顯示的為所發射的聲納脈波由轉換器出發到達目標物後再折回轉換器所需的傳播時間。因此，聲納系統的精確性決定於量測此時間之準確程度上，而轉換器與目標物之間距與脈波傳播時間及聲速有關。

## 二、多波束測深儀(Multi-beam Sonar System)：<sup>10</sup>

一般常見的測深儀只有一個垂直向下的波束，只能測量船體正下方的水深；傳統上，吾人所取得海底地形的的方式即是利用此種單波束測深儀，航行在預定的測線上。從水文量測學者的觀點來看，所測得的資料欠缺測線間的水深資料。

在不需要精密海床地形的狀況下，使用單波束測深儀足敷需要，然而如果要求海洋測量船快速測量一個大範圍的海域，則需要採用多波束測深儀。新式的多波束測深儀可以涵蓋一定寬度的海床，更能提高資料的精確度(圖12)。多波束測深儀的工作原理是由探測船上的聲納系統向海底發射出許多短脈衝聲波，每個波束的角度非常窄小，當聲波觸及海底反射回去，為測深儀內接收波束來接收。典型的多波束測深儀的波束寬度為2至3度，接收波束的總數約60至160個，每一個波束即等於一個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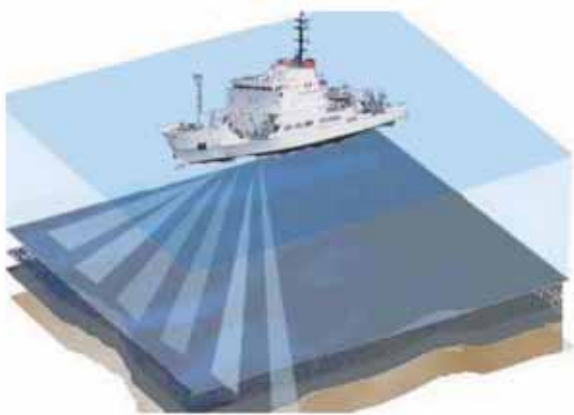


圖11 海洋測量艦測深儀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海軍艦隊海洋測量艦海測作業手冊)



深的音波，因此能繪出完整的大區域海底地形圖。

一般配置以高頻及低頻兩組多波束測繪系統，其中，使用低頻頻率，適用於深海；使用高頻率的多波束測繪系統，適用於淺海。兩系統具有互補作用，可使海洋測量艦的測量工作更方便且精確。

### 三、側掃聲納 (SSS, Side-Scan Sonar)：

側掃聲納系統係應用聲波反射的原理所設計之水下與海床探勘儀器，其有效探勘範圍約可達探測航線兩側各百公尺寬之帶狀區域。此系統在海床地貌描繪、海床表層沉積物性質判別、以及海床上與水中目標物搜尋等水下工作上，均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以側掃聲納系統進行探測時，有關目標物判定的基本原則包括：目標物與海床聲波信號反射強度對比、聲學陰影、以及目標物外形與分布特徵等項目。

側掃聲納系統能有效獲取海床資料，但海床目標物的判別與辨識仍以人工目視方式為主。對於大範圍之海床探測與搜尋工作而言，需耗費大量人力及物力。因此，需發展自動化的處理程序進行聲納影像中海床底質與人工目標物的辨識，以更有效的提升海洋探測技術與品質。<sup>11</sup>

### 四、空載測深光達 (Airborne Bathymetric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空載測深光達技術作業範圍係以近岸海域、

河川、湖泊等較淺水域為主，取代傳統水深測量方式，但除可在短時間內完成大範圍水深測量外，其回跡強度(Backscatter)的資料更可用來分類近岸海床或海底沉積物(圖13)。

一般原理來說，光達系統可分成兩個單元，綜合雷射、掃描、構成「雷射掃描儀」，直接定位系統則為另一單元。雷射產生器(一般為NdYAG)可產生穩定、適當功率之脈衝雷射，其波長為紅外波段(1064奈米)的雷射光，可使用於地形測量上的應用；但是該波段對水體之穿透力低，故無法應用於透水要求之作業。因此，應用非線性光學中的「倍頻現象」，意見某些物質具有非彈性散射之性質，使出射波之波長與入射波波長不同；再選定部分物質之出射波之波長為入射波波長之一半，亦即出射波之頻率為入射波頻率之一倍，即可應用於測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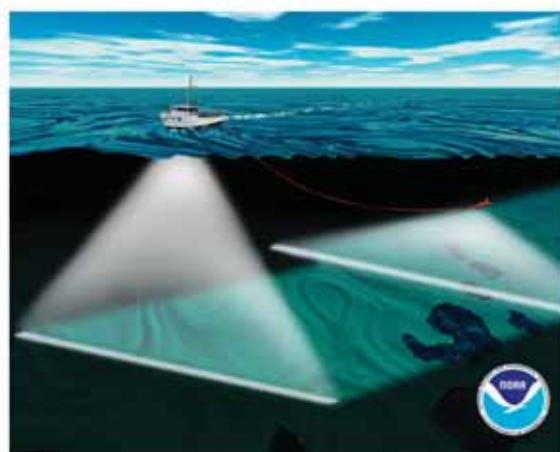


圖12 側掃聲納配合多波束測深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NOAA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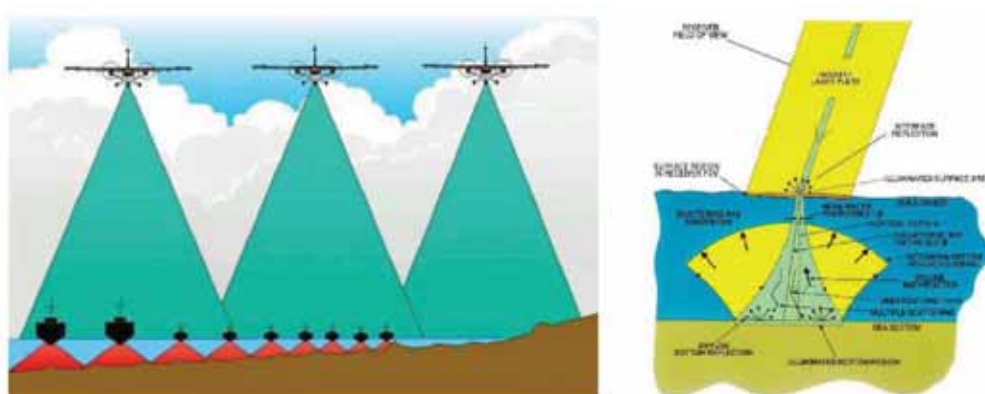


圖13 (左)空載測深光達的效益；(右)測深光達波長原理。(資料來源：Guenther, et al., 2000)

雷射產生器的紅外波段雷射波，若經倍頻後可得到綠光波段的雷射波(532奈米)，具有透水能力。使用綠光波段構建之光達系統，可用以進行水深與水底地形測量。倍頻過程並非效率百分之百，如其效率為50%，則出射波中含有50%綠光、50%紅外光。同步射出後，在接收時分光，分別數化，可得各自之波形觀測量。紅外光之反向散射僅限於水面部分，可提供水面高程資訊，綠光可由波形辨識水面與水底，由而求得水深與水底地形。前者之回訊用於水面之偵測，用以確定雷射到達水面之時間；後者之回訊用於分析水底所在。<sup>12</sup>

## 肆、公開資源的海底地形資料庫及標準地名

### 一、國內外的海底地形資料庫：

#### (一)全球地形高程資料集(ETOP01)：

「美國國家地球物理資料中心」(NGDC,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是「美

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層管理局」(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的下屬機構，<sup>13</sup>負責管理美國政府的海底地圖以及全世界海岸、大陸架和深海的其他資料，於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1分格網數值地形資料(ETOP01)<sup>14</sup>，和新的海底地形資料顯示器(Bathymetry Data Viewer)，<sup>15</sup>包含海底深度及陸上高程的地形資料庫，給全世界科學家於全球大範圍的研究(圖14)。

#### (二)通用大洋海底地形圖(GEBCO)：

本項資料集係由「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與聯合國下屬的「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共同設「世界通用大洋海底地形圖製作委員會」(Joint IOC/IHO Guiding Committee for GEBCO)，以協調各國家的海圖管理繪製主管機關，合編製全球官方通用的大洋海底地形圖(圖15)。<sup>16</sup>

### (三)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了收集並保存國內海洋研究調查成果，於民國76年，委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代為建立及運作「海洋資料庫」。歷經不斷發展，主要任務是彙整國內各研究船之探測資料，並系統性地分析、整理與展示、支援各界所需，資料項目包括有水文、海流、水深、震測等（圖16）。資料庫建立初期，以國科會研究計畫方式執行；民國78年起，計畫續奉國科會指示併入「海研一號貴重儀器使用中心」並正式使用「水文資料庫」名義；民國86年，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受國科會委託執行「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籌備計畫，資料庫亦逐漸轉由「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運作；民國97年「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轉型為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之「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資料庫則轉由國科會自然處海洋學門管理，現任主持人為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所長戴昌鳳教授。<sup>17</sup>

### (四)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97年，主要任務為建立研發平台以深化海洋研究，並做為政府的海洋科技幕僚，全面掌握海洋環境，為政府海洋施政提供科技資訊；發展海洋前瞻科技，建立堅實的海洋科技研發能量，促進國家海洋永續發展。其為推廣海洋認知與提供國內海洋科學教育於全球觀方面的素材，並適合於海洋科學方面的基礎教材和研究討論之背景資訊，於民國98年12月，整編繪製「中英文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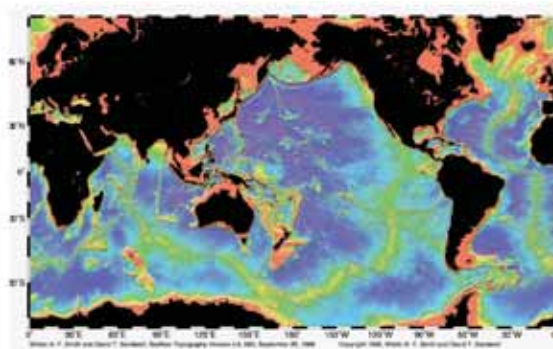


圖14 全球數值地形資料。（資料來源：美國NGDC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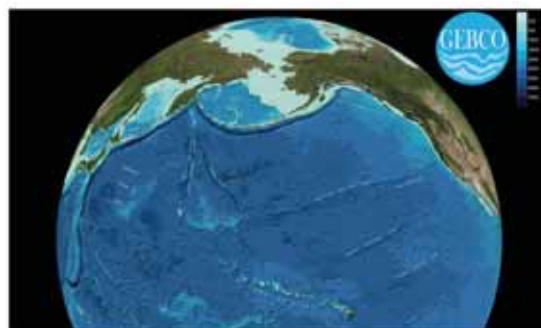


圖15 北太平洋海底地形示意。（資料來源：GEBCO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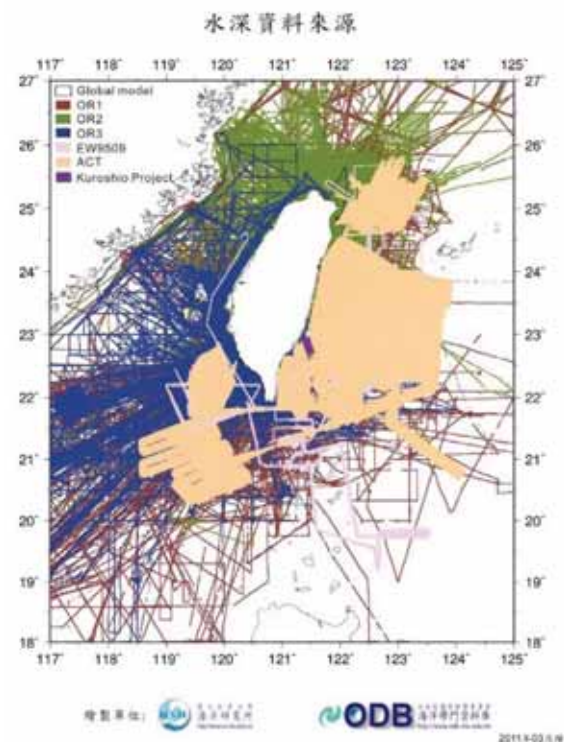


圖16 海洋學門資料庫水深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委員會海洋學門資料庫）



球海底地形特徵圖」（圖17）。<sup>18</sup>

此外，為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家應設置國家海洋科學和技術中心，及落實推動「國家海洋資料庫」建置、促進海洋資訊共享與應用之任務，在原「海洋資料中心聯合目錄」資料庫（原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以及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後續改善與開發的工作，希望朝向分散式海洋資訊網的技術架構發展。<sup>19</sup>

## 二、海洋標準地名：

我國的標準地名是依據《國土測繪法》第29條第2項頒訂《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其中對：自然地理實體（指因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為政府機關統一使用者，應定標準地名。<sup>20</sup>其權責機關在內政部（方域司），在「推動地名標準化與地名管理工作」業務項下：為因應國際推動地名標準化與地名管理潮流，本部業依國土測繪法第29條及第30條規定發布「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及「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規範有關標準地名之訂定與地名管理相關程序，作為我國推動地名標準化及地名管理法制基礎。然而，對於海域的自然地形的專用標準名，納入尚少。

國外的部份，則以「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所出版的《海洋與海域界限》（特別刊物第23號）為最早且最為廣泛使用，<sup>21</sup>該文件目前正在進行第4版的修正；前文提到的「世界通用大洋海底地形圖製作委員會」（Joint IOC/IHO Guiding Committee for GEBCO），也設有海底地名稱命名小組委員會，已針對全球海底地理進行統一的英文命名，包含了多數的洋脊、海盆、海溝、海底火山群和海底高地，公布了全球共3473個海底地名。<sup>22</sup>我國的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在繪製前述「中英文全球海底地形特徵圖」時，亦對照中文通用或標準譯名以及參考教科書內容，訂出中文海底地名，並將地名主題放在尺度較大的海底、全球海域及十大島嶼的名稱。

## 伍、結語

海底地形包括了大陸邊緣、洋底盆地和分裂洋脊等主要部份，臺灣島因位於太平洋西側的大陸邊緣上，週邊海域的主要海底地形包括了大陸棚、大陸斜坡和大陸隆堆等；此外，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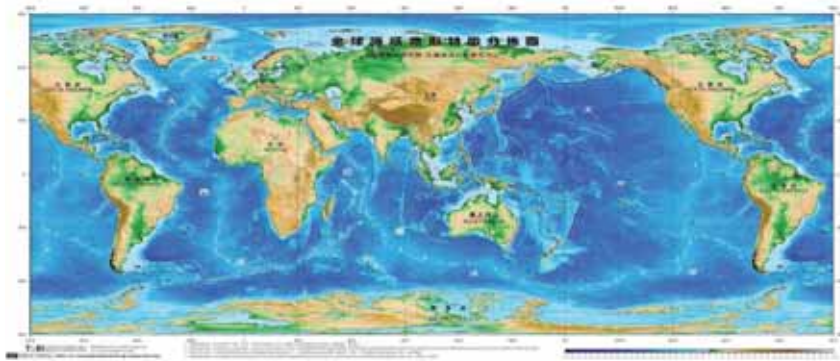


圖17 中英文全球海底地形特徵圖。（資料來源：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週邊海域的海洋環境影響因子非常多，造成極為複雜多元的環境，海洋環境資料因而極為龐雜，需有系統且長期的觀測、歸類、分析、彙整與儲存。

對於各類型的海洋運用，無論是海洋資源開發、研究、海岸空間利用、海洋環境變遷預測、環境影響評估、漁業談判、海洋污染求償等議題，皆須運用到具統合性與完整性的海洋資料；我國目前尚未有法定的機構（如海洋法公約律定的沿海國家海洋科學和技術中心），專責發展、取得和傳播海洋科學和技術的資料；此外，我國海洋調查研究則由各單位進行個別規劃，尚待整合分配，觀測所得的資料散佈於各產、學、官、研單位，尚待合作共享；若能及早建立資料庫整合平台及資源共享機制，為科學化、系統化的保存與處理海洋資料庫系統，可有效落實海洋環境資源運用及保護。

- 1 Liu, C. S., S. Y. Liu, S. E. Lallemand, N. Lundberg, D. Ree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Offshore Taiwan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s〉(1998),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TAO》, vol. 9, No.4, pp. 705-738.
- 2 范光龍, 〈台灣附近的海域〉, 《科學月刊》(臺北市:民國77年5月), 19卷5期, 頁348 (網址<http://210.60.226.25/science/content/1988/00050221/0010.htm>,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3 范光龍, 〈台灣附近的海域〉, 《科學月刊》(臺北市:民國77年5月), 19卷5期, 頁348 (網址<http://210.60.226.25/science/content/1988/00050221/0010.htm>,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4 曾鼎乾, 《南海北部大陸架第三系》(廣東科技出版社, 1981年), 260頁。

- 5 陳民本, 〈台灣海峽南部大陸斜坡沈積物之物理性質和沈積環境〉, 《台大海洋研究所研究報告》(民國72年), 第14卷, 頁42-63。
- 6 陳鎮東, 《南海海洋學》(臺北市: 渤海堂, 民90年11月初版), 頁1。
- 7 Pinxian Wang and Qianyu Li, 《The South China Sea: Paleogeography and Sedimentology》(USA: Springer, 2009), pp. 26-28. 另見, 陳鎮東, 《南海海洋學》(臺北市: 渤海堂, 民90年11月初版), 頁46。
- 8 海軍總司令部, 《海軍艦隊海洋測量艦標準組織規程手冊》(民國88年8月), 國軍準則-海軍-1177, 頁5-12。
- 9 海軍總司令部, 《海軍艦隊海洋測量艦測作業手冊》(民國90年6月), 國軍準則-海軍-1274, 頁8-1。
- 10 海軍總司令部, 《海軍艦隊海洋測量艦測作業手冊》(民國90年6月), 國軍準則-海軍-1274, 頁7-1。
- 11 田文敏、田文正, 〈水下靜態目標物之搜尋、辨識與定位—以側掃聲納系統進行德基水庫直昇機殘骸之搜尋作業〉, 《海下技術季刊》(民國89年6月), 第10卷第2期, 頁28-36。
- 12 Guenther, Gary. C., Robert W. L. Thomas and Paul E. LaRocque,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Achieving High Accuracy with the SHOALS Bathymetric Lidar System〉, V.I. Feigels, Y.I. Kopilevich, Editors, 《Laser Remote Sensing of Natural Water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1996), Proc. SPIE, Vol. 2964, pp. 54-71.
- 13 參考美國官方網站翻譯。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發佈新的地球海底圖像〉, 網址:<http://iipdigital.ait.org.tw/st/chinese/article/2012/04/201204234447.html#axzz2JtS521Nu>,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14 14 NGDC, 〈ETOP01 1 Arc-Minute Global Relief Model: Procedures, Data Sources and Analysis〉, 《NOAA Technical Memorandum NESDIS NGDC-24》(March 2009), p. 19 (網址<http://www.ngdc.noaa.gov/mgg/global/global.html>,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15 參見Bathymetry Data Viewer網站, 網址<http://maps.ngdc.noaa.gov/viewers/bathymetry/>,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16 參見GEBCO網站, 網址<http://www.gebco.net/>,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17 參見「海洋學門資料庫」網站, 網址<http://www.odn.ntu.edu.tw/>,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18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中英文版全球海底地形特徵圖整編繪製完成〉(民國98年12月15日), 網址:<http://www.tori.narl.org.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38>,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19 參見「全國海洋資料共通平台」網站, 網址<http://todnet.tori.org.tw/>,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20 內政部, 民國97年1月30日台內地字第0970016243號令發布「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理辦法」明訂:  
第2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聚落: 指因人文、歷史風貌或地方特色而形成之區域。  
二、自然地理實體: 指因天然作用所形成之地形。  
三、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 指在地理上具有指標性質之行政、交通、水利、電力、生活、產業或文教休閒等公共設施。  
第3條 地名具有地理、歷史、語言、風俗習慣、原住民族傳統或地方特色, 為政府機關統一使用者, 應定標準地名。
- 21 IHO, 《Limits of Oceans and Seas》(Monte-Carol Monaco: 1953, 3rd edition), Special Publication No. 23, p. 38.
- 22 參見GEBCO Undersea Feature Names 網站, 網址[http://www.gebco.net/data\\_and\\_products/undersea\\_feature\\_names/](http://www.gebco.net/data_and_products/undersea_feature_names/), 檢索日期: 民國102年2月1日。

# 精益求精 落實聯興演習之作為

著者／曹正綱

陸軍官校21期、陸戰隊學校指參班7期、三軍大學戰爭學院59年班  
曾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部隊指揮官、海軍總司令部作戰署署長  
現任陸戰隊學校講座

## 壹、前言

就當前的國際局勢觀察，國家仍然存在著戰爭的威脅，尤其是南海方面。中共有鑑於此，現正在其所屬南海島嶼實施島嶼作戰訓練與演習（聯合報導）。我國軍又豈能坐視。

聯興演習，乃係進訓兩棲基地梯旅的期末演習，含有訓練成效驗收與兩棲作戰能力考評之雙重目的。必須『真實來做』且『嚴格評核』，方能達到目的。

兩棲作戰乃係三軍聯合作戰形態，三軍應有同舟共濟，生死與共的整體觀念。故自訓練開始到計畫作為、全程演練即需密切協調配合，在聯合兩棲特遣部隊指揮官統一協調管制下，共同遵照國防部訂頒之《兩棲作戰教則》進行。

## 貳、需有明確的演習目標

### 一、驗收進訓梯旅訓練成效：

聯興演習，應驗收陸戰隊梯旅指揮官與幕僚計畫作為能力，部隊官兵對兩棲作戰執行能力等訓練成效。

### 二、評鑑三軍聯合作戰效能：

聯興演習雖以進訓之陸戰梯旅為主，但係三軍聯合作戰型態，故於演習中，對三軍應作整體評鑑。

### 三、能與國軍全般戰略構想相結合：

部隊訓練是為了作戰，國軍當前的兩棲作戰使命判有下列各項：

（一）支援與歸復外島作戰，並以東、南沙為首要目標地區。

（二）以假設敵姿態，促進台灣本島各地區防衛部隊作戰能力及測試台灣周邊可供登陸海難狀況，可供防衛部隊兵力配置之參考。

（三）在台灣防衛作戰中，需向某方面增援，而陸上交通受阻時，於敵戰略翼側登陸，支援防衛部隊作戰。

## 參、基本要求

### 一、真實：一切作為符合實戰要求。

（一）計畫絕不准抄襲，必須依據初動訓令賦予聯合兩棲特遣部隊使命與兩棲目標地區有關敵



情、地形、海灘、水文等狀況，切實策訂。

(二)三軍所需兵力、裝備與補給品，必須按計畫數參演，不宜假設。如為節約兵力，登陸部隊可減為一個『登陸加強步兵營』來實施，旅級則以計畫作為與兵推替代。

(三)演習宜與地區防衛部隊實施『實兵對抗』，而非指揮所對抗。溯自65年聯興第一號演習開始，奉國防部要求，進訓『梯團』期末演習，皆係與全島及澎湖防衛部隊實施實兵對抗演習。

(四)登陸部隊對待命舟波登陸、情報蒐集、支援火力、補給品、傷患後送等之申請與送補必須實做，不可以書面作業替代。以磨練幕僚與部隊作業能力。

(五)選擇下卸與一般下卸申請及岸勤對補給品之堆積、處理，送補等均宜要求實物實做。

(六)如海灘狀況不良，必須依需要架設浮箱棧橋，供LST靠駁下卸。

(七)攻擊發起線（即控制艦停泊位置）不宜少於四千碼。泊地內，運輸艦船停泊位置不得少於15000碼。以減少敵岸炮火損害。

(八)計畫架次內密支空軍，必須由空軍前進指揮官管制運用，申請臨空飛機，切實依地面ACT（空軍管制組）之指導實施攻擊與脫離。ASDC（空軍前進指導中心）於火力管制權轉移至登陸部隊後，宜即轉移至登陸部隊指揮所附近實施作業。

(九)登陸部隊指揮官之指揮、參謀作業、部隊行動等等均須實做，不宜以口述替代。

(十)演習須待登陸部隊達成作戰任務，方可結束。

## 二、三軍密切協調：

眾所周知，兩棲作戰乃係三軍聯合作戰，登陸部隊自裝載、海上機動、艦岸運動、突擊登陸無不需海、空軍之支援與配合。三軍分別執行下列任務：

登陸部隊為：1、登陸 2、攻佔 3、防守與掩護。

海軍部隊為：1、運送 2、支援 3、掩護。

前進空軍為：1、掩護 2、支援。

而三軍之相互協調支援之起始則自『初動訓令』開始。國防部依據『全般戰略構想』需頒布初動訓令，編組『聯合兩棲特遣部隊』，含海軍部隊、登陸部隊、前進空軍部隊及依據各軍種司令之推荐，發佈三軍指揮官與特遣部隊指揮官（兼海軍部隊指揮官），指定『兩棲目標地區』（即概定之登陸地區）與聯合兩棲特遣部隊使命，登陸目標日期（在某一旬內），特遣部隊指揮官職責等為發起兩棲作戰等基礎狀況之指示。並以正本送聯合兩棲特遣部隊指揮官，副本分送三軍指揮官與各軍種司令及相關單位。（請參閱國防部頒行之《聯合兩棲作戰教則》第12001、12002、31006條）。

三軍指揮官接到初動訓令後，即需向特遣部隊指揮官報到，而特遣部隊指揮官則應即發佈計畫作為訓令，指定三軍計畫作為人員報到時間、地點、安全保密規定等，及召開第一次三軍指揮官協調會議時間等。以集中三軍指揮官與幕僚共同

開始計畫作為，絕不可各自在辦公室內完成。

聯合兩棲作戰計畫作為，三軍必須按計畫作為程序，同步進行，尤其在初步計畫中，每項『基本決心』之產生，必須經三軍指揮官一致認同方能成立，確實遵守『平行協調』關係。且在此階段，各軍種計畫所採取之作為均以支援登陸部隊『初步岸上作戰構想』達成任務為首要考量。此中特別是艦岸運動計畫、火力支援計畫與裝載計畫更需密切配合。

而登陸部隊各幕僚間，任何計畫完成初稿後，即需與相關幕僚協調，尋求支援配合。而下級（如登陸加強營）待登陸部隊頒布計畫大綱後，即開始與上級同時進行計畫作為，但每一文件完成後，經須上級相關幕僚協調或指揮官認同方可，以增大計畫之可行性。

兩棲作戰計畫區分三個階段進行，即初步計畫、計畫大綱與詳細計畫。初步計畫在產生基本決心。基本决心有八項，是三軍計畫的根本，第一是選定『兩棲目標』。如初動訓令中未指定，則需在初動訓令內所指定的兩棲目標地區範圍內選定。

第二項決心是確定『登陸部隊任務』。特遣部隊指揮官依初動訓令交付之使命，督導海軍部隊策訂『全般性廣泛行動方案』，登陸部隊再依據『全般性廣泛行動方案』策訂『登陸部隊任務』。亦就是說，初動訓令中交付特遣部隊之使命，必須由登陸部隊來執行。

第三項決心是選定『登陸位置』。所謂『登陸位置』，即為海岸線上可供從水面登陸之一個片段。在計畫時，根據有關海灘資料，判定可用以

登陸之各片段，再據以選定登陸海灘。（切勿誤認登陸位置為海灘）。

第四項是『選定灘頭』。灘頭即是登陸部隊應攻佔的陸上區域，如需掩護後續部隊登陸，尚需建立灘頭陣地與固守。但若無掩護後續登陸之任務，則無建立灘頭陣地之必要。

第五項是選定『登陸地區』。所謂登陸地區，乃為實施兩棲作戰所需控領之海、陸、空之區域。為期順利遂行兩棲作戰，必須確保此地區之海、空優勢、不受敵海空軍之干擾，以利我任務之達成。

第六項是『登陸部隊初步岸上作戰構想』。此一作戰構想乃三軍計畫之『核心』，登陸部隊必須針對任務，非但要慎為探討研究，並須經海、空軍認同與支持方能成立。在計畫中，如發現目標地區情況有變，應隨時予以修正，務期能達成任務。

第七項是選出『登陸海灘』。登陸海灘，簡言之，即為從登陸位置中選出用以實際登陸的一個片段，其長度，通常一個登陸加強營為600碼，旅（團）級為1200碼。其必須考慮的主要因素為，1. 能與登陸部隊岸上兵力運用計畫相結合，2. 適合艦艇搶退灘及有良好之海灘出路，故與海軍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切宜共同來選定。

第八項是選定『D日H時』。D日的選定，除了必須在初動訓令中規定的目標日期內之外，且須考慮潮汐對艦艇登陸的適宜性與天候、光度等因素。而H時的選定須在高潮前兩小時以內等外，尚需考慮海灘制壓終止時間等因素來選定。

從以上的說明中，可知無論從教育、權責言，

於初動訓令中指定兩棲目標地區、海灘、D日H時等，既無此必要，亦不可能。如為了配合上級長官視導，或其他方面作戰，亦只可誘導，盡可能避免以命令行之。

初步計畫完成後，即需策訂計畫大綱，亦即依據登陸部隊任務、登陸部隊初步岸上作戰構想、登陸海灘及D日H時等基本決心，進而產生各種計畫之『具體概念』，即所謂『計畫大綱』，登陸部隊依計畫大綱再提出增配部隊、各類補給品、運輸艦船、各型登陸工具、火力支援艦、密支空軍等『概略需要量』，會請相關單位支援，據此再進行詳細計畫。故『各種需要量』並非於計畫開始即需提出，且確切需要量尚需於詳細計畫作為中方能確定。

為提高計畫可行性，計畫作為中，相關上級單位宜全程派員輔導，計畫完成後，必須逐級（至國防部）嚴格審查，（依國防部頒行之聯合兩棲作戰教則所示，發動兩棲作戰之指揮官有核定兩棲作戰計畫之責）並實施兵棋推演，以驗證計畫可行性。

計畫完成後，登陸部隊即需按計畫完成『戰術編組』、『登陸編組』、『裝載編組』並完成『戰鬥情報』、『戰鬥部隊』、『火力支援』、『後勤支援』、『政治作戰』、『指揮通信』六大戰鬥系統編組後，開始任務訓練，先由各兵軍種各別訓練，再進入兵、軍種協同與聯合訓練、指揮所演習，最後實施縮短距離綜合實兵演習（左營北港地區可利用），自表定舟波至待命舟波登陸至各級指揮所登陸開設、岸勤海灘支援區開設，第一線部隊火力、後勤支援申請等之

演練（該課目已實施有年，希能再充實，做的更好）。

預演中，除表定舟波登陸外，登陸部隊宜繼續實施海灘突擊戰鬥，迄營指揮所建立，在此階段除第一線部隊預演指揮官戰鬥指揮外，尚可演練海、空軍及LVT-H6等支援火力之申請運用、AAVP7卸載後支援步兵部隊戰鬥，補給品緊急申請與傷患後送等課目之演練，以增大預演效果。

艦岸運動與突擊登陸.如使用兩棲車輛與小艇在敵設防堅強之海灘登陸，在當前兵器日益進步，火力日益強大的狀況下，已日益艱難，可否研究運用我國軍現有之裝備，逐次採用水面與直昇機垂直登陸之方式試行，供作參考。

任何演習，越接近實戰效果越大，實兵對抗比單方面演習要有效，這是眾所週知的。但演習終究是演習，如火力效果、三、五類補給品之消耗，官兵傷亡等狀況，必須有賴指導裁判人員之顯示與裁定，方能誘導演習；如果是單方面演習，敵方一切活動與作為，均需指導裁判人員或狀況部隊來顯示。反之，演習部隊一切作為就無所適從，演習亦就失去了意義。由此當知演習指導裁判計畫之重要。

## 伍、結語

聯興演習，自民國65年12月22日第1次演習開始，36年多來，迄已逾百餘次，演遍了台灣、澎湖各海灘，為我兩棲作戰力之提昇提供了無可泯滅的貢獻。唯國際情勢在變、我國防政策在變、兵力結構在變。當今的演習是否亦應在原有的基礎上更進步，更能滿足當今戰備需求，供參考。👁️



# 東南亞區域整合過程中 地緣因素影響之研究

著者／何耀光

海軍官校正期73年班、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社會科學博士  
海軍軍史館中校館長、海軍官校作戰組少校教官兼招生中心主任、海軍官校教育處考核  
科少校教育官、海峰大隊大大隊作戰長  
現為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地緣因素為國際政治分析中最趨穩定性的因子，探討東南亞區域內整合的問題，不能忽略該地區分別受到海洋與大陸地緣因素影響之下，區域整合會在歷史與社會文化層面上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使「整合」過程與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樣態。

區域整合在操作上，原本就受到地緣因素的制約，然而東南亞區域的歷史地理因素卻更形複雜，就地理上來看，東南亞地區大致可以區分為「海洋東南亞」與「大陸東南亞」等兩個地緣特質相異的次區域。也由於地理條件的迥異，因此無論在歷史經驗的認知上、社會文化的發展中，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與影響，對於政治經濟層面的區域整合作為，亦造成衝擊。因此，深入理解海、陸兩大地緣區塊對區域內歷史、社會文化發展的背景與可能影響評估，對於推動中的區域整合工作，在理論與實務層面上，都具有重要而關鍵性的需求。

地理因素的影響是深刻廣泛但又經常是以一種隱諱的方式潛入人心，也因此決策過程中、在專門議題研究中都很容易被忽視而不自知。例如在安全議題的理解上，強權的支配狀況總是在構思的當下，成為最被關注的議題，但歷史經驗的影響卻在大陸東南亞與海洋東南亞之間形成不同的思維基礎。對大陸東南亞而言，歷史上的安全威脅來自於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是北方的中華帝國，一是區域內鄰接國家的挑戰；而海洋東南亞方面則包括來自於中國與西歐的海洋威脅，但在形式上卻又有著不同的切入點。本研究將以此兩種地緣條件為思維基礎，由歷史經驗入手，綜合歸納各個次區域在整合過程中面對的挑戰，地緣因素形構的歷史觀之間的衝突，以及由歷史經驗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文化建構，以期能釐清地緣因素在歷史情結與社會文化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的可能動向，以建構在思考東南亞戰略問題時的思維基礎，並期望能發展出建構東南亞地緣略思維時的另一種權力操作背後的視角與體悟。

## 壹、前言

東南亞為我國鄰近的重要區域，尤其以海軍而言，出海向南即進入東南亞水域。且南海爭議

之中，我國亦為主權爭議的參與國，南沙、東沙更為我國海軍重要的巡弋、運補海域。然而相對在地緣戰略競逐的場域中，在地緣戰略思考的建

構裡，此一部分的認知與理解，卻呈現相對不足的現象。而此一現象，自軍官基礎養成教育時，即未能系統化的面對與處理。筆者作為一個曾經是海軍人的特殊關懷，亦即促使個人針對此議題，提供長期在學術研究上的部分心得，以期達到「拋磚引玉」效果的期待。由於地理位置的影響，自古東南亞就是亞洲民族遷徙的孔道，移民也使東南亞的文化呈現相當豐富的樣態，除原有的土著文明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印度、中國、伊斯蘭、基督教文明的影響也在區域內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在西元4-5世紀，印度與中國文化，開始產生影響，印度教、佛教、摩奴（Manu）法典、「神王」觀念、儒家政治思想等等均影響到東南地區的生活、技術，文字和文藝，乃至民間的習俗。到了十三世紀，穆斯林隨著海洋貿易的發展而出現，海洋東南亞逐漸接受伊斯蘭而成為馬來世界的主要宗教、思維與生活的方式。十六世紀之後基督教文化，在貿易利益與殖民擴張的牽引下對東南亞產生重大的影響，<sup>1</sup>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事實，但文化的衝突卻也不斷發生，亦為東亞戰略思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之一。

區域內本土民族與文明發展，受到不同歷史、地理因素的影響，原本就相當複雜，對大陸東南亞而言，歷史上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於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是北方的中華帝國，一是區域內鄰接國家的挑戰；而海洋東南亞方面則包括來自於中國與西歐的海洋威脅，但在形式上卻又有著不同的切入點。若就「區域」劃分的界定標準來看整合的容易程度排序，即可以是：社會和文化相似的區域、由政治態度與對外政策相似的國家所組

成的區域、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區域、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區域；以及地理位置鄰近的區域。<sup>2</sup>然對東南亞而言，除了地理位置鄰近之外，由於複雜的歷史加上地理的多樣性，與信仰、宗教、生活型態與政治、經濟相互糾纏之後，問題的複雜性與潛在的爆發點，也就使議題的焦點模糊化，甚至進入渾沌的樣態。

歷史經驗上，東南亞區域內國家多數經歷過一個或甚以上的殖民帝國統治，雖於二次大戰以後，隨著民族自決的獨立浪潮而紛紛獨立，然而以政治為先導的建國運動中，政治菁英所爭取的獨立自主國家，基本上多數係以原殖民地為領土範圍，迄新政府成立之後，才開始企圖協調境內不同種族的國民，以重新凝聚為同一民族的共識，這也造成多數東南亞國家的政治權威與主權意識相對高於民族認同感和文化契合的情況。<sup>3</sup>另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則來自於冷戰的影響，一方面新成立的民主國家，各項民主條件欠缺，加上強烈意識形態對立的國際環境，致使多數東南亞國家體質發生轉變，威權主義興起，加上共產黨暴動的影響，使得政權保衛、國家安全保障，與主權獨立的維持成為政治的核心。於是，改變依賴從屬關係，爭取國際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就成為在脆弱的國力事實上，用以對抗內外壓力的重要保護措施。<sup>4</sup>於是，1967年，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簡稱東協），然至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蘇聯勢力開始侵入東南亞地區，11月，東協五國外長在吉隆坡召開「外長特

別會議」，發表「和平自由中立區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ZOPFAN)，宣稱：尋求各國承認及尊重東南亞為一和平自由與中立的地區，使各國皆能具有免於外力干涉(Interference)其內政事務的權利。<sup>5</sup>此宣言明顯的呈現出東協國家戰力不足，無法維持自身及區域安全的窘境，依靠外力協助成為必需的選項，然歷史上遭受殖民統治的陰影，則使其希望能極力避免招致外國勢力的干預；但相對的，也使東協整合的發展，呈現緩慢與各自為政的狀況。

在東協成立的二十餘年時間裡，威權政治型態使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大小資源多數掌握在執政黨手中。對於區域整合將可能帶來與政經資源相互衝突的疑慮，促使各國政府多以「互不干涉」的藉口，犧牲區域整合的嘗試。<sup>6</sup>這種歷史經驗加上自1990年代以後，區域整體的經濟發展的奇蹟，使區域內部高度經濟聯繫與互賴，反而逐漸成為東南亞區域整合發展的主要動力。<sup>7</sup>

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則是另外一個轉折，嚴峻的經濟情勢使東協國家體認到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再加上對於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及美國在處理金融風暴時的強勢做法所引發的不滿，更促使東協在基於危機意識與近似歷史背景的條件下，進一步深化合作的意願，建構自由貿易區的概念也逐漸強化，經濟合作的議題更開始進行著實質上的運轉。面對整合議題，「先同意、再談判」的策略被普遍接受，更在傳統上引進不同大國勢力以求制衡的思考下，改善與中國、日

本關係，以務實的合作態度取代過去的相互對抗，藉以期待在未來的國際貿易談判中，因自由貿易區的基礎而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與支持。<sup>8</sup>今年(2010年)起東協+1開始正式運作，全球主要的觀察集中在這世界第三大，貿易總量達4兆5000億美元(2001年的預估為1.23兆)的新興自由市場。<sup>9</sup>然而，東南亞的整合總是籠罩著些許陰霾，樂觀的預估與期盼中間總有著間歇性的意外與偏離，成因如何？又將如何理解？而這些理解與思考實為地緣戰略思考建構時的重要背景知識。而我國軍事教育，尤其在基礎教育課程設計之中，此一部分卻又是最被忽略的項目，也因此，本文的核心關切係至於如何透過地緣結構與權力競逐背後的歷史與文化建構，使官校學生更能將認知與思維擴展至區域性、全球性的概念理解，進而期盼對於我國海軍軍官養成教育之中的戰略性思維建構，有著些許的助益！

## 貳、理論適用的探討

探討東南亞區域整合的問題，一般多數由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理解為入手。基本上，區域主義是一種地理感知基礎上的地緣認同意識，以地理的共通性作為基礎，並在某種程度的相互依賴狀況下，形構出特定的區域意識(Regional Consciousness)，並以此在區域內發展出跨國合作的行為。其基本假設是由於單邊主義行動(Unilateralist Action)的侷限性，使得國家在成本效益之衡量下，願意透過集體合作來追求其共同目標，透過這種政治決策形構出政治地區的關聯，進而發展成一個特有的政治實



體 (Political Entity)。因此，有限數量的國家、彼此間地緣關係、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就成為區域各國連結在一起的重要因素。<sup>10</sup>而區域主義的成功，特別強調參與國家的有限性，尤其在參與國的數目上，過多的參與經常是導致失敗的重要原因。<sup>11</sup>而區域整合的條件則包括：地理、文化關係與經濟上的共同利益等因素，由這些條件因素的配合與加乘（區域國家由於地理、文化或歷史因素、經濟與財政的牽連、政治開放程度及社會制度的相似等等），才構成特定區域內國家進行經濟整合的的驅動能量。<sup>12</sup>

然而這種以歐洲國家整合為思維基礎的概念，在東南亞區域的發展上，並不能完全適用。畢竟，東南亞區域整合的發展，本質上是在全球化的氛圍下，各國因難以應付所引發的巨大挑戰與風險，因而藉由區域的力量來降低風險，以作為回應與自保的情況。而目前由各國政府針對商品、勞務、資金、人員往來制定特別政策，以減少相關的互動障礙的作為來看，係一種「國家推動式的區域整合」(State-Promoted Regional Integration) 方式，相對於形構「區域凝聚力」(Regional Cohesion) 的理想則尚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亦由於缺乏正式的政治制度，故而持續受到自於國際體系的權力與規範以及國內政治結構與特質的影響。<sup>13</sup>尤其對東南亞國家的多元社會現象而言，內部種族的「人我」概念牢固不破，族群與國家認同在涉及權益或權力分配時，即顯現出衝突的本質。對於處在分歧種族的國家認同建構而言，國家力量的強弱就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一般來說，國力強者可基於國家或

整體社會的完整性，而建構出特定的國家認同概念，而國力弱者，則必須先設法富國強兵，建構強大的軍事力量以獲致安全和穩定。<sup>14</sup>這也是東南亞國家在面對「整合」問題時的結構限制。

因此，即便地理的鄰接、國際互動與共同特徵（種族、語言與文化、歷史等）係形構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 與區域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sup>15</sup>但在東南亞地區，其發展的模式卻不能等同於歐洲國家之整合經驗。於是，在後冷戰時期的多元化世界之中，新區域主義的概念就被孕育出來，全球體系內各層次的非國家行為者開始被重視，經濟、環境、社會、安全、民主等議題變成相關，透過建構主義的研究途徑，學界置重點於由異質性到同質性增長的變化過程，研究的焦點擴展到文化、安全、經濟與政治制度的變化，研究層次上也含括世界體系結構（全球層次）、區域間層次與單一區域內的複雜變化過程。<sup>16</sup>然而這種理解，能夠完全描繪出東南亞整合的全貌嗎？至少就現實主義的觀察來說，這終究只是一個遙遠的意象！

樂觀的觀察者總認為東協機制運作在歷經多年的磨合下，已經成功的規範並建構出東亞區域社會化的價值，形成一種新的區域主義典範。<sup>17</sup>但若確實如此，透過地理條件、文化關係與經濟上共同利益的連結，形構出來的經濟整合條件，<sup>18</sup>早就該讓區域整合的成果展現，也不至於到了1990年代還陸續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也不至於讓東協內部的脆弱結構持續影響經濟與對外事務的運作，持續在組織結構上呈現缺乏制度性機制以處理多面向議題的缺陷，使區域化的

實踐迭遭困頓。<sup>19</sup>事實上，就地緣政治與戰略的觀點來看，經濟整合發展雖然甚為突出，但如何建構更安全的戰略環境，則還是國際政治與強權戰略關切的焦點。<sup>20</sup>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研究途徑，透過其研究視野從國際拓展到國內甚至個人層次，除原本的國際結構因素之外，加入國家層次和個人層次變數來解釋國家行為之全面性綜合分析的特質，在相當程度上，有利於理解東協國家企圖引導國際體系向其目標與偏好來發展的趨勢，並對國力強弱的外交政策影響力變化，以及受到國際政治影響時，國家結構、政治菁英的心態轉換與回應國際政治的方式與手段等議題，提供有效的理解與認知途徑。<sup>21</sup>同時，也期盼能提供戰略初學者，在建構戰略性思考時，重要的理論認知與觀察視角。

## 參、東南亞區域整合的驅動能量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秩序的規範與重新設計基本上以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開放世界經濟秩序、多邊衝突解決與和平保障機制，以及民主制度的擴展與鞏固為核心，然而此種國際秩序的思考，並未跳脫傳統的「權力平衡」操作。<sup>22</sup>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上，各方係以勢力範圍劃分為籌碼，美國主要考慮是爭取蘇聯積極介入東亞戰局，早日結束戰爭，而蘇聯在亞洲的勢力範圍就成為利益交換的結果。<sup>23</sup>韓戰爆發，勢力範圍劃分的安排失效，面對局勢的轉換美國以「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作為回應。在地緣

政治意義上，係將東亞沿岸與西太平洋納入美國的戰略疆界，確保亞洲大陸不會發展出挑戰性的兩棲力量。<sup>24</sup>據此，美國先後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等國簽署雙邊或多邊防禦條約，更進一步在1954年9月簽署「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和「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議定書」，形成在亞洲大陸的東、南區域對蘇聯與中國的包圍圈，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以壓制蘇聯向邊緣地帶突破，進而挑戰西方的海洋秩序。<sup>25</sup>然而，以安全為基礎的東南亞集體防禦並未成功，以一種鬆散形式組合而成的東協於1967年成立，之後1984年汶萊加入，到1995年則是越南，至於寮國、緬甸於1997年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後所有東南亞十個國家都成為東協的會員。雖然會員數量持續有所成長，但長期以來，其成立之初的目標並未有重大變化：（1）建立區域政治、經濟連繫，減緩潛在緊張；（2）促進經濟發展，維持政治穩定，抵抗共產黨叛亂與暴動；（3）促進東協內部的安全，以減少外國勢力對區域的影響。<sup>26</sup>只是檢驗歷史的發展，東協的運作似乎從未脫離過外國勢力的影響。1965年，美國正式參與越戰，同時採親共政策的印尼蘇卡諾（Bung Sukarno）政權下台，蘇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改採親美、睦鄰政策，並強調東南亞一體化的重要；而在同年底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贏得菲律賓總統大選後，即緩和其對於沙巴主權的爭議。在這樣的國際條件與美國的協助下，東協才正式成立。而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與安全考量，係在於減輕各國國內的共黨叛亂，以及越戰擴大而引發的不安。<sup>27</sup>

此其中的政治性，以及外力的借助，不言可喻。

就國際政治的觀察而言，當地區發展呈現出「超國家性」（supernationality）概念時，乃是國家確保福利最大化的唯一可能，在這些行為中，利益集團與政黨以及國家的作用，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區域整合的基本動力雖然是利益；而其中又以「溢出」效應最為重要，然而這種溢出卻是受到相當程度的制度性規範；一般認為非政治領域中的議題，諸如經濟、社會、技術等等的角色很重要，但對東南亞而言，卻不能脫離對政治議題的關注。<sup>28</sup>

其次，當前的區域整合趨勢，一般認為與「全球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在全球化壓力下，媒體國際化、歐美流行文化影響，以及資訊管制的解除，都直接減弱了民族國家的傳統價值，國家引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資源逐漸減弱，但仍須負責經濟與社會問題，致使政府的正當性及權威受到質疑與挑戰。<sup>29</sup>東南亞區域國家為求對抗此一趨勢，因而逐步開始展開合作的嘗試，但初期成效並未顯著。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曾提議成立「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EAEG）做為與西歐、北美二大經濟體系抗衡與談判的平台，但在強權國家的抵制與區域內國家的消極應對下，最終還是流於空談。至於1992年倡議的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也因為無法克服內部成員國的保護主義傾向，而成為一個只是在WTO規範下的「法律存在」（Legally Exists）而已，其實質經濟意義並不大。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南亞諸國，才在現實的壓力

下，欲藉由與外在區域或經濟體的整合來帶動內部的發展。然而，援引強國勢力經常會導致主導權的喪失，於是，東協一方面希望藉由東南亞一體化的籌碼來增強其在東亞地區的重要性，更在與中國建立「東協加一」（ASEAN+1）的磋商中，明顯的看到東協國家積極的希望中國能接受「綜合安全」與「合作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核心理念，宣示不以武力解決紛爭，且接受東協的主導地位的操作，並企圖在2020年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以深化內部整合，推動區域經貿制度改革與自由化，促成經濟規模與競爭力的提升。<sup>30</sup>然而又由於內部缺乏制度化結構、缺乏中心和方向，使東協各國之間的合作有著結構性的障礙，<sup>31</sup>致使區域外強國介入的空間大為增加。以日本為例，早在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之後，日本的經濟關切就轉向東南亞，並以一種「事實經濟區域化」模式（Defacto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展開大量的投資，<sup>32</sup>金融風爆發生後，為避免因高關稅障礙危及日本經濟的擴張，並回應「東協加一」所形成的挑戰，於是日本先與新加坡簽署「日本—新加坡新時代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Japan-Singapore Economic Agreement for a New Age Partnership, JSEPA），之後更主動在2003年與東協簽署「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夥伴之架構」（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ASEAN and Japan），以加速並主導、掌控締結自由貿易區（FTA）的談判過程，2008年完成談



判，簽定「東協與日本全面性經濟夥伴協定」(The 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JCEP)。<sup>33</sup>在此同時，日本更主導了「東協加六」的規劃與設計，顯然東協希望能主導議題的企圖與實際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差距。

整體而言，東南亞的區域整合的動力，與其說是來自於經濟、互利等內需動力，更貼切的理解則應該是來自於外部力量挑戰下的無奈回應。東協的組成發展，初期即以防共為考量，之後越南入侵柬埔寨帶來另一個恐慌的高潮，至後冷戰初期的區域真空憂慮，到全球區域經濟發展產生的邊緣化擔憂等，皆使東協對安全利益產生不安全感，而促成其作進一步的整合。<sup>34</sup>

## 肆、東南亞區域整合在安全結構上的困境與因素檢驗

安全概念是一種傳統的認知，但也經常是模糊的概念，基本上國家以維護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為核心價值觀，因此對於干預國內事務的情況當然不能容忍，國家的存在即與這些核心價值觀的保護息息相關。<sup>35</sup>冷戰時期，國家安全威脅的本質來自於戰爭，對手的軍事力量就是潛在的威脅，軍事安全就成為核心關切，除非對國家領土、制度或統治菁英的政權維繫產生威脅性的政治影響，或者削弱其在國內、外政治領域的有效能力，否則其他事務是不會被視為安全的一部分。<sup>36</sup>因此，東協的組織架構、構想安排，也就是在這個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結構下，出於各

國為特定安全或經濟目的而建構的一種相當內向型、排外性的建制，相對於21世紀的外向型、非排他多元功能的複合型組織需求，就呈現出相當的結構性困境。<sup>37</sup>反應在目前的狀況上，東南亞整合的安全困境顯現在安全結構、霸權勢力介入、政治安全與恐怖主義衝擊等幾個面向。

### 一、東協安全結構

基本上，東協國家均非國際政治上的強權，以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似乎也不具備成為強權的可能，然而地理因素又使其成為強權競逐的對象，以軍事觀點來看，區域內的麻六甲海峽 (Strait of Malacca)、巽他海峽 (Sund Strait)、龍目海峽 (Lombok Strait) 以及孟加錫海峽 (Makassar straits)，幾乎是國際航運的焦點，為美國海權向印度洋、波斯灣投射軍力的孔道與「扼制點」(Chokepoints)。<sup>38</sup>國際強權因地緣的重要性而介入，地區國家則因自保而引入外力，這種交錯的權力糾葛，形成一種結構上驅動力。然而，檢視地緣的現實，經常發現當一群小國在地理上受到鄰近巨大政治實體所箝制時，其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後者將對前者產生深遠的影響。<sup>39</sup>也就是為了去除這種地理上的限制傾向，東協在組成之初即以一種共識決、不干涉、避免集體防禦、援引外力平衡等等鬆散模式來運作。也造成區域整合的實質成效相對緩慢，內部調和的曠日費時，長期來看，這種非制度性、非正式、模糊的發展模式，可視為極小化合作障礙的設計，確實有助於區域組織的凝聚，形構功能主義色彩的合作。然就學理而言，安全共

同體的運作必須存在「以權利、義務來界定的行為標準」，而東協模式之所以可能，似乎又是因為從來未曾真正面對驗測而成。<sup>40</sup>如此模式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現代情勢，卻也使組織效能不易發揮，更提供強權競逐的機會與可能，而一旦主導能力與地位發生變化，安全保障也就面臨挑戰。

探究這種特殊發展模式的成因，基本上與歷史情結相關，由於殖民經驗的影響，東南亞諸國自陸續獨立之後，避免再受強權支配，成為國家菁英的一致認知，然而，如同多數「後發型現代化社會」一般，落後國家的知識份子對所處環境強烈不滿時，很容易將在其所認定的較先進國家與制度予以理想化，<sup>41</sup>在東南亞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上，亦處處可見。冷戰時期的對立與意識衝突，使這些新興的國家擺盪在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嘗試與學習當中，社會的動盪與國際權力的競逐，引發的政權穩定疑慮，更促使區域內各國將可能侵犯其國家主權的區域性制度視為畏途，統治菁英關切的核心是其國內政治正當性，在主權議題上與外來者妥協成為罩門。東協的區域整合能力，即受到對各國內政、主權觀點的高度不確定性影響，而顯現出遲滯與無能為力。<sup>42</sup>成員國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時常出現，在強調東協區域自主性的同時，又各自尋求本身戰略性的利益與需要。<sup>43</sup>於是，泰國會在越南入侵柬埔寨時，單獨與中國達成結盟的協議，新加坡會歡迎美國勢力留在亞洲並提供海軍基地，馬來西亞會與美國聯合實施海軍演習等等。明顯的，追求「現實政治」（Realpolitik）才是各國關切的核心，亦顯示出成員國間的相互不信任。<sup>44</sup>東

協這種表面上一致，實質上是成員國採取現實主義作法處理雙邊關係的美麗外衣，<sup>45</sup>至於東南亞的安全規範與安排，亦由歷史經驗的不信任概念出發，進而發展成實質上的雙邊性質安全形式安排。<sup>46</sup>

## 二、東南亞區域的霸權介入與運作空間

在國際安全結構上，冷戰時期設計的安全機制，雖然在東南亞的運作情形迥異於歐洲，然而，美國透過霸權支配系統、政經制度與意識形態所建構的「西太平洋海洋秩序」，<sup>47</sup>在結構深層面上，從未減輕對東南亞的箝制。在冷戰對峙的環境中，面對共產黨暴動的歷史經驗，使多數東南亞國家並沒有太多的選擇空間，透過美援（軍事與經濟）的操作，更使這些國家難以在關鍵問題上採取與美國相背離的政策，而相對的強權的操作空間就沒有太多的侷限。例如，美國在防止印尼倒向蘇聯考量下，支持蘇卡諾收復西伊里安查亞（West Irian Jaya）並借此將印尼由激進的反殖民主義轉向解決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消除社會貧困，杜絕共產黨存在的社會基礎。<sup>48</sup>然而在1964年則因越南局勢的考量，美國以對馬來西亞獨立的支持，換取英國對其越南政策的支持。<sup>49</sup>也迫使蘇卡諾在對抗馬來西亞問題上進退兩難，若放棄對抗政策，則將喪失國內威信，激化矛盾，甚至動搖其統治基礎，最後以企圖聯繫中國、退出聯合國來回應，而其結果則是在1966年的「930事件」後將政權交給蘇哈托。<sup>50</sup>至於新政權則為積極尋求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的經濟援助與支持，而主動結束與馬來西亞的對

抗，重返聯合國，並宣佈與中國斷交。明顯的，霸權國家擁有更多的支配籌碼來運作，相對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在歷史經驗、政權穩定、資源掌握上，就只有扈從與對抗的兩難選擇，而到最後，當對抗實力不足時，只能交出政權。蘇卡諾如此，之後的蘇哈托依然如此。事實上，東協國家長期以來彼此間仍存在諸多爭議問題，包括歷史心結、領土、移民、社群認同與互信問題等並未能解決。近年來亦有不少爭議，例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曾為了馬國存戶的利息而發生爭執，也曾為邊界火車站海關及移民關卡位置產生爭議，又如菲律賓的前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曾公開支持下獄的馬國前副首相安華（Anwar bin Ibrahim）而引發兩國齟齬等。<sup>51</sup>而這種情況，也提供強權介入的最佳空間。

整體而言，長期以來東協對美國的關係維繫，係建構在平衡威脅與相互依賴的變項上面。一方面在軍事安全上希望以美國勢力來平衡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區域性大國的威脅；在政治上，則藉由與其有相似背景的發展中國家（現階段尤其是中國），以對抗美國價值的擴張，避免美國透過安全議題的主導，進而威脅到東協國家的政治自主；在經濟上，係希望利用日本、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資金與市場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美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對東協來說仍然具有關鍵性的重要角色，<sup>52</sup>這也相對的使東協在處理各項議題時，無法避免的將自動引入其他強權的介入。再以「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運作來看，

區域論壇的成立可視為「全面羈絆」（Omni-Enmeshment）策略的實踐，係採取將區域內所有具影響力的大國一併納入的方式，而企圖同時執行「廣泛平衡」（Broad-Ranging Balancing）的對應政策，希望透過議題與論壇的主導，發揮更大的外交影響力，幫助東南亞國家在既存的區域與全球制度構建中獲取更重要的地位。<sup>53</sup>然而實質上，東協在安全議題上採取一致的立場，並非對個別同盟國的支持，而只是代表反對改變現狀的企圖。<sup>54</sup>過去中國的共產意識形態輸出，使東協各國內部政治遭遇極大威脅。冷戰對立的經驗，一直是東協與中國之間的鴻溝。中國涉外政策的轉變，雖然開起雙方對話的管道，但東協對中國崛起的擔心卻始終無法抹滅。<sup>55</sup>這也是當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亞洲三大目標：防止地區霸權崛起、保持穩定、控制亞洲變化，<sup>56</sup>被確立之後，東協國家多數予以善意的回應，並對美軍的存在，認為是東亞和平的基石。這也是近年來，東協一方面推動與中國關係的發展，但又一再強調不會損害和美國、日本、印度及澳洲等國的關係的思維展現。因為引進各國勢力，實現地區內的權力平衡狀態，避免單一外部強權的干涉或宰制才是戰略的核心，希望由大國競逐與分歧中獲取利益才是目的。<sup>57</sup>然而，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似乎更是關鍵，在面臨外來的攻擊時，沒有互相協助的機制可以實施，亦無正式的制裁，因此也無從對成員國間發生侵略或挑釁行動時，展現遏止的能力，以成為論壇的致命性結構缺陷。<sup>58</sup>再以區域航道安全議題為例，對於中國曾試圖提出取代麻六甲海峽的替代方案，在東協各成員國各



自的國家利益考量下，美國、日本的操作空間，明顯在議題設定的過程中，表現無疑。<sup>59</sup>歷史經驗上，操作權力平衡需要具備分配資源的實力，國際政治的現實面一向是大國之間的「交易」，而這種交易又多數是以犧牲小國為代價，這也是東南亞整合過程中，另一個潛在的危機。

### 三、東南亞區域內政治安全的困境

區域內各國的政治安全是另外一種困擾，政治變革與社會轉型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與挑戰。直到目前為止，東南亞區域的民主轉型並未成功，這種「有缺陷的民主國家」依然存在著，人權侵犯、軍隊私有、政治迫害、族群歧視、政府貪瀆等等問題，不但人身基本安全無法獲得保障，社會、經濟的改革亦受到嚴重的影響與遲滯。這種在經濟與社會條件不夠成熟狀態下的政治現實，往往使其在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陷入「民主、動亂、專制、再民主、再動亂、再專制」的惡性循環。<sup>60</sup>這些內部政治不安的影響，包括泰國持續的社會對立、印尼和菲律賓政治高層的貪瀆案、馬來西亞族群對立問題的再起、分離主義的紛擾、政黨惡鬥等等。又由於內部政治挑戰經常是政府更迭的原因，在經濟的惡化狀況下，東協的政經實力與區域主導角色也備受質疑。<sup>61</sup>

二戰之後，東南亞各國陸續獨立，建立民主新政府，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確也多有轉向威權主義的情勢。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一般，統治地位是安全的核心，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使其民眾謀求安全，而是保護政治菁英對權力的控制，也因此，社會內聚力和政權合法性的

掌控能力，就成政治安全的判準。<sup>62</sup>在東南亞的經驗中，追求「經濟發展」一直是各國獨立以來的國家目標，但也因政治安全的考量造成嚴重的不平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象。以印尼為例，國民所得在1981年到1987年間增加5.33%；然其東部五個省的情形卻是零成長或負成長。<sup>63</sup>又如泰國曼谷地區與偏遠地區如東北的不平衡發展等等。不平衡發展導致國內形成，中心與邊陲的差異，再加上經濟落差而逐漸產生文化的優越與卑劣性的對照及認知。<sup>64</sup>而文化差異現象，在經濟、宗教、族群、生活習慣的衝突下，若加上有意識的操作，或意外事件的觸發，大規模的衝突與暴力事件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至於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則來自於戰後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1965至1990年間，新加坡國民平均所得年成長率為6.7%，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則為3.8%。然而，隨著經濟成長與所得增加，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等地的中產階級並未如西方民主理論預期的進入民主轉型，<sup>65</sup>其主要原因有在於威權政體透過這種差別的發展利益，投入特定族群，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恩從體系（Patron-Client）以非正式、特殊互惠關係所形構的不平等性、私人性、志願性與高度變動性來動員政治系統，如菲律賓、印尼、泰國；<sup>66</sup>有利用優惠特定族群政策，以鞏固政權安定的作法，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刻意增加馬來人的經濟優勢等。<sup>67</sup>然而這些不同的發展方式，卻都與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以泰國為例，自1937年行憲至今發生過20次成功的軍事政變，頻繁政變

的理因素與泰國傳統文化有關，泰國軍隊效忠的對象是泰王，每次政變之後，就是晉見泰王稟報政變的原因，在獲「御准」之後頒布臨時憲法，建立臨時軍政府，重新制憲通過後，選舉組成新的民選政府，而這一系列傳統泰國政治安排的過程，僅顯示出，在這以佛教文明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國家之中，不被泰王所支持的政府，即使是人民所選出來的，即可基於所謂維持社會安定和顧及全國人民福祉等理由而轉變，因此軍事政變可被視為是泰王的政治選擇。<sup>68</sup>

當後冷戰時期，美國與其西方盟國將推展民主化作為圍堵共產主義的後續政策，人權與民主價值成為提供援助的前提要件時，<sup>69</sup>東南亞國家的國內政治問題就更加突顯。全球化的多層次影響涉及經濟、政治、科技、軍事、法律、文化、環境各種議題的互動，也使得影響、利益、干預等力量的重疊交叉，也同時突顯選民與選區的界定、代議制度、政治參與的各種問題，尤其對東南亞民主鞏固尚未完成的國家而言，這些都構成執政的直接挑戰。<sup>70</sup>尤其當整合開始加速，國家間的經濟互賴、互動無法逃避時，任何經濟決策均可能引發連鎖反應，<sup>71</sup>國家的主權也就受到了約制，執政者如何能取得傳統族群的支持而維繫政權，則又是另一項挑戰。當前東協內部最大的變化是會員國的增加與異化，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這些經濟貧窮、政治專制的國家自然形成一股勢力，而與比較開放自由的國家如泰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衝突也隨即顯現，<sup>72</sup>尤其以人權問題的爭議，一方面有東協「不干涉」的傳統，一方面有歐美先進國家交往的需求，一方面

又有各會員國的政經利益考量，也使東協內部的爭議日趨嚴重。

整體而言，亞洲文化相當程度上孕育出對於權威政治的信任，戰後的政治變遷途徑也顯示出其依賴傳統文化發展的特質。尤其以大陸東南亞，深受佛教文化與儒家文明影響下，對於明君治世的期待，即呈現出根深蒂固的權威崇拜心理，認同現有權威和秩序，強調家族等集體利益優先，相當程度上為東南亞威權主導的經濟成長提供合法性與有利於現代化轉變的關鍵。<sup>73</sup>現代化理論認為的中產階級轉換與政治菁英行為促進民主化轉型與鞏固的概念，對東南亞國家而言卻不見得相吻合，泰國的政治菁英長期以佛教和文化為意識型態工具，輔以對君王個人崇拜，持續政治監控與經濟利益壟斷，新加坡則在英國殖民時期的文官中立傳統下，建構獨立、效能的國家文官體系，因此，可以明顯的看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發展階段、文化傳統下，政治菁英選擇也大相逕庭。<sup>74</sup>

#### 四、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的發酵

冷戰時期的強權對峙，相當程度上壓制了東南亞內部的許多矛盾，但後冷戰時期，諸如宗教與民族衝突、恐怖攻擊、網絡威脅等現象均逐漸顯露，911事件之後恐怖主義藉著全球化影響，在國界轉趨模糊，南北衝突加劇，宗教、社會團體以及媒體影響力大增狀況下，快速蔓延。<sup>75</sup>尤其在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毒品走私與極端主義威脅等問題之嚴重性持續提高，統計在2004至2007年間，東南亞地區發生的恐怖

事件從220件激增至1429件，佔全球恐怖活動的比例亦從8.3%升至9.9%，造成死亡人數也由278人增加到1119人。<sup>76</sup>也證實了恐怖主義向東南亞轉移的地緣變化，更促使美國「恐怖攻擊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United States）將東南亞視為美國進行全球反恐作戰的「第二前線」（The Second Front）。<sup>77</sup>同時促使美國改變其國家利益評估，並在避免使反恐戰爭變質為反伊斯蘭運動前提下，強調支援大多數溫和伊斯蘭國家，強調恐怖主義與激進團體的最終目標是顛覆政府，更著手加強區域安全結構，促進穩定與民主鞏固等等方式來回應。<sup>78</sup>這一系列情勢發展，對東南亞國家也造成衝擊，以反恐為名的美國勢力介入，似乎已佔盡了行動的「正當性」，東協所堅持的「不干涉」理念，在「反恐」的大旗下，顯得格外的突兀。而東南亞恐怖活動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在穆斯林佔多數的區域（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南部以及泰國南部），創建一個跨越現有國家疆界的伊斯蘭國家，<sup>79</sup>亦使得該等國家沒有拒絕「反恐」的正當性。但各國政府又因其歷史背景、宗教、文化與社會狀況不同，而有難以完全配合的兩難。

東南亞的穆斯林人口約有兩億多，其中以印尼的1億8千萬為最多，全國有88%的伊斯蘭信仰人口；至於馬來西亞則有1400萬，佔總人口60%；另外，小國寡民的汶萊亦有佔人口67%的穆斯林；新加坡穆斯林約15%，泰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也有若干伊斯蘭教徒，約佔總人口的4%-5%之間。<sup>80</sup>以穆斯林最多的印尼而言，印尼

政府為顧及穆斯林選票，即便在「911事件」發生之後，仍然強烈批判美國為反伊斯蘭的邪惡帝國。因為就印尼而言，其本身是伊斯蘭為主體的國家，後蘇哈托時代又是個弱勢政府，中央對爪哇以外地區的控制能力不足，上萬個島嶼的地理特殊性等，加上歷史、民族、宗教、交通等原因下，使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恐怖主義發展適合的場所。面對國際社會反恐要求與國內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兩難，加上多數穆斯林相對在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失衡的社會中處於弱勢，自然使其政策作為有兩面敷衍的情勢，然而「貧困落後與恐怖主義恰似一對孿生兄弟」，解決恐怖主義須處理貧窮問題，但接受外援改善經濟的獲利者又多是那10%的獲利族群，對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的穆斯林而言，只不過是證實了中央政府的偏頗與剝削而已！直到峇里島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印尼政府才被迫轉而較積極的支持國際反恐行動。<sup>81</sup>

相對的在馬來西亞的發展上，則顯現出伊斯蘭國家在以經濟競和為建構時，其衝突性將相對較低的曙光。馬國在經歷1969年513衝突事件後，逐漸體認選舉刺激與宗教狂熱的連結，以及這種宗教正當性與煽動性的危險，在歷經不斷的錯誤與嚐試之後，逐漸在加強伊斯蘭認同、經濟發展、種族和諧等方面展現成果，相當程度上已顯現出伊斯蘭與現代社會相容的可能性，透過宗教社會的認同建構，多元主義的發展確實顯現出成功的機會。<sup>82</sup>

至於泰國南部的分離運動，則又是另一種不同的類型，基本上，泰南的問題源自於1970年代興起的大規模現代化運動，在政府的積極鼓勵下，



佛教商人大舉移民進入泰南，由於當地多數穆斯林係從事橡膠、漁獵、採礦、小販等工作；而移入的華人、佛教徒則因政府的結構性支配而佔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自然資源在不對等資本的介入下，形同被搾取，加上適逢國際原物料橡膠價格下跌，在經濟改善無望、語言溝通障礙、部分官員素質低、貪污等情形，更激怒馬來族人，認為政府政策偏袒佛教徒，而引發新一波分離運動。<sup>83</sup>於是，當國際情勢轉換，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美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等事件，印尼、馬來西亞、中東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崛起後，泰南區域原本存在的宗教與族群分歧就更加激化，跨國恐怖組織的活動與攻擊未遂案亦逐漸增加。<sup>84</sup>泰國的實例顯示出：當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導致地區隔閡、摩擦時，將使落後地區的人民不滿，產生被剝奪、被歧視的感覺，亦觸動分離主義運動的成功運作，而當政府採取攻擊時又將凝結分離團體，而在國際強權勢力的支持下，分離運動就難以止息。此時，國家若不能在多方層次上，諸如種族、語言、宗教、歷史背景等民族要素上建構認同，積極縮短政治理念、制度、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則由意識形態與實質利益引發的衝突將更具威脅。<sup>85</sup>

整體而言，對於東南亞這麼一個多種族、多宗教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在全球化、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種族、宗教等社會衝突的發生似乎無可避免，歷史情緒加上部分過度、選擇性的現代化運動，更是導致城鄉差距與族群衝突擴大的主因，不但使原本就相當複雜的社會結構更加對立，宗教極端勢力與分離主義活動也因此找到滋

長的溫床。<sup>86</sup>

## 伍、東南亞區域整合在經濟結構上的困境與因素檢驗

在光鮮亮麗的東南亞區域整合印象之下，整合的前景並非如一般的樂觀，多數樂觀的看法建構在預判的經濟能量，諸如關稅的降低、市場的擴大、貿易額的倍增、由經濟的合作到和平維繫的可能等等，然而，現實層面的思考則有著經濟面、產業面、結構面、制度面等等的挑戰。一般而言，包括在經濟發展差距上，各國之間貧富懸殊差異，從最富有的新加坡、汶萊的國民平均所得均超過3萬5千美元，而最低的緬甸、柬埔寨、寮國，在2008年分別只有462、818、840美元。再就經濟規模而言，東南亞不但遠遠落後於日本和美國，而與其他區域組織間的貿易量亦嫌不足。經濟制度上，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有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對外國資本的依賴程度很大。另外產業結構差異甚大，有工業化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亦有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印尼與菲律賓，且彼此間的產業互補性不高，區域內相互貿易額不足。產品對美國與歐盟市場的高度依賴，加上美國在區域安全上的無可替代地位，致使美國的因應策略與措施成為左右未來的重要關鍵因素。<sup>87</sup>至於在非經濟因素上，還有政治體質上的民主與極權政體之差異。在社會層面上，文化、宗教、語言也都有落差，甚至對立、仇視的情況依然是潛在的危機。

上述就純粹經濟分析的結果來看，或許可以作

「危機就是轉機」的解讀，然而結構層面的問題卻是不能忽略，但又總是隱諱不清的議題，其中包括：

### 一、組織結構的意識形態衝突與盲點：

一般的社會研究經常發現，大團體中的成員若欲極大化其個別利潤時，除非採取強制或引誘措施，否則在分攤團體成本的壓力下，成員間難以達成共同利益的實踐。而東協組織的「不干涉」意識形態，原本係試圖透過各會員國之間的相互阻怯、牽制、合作等方式來解決衝突、形成穩定而特殊的制度安排，然在真正面對此類問題時，卻經常會陷入冗長而無效率的政治攻防之中。以金融風暴為例，當時各國均自顧不暇而無法協調出一致的對策，明顯的出現處理重大問題的無力與困境。<sup>88</sup>另外，在理論上整合程度愈緊密時，相對於主權的堅持就必須有所調整，尤其當貿易流量增加，而造成對於其他國家的貿易依存度加深時，對於依賴較深國家的政經與外交政策將產生嚴重的影響。<sup>89</sup>而在東協當前所處的環境下，不是對美日有所妥協，就是必須對中國妥協，而兩者在各國的政治氣氛下，都存在著某些主權不可渡讓的民意壓力。

### 二、對中國崛起的過度樂觀與依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對東協表達出具體的善意與貸款，使其與東協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產生結構性的轉變，人民幣的不貶值尤其減低了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衝擊，加上主動給予低度開發的東協會員國經貿優惠待遇等措施，使中國

成為東協新的戰略伙伴。<sup>90</sup>然而，中國積極參與區域經貿整合並企圖扮演主導角色的目的，不外乎在於利用崛起的經濟力量，操作區域經貿合作的議題與平台，平衡美國的權力結構，主導區域發展。<sup>91</sup>另外，在實質層面上，東協與中國均為發展中國家，其產品的相似度、相互競爭性甚高，且互補性不足，貿易整合後的貿易創造及貿易轉移效果將難以如預期一般的顯現，加上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的一系列不確定因素，也使持續的整合發展蒙上陰影。<sup>92</sup>另外，普遍存在於東南亞社會對華人的疑慮，雖有減低但並未消失，也可能是另一種隱憂。

### 三、權力平衡操作的迷思：

審度歷史的發展，東協的存在與影響力，在權力政治的本質上是與強權之間的妥協與默許有關，而非來自於東協自身的實力。東協國家希望以確保經濟發展並推動以自身為主體的合作為目標的作法，諸如「東協+1」、「東協+3」、東亞高峰會等等，均顯示其極欲在整合過程中扮演軸心的角色。<sup>93</sup>但因東協十國的經濟規模太小，對世界經濟衝擊的適應性相對脆弱。於是希望援引大國勢力的相互約制，以求漁翁得利的效果，然而，這種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權力平衡操作，在理論與實務上，都將帶來嚴重的後果。歷史經驗上，區域整合時的「大國主導」態勢甚為明確，東協國家在利益糾葛的整合過程中，缺乏有利與有力籌碼的缺陷表露無疑。面對中國利用經濟能量的影響，日本在「亞洲16國自由貿易區」的議題設定，美國在防止單一國家崛起抵制美國參與

的態度與反應等等議題上，均無法有效回應。<sup>94</sup>另外就政治運作的內部邏輯而言，操作大國相互約制的條件在於大國之間的無法協調以及平衡者（Balancer）與各大國間的利益交換，但東南亞的事實情況卻是美日同盟主導東亞經濟合作，並正逐漸轉化其經濟優勢為政治與安全的優勢，再加上日中協調途徑的極度可能，<sup>95</sup>使的大國間的協調可能性大增，亦相對壓縮東協的操作空間。即便當前中日釣魚台爭議看似嚴重，但其中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於雙方內部的政治操作，亦沒有任何跡象可以顯現，東協在此議題上，會有任何的運作空間。另外，即便中國積極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建立緊密關係的目的在於以經濟來帶動外交，制衡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優勢，<sup>96</sup>但化解「中國威脅」疑慮的主要訴求對象還是美國，尤其在操作大國外交的資源與空間上，東協國家幾乎沒有足夠、有效的關鍵性籌碼。

#### 四、社會結構與經濟整合的衝突

東南亞社會結構在經濟整合的過程間扮演著相當程度的負向拉力，例如華人在東南亞各國與當地人之間的經濟差距，迄今依然是互信的阻撓與造成衝突的主要隱藏性因素，尤其如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一些關係緊張的地方，種族差異意識的影響，往往是在經濟差異擴大時就會被連帶挑起。另外華人生活習慣與伊斯蘭文化的格格不入，也是引發種族、宗教衝突的導火線。而這種不信任感，又使得華人投資中國問題，被部分東南亞國家領導人懷疑為認同與政治效忠有疑慮的證據。<sup>97</sup>這種社會結構，實可謂「先天不

良、後天失調」。理論上，由地理所界定的社會生活空間，會形構出特定的社會、政治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建構，包括以同質的程度來分辨的內聚力、以互動的程度形構的交往、以及因權力分配而形成的權力層級化以及其各種關係的結構等等。然而，東南亞的歷史發展現實，卻是政府與社會在認同操作時的粗糙與放任，再加入社會貧富差距、族群關係、宗教極端份子等問題之後，再引發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與恐怖攻擊，凡此種種均顯現出東南亞內部經濟整合的結構性缺陷。<sup>98</sup>

#### 陸、結語

一般研究東南亞區域整合問題的入手與思考，多數集中在新制度主義或建構主義的思維下，然而，東協國家政府在處理問題的實質面上，卻是採取現實主義的思維模式與操作，也因此，在東協與大國互動的歷史經驗裡，發現的是東協的規範，實質上是助長強國來轉型、影響弱國的空間，在本質上，這個由弱國所組成的組織所提倡之規範，僅僅只是大國默許的表象。<sup>99</sup>國際政治的現實經驗顯示，開發中國家的整合過程較之於已開發國家更受到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這些區域外國家所提供的貿易、援助與投資政策，在區域整合及會員國參加的機會成本間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sup>100</sup>而東協國家本身又受到歷史因素、社會結構、多元種族問題、宗教文化差異等等因素影響，再加上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與吸引力，不但無法有效排除外力的干預，更在相互扞格、算計的過程中，自我消耗。尤其當利益考量各自不同時，這樣的情況更是嚴重，以目前的南海情勢來




看，馬來西亞、汶萊就不贊成將中越、中菲的海域爭議，提升至多方協商的層級，以避免自身利益受損。<sup>101</sup>

若以區域整合的層次而言，<sup>102</sup>由層次最低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到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Economic Market）、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到最高層級的完整經濟聯盟（Full Economic Union）來看，目前東南亞的整合只是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初步階段。然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全球化趨勢所牽動的區域化進程，確實有不斷持續的可能性。但在西歐國際體系尚未崩壞之前，民族國家的政治現實影響不可能減低，國家統治菁英對於主權概念的感知，結合特定族群的族群意識，在民主鞏固不甚完整甚至尚未進行的東南亞國家內，將可能繼續維持目前的思維與操作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可以預期與判斷的情況。而強權國家在此的運作空間，也將持續大有可為。當然，直接、赤裸的介入與干預並不容易發生，但支配與控制的強度卻不會稍有減低。

東南亞地區在地緣上，無法擺脫來自於海陸強權的影響，歷史情結與文化滲透的交錯，對於各個國家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東協國家中，菲律賓（領海爭議）、越南（邊界戰爭、領海爭議）與印尼（共黨經驗、宗教隔閡）依然將中國視其為安全上的「威脅」；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則有一定程度的顧慮，但並不將中國界定為安全威脅。至於緬甸、泰國、柬埔寨與寮國等則與中國之間發展出各種不同形式的協定與合作關係。

但即便如此，中國又與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簽有能源合作開發計畫，又是東協國家最大的天然氣買主，與泰國有合作興建鐵路計畫，亦有著日趨熱絡的軍事合作與互動。整體而言，在國際權力政治的層面上，研究發現多數東協國家仍然希望美國、日本、印度的影響力繼續留在東南亞，以有效平衡中國大陸力量的擴張；<sup>103</sup>而這種援引外力相互牽制的思維，亦源於政治現實與歷史經驗的影響，透過國內政治層面的分析，更可以發現其主因是來自於內部多元文化建構遲緩，導致整體國力的侷限。尤其重要的是，在個人層次的理解上，各國政治菁英為其統治地位的鞏固，而有意無意的忽略或放任問題的持續，似乎才是族群認同與諒解無法落實的核心原因。

最後，作為國家海洋戰略實踐的第一線，海軍對南海與東南亞地緣戰略的理解並不算完整，尤其在缺乏對受地緣影響所形構之歷史、文化因子的瞭解的戰略思維，基本上只能在低層次戰略變換之中，隨著時局與權力轉換因素而變動，但無法超越、更難以預測。對台灣這樣一個與南海有著強烈利益聯繫的我們來說，尤其作為一個捍衛國家海洋權益、屏衛海疆安全的海軍人來說，更深入的理解東南亞，著實是必要而迫切的議題。

- 1 綜合參考吳俊才,《東南亞史》(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嚴智宏,《東南亞文化教學參考手冊》東南亞文化與社會(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5年),頁79-116;D. G. E. Hall著,張奕善譯,《東南亞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82年),頁543-545;Syed Serajul Islam, "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Asian Survey*, Vol.XXXVIII, No.5, (1988), pp.442-443.
- 2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7), pp.1-13.
- 3 洪謙德,《世界政治新論》(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頁91。
- 4 綜合參考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1 (1999), pp.46-47.
- 5 Lau Teik Soon, "ASEAN and the Bali Summit," *Pacific Community*, Vol.7, No.4, July 1976, p.539.
- 6 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2期,1999年,頁64。
- 7 Wei Kiat Yip, "Prospects for Clos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1, (2001), p.106.
- 8 綜和參考Herman Joseph S. Kraft, "ASEAN and Intra-ASEAN Relations: Weathering the Storm," *Pacific Review*, Vol.13, No.3, 2000, pp. 153-172; John Ravenhil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Incentives," *Asian Survey*, Vol. 35, No. 9, 1995, pp. 850-866; Fred C. Bergsten, "Toward a tripartite world," *The Economist* (July 15, 2000), pp. 20-22; Chwee Kuik Cheng,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Vol.27, No.1, (2005), pp. 102.
- 9 綜和參考
- 10 綜合參考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 Joseph S. Nye, Jr.,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8), pp. vi-vii; John G. Stoessinger, *The Might of Nation: World Politics in Our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 338.
- 11 Fiona Butler,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10.
- 12 綜合參考Karl W. Deutsch著,?其泰譯,《國際關係的解析》(台?:?明出版社,1971年),頁293-294;Rolf F. Sannwald & Jacques Stohler,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38.
- 13 綜合參考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4; Louise Fawcett &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9-45.
- 14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p. 23-25.
- 15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70), pp.6-7.
- 16 Bjo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A Prologue"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orn Hettne and Andras Innotai,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 Macmillan, 1999) , pp.7-16.
- 17 Anthony L. Smith, "ASEAN's Ninth Summit: Solidifying Regional Cohesion, Advancing External Linkag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6, No.3 (2004), pp.417, 425; Dirk Nab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ASEAN + 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Vol.3, No.1 (2003), p.122.
- 18 Rolf F. Sannwald & Jacques Stohler, *Economic Integration*, op. cit., p.38.
- 19 Zakaria Haji and Baladas Ghoshal, "The political future if ASEAN after the Asian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5, No.4, (Oct. 1999), pp.762-763.
- 20 Kusuma Snitwongs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Changing Southeast Asia," in Robert Scalapino and Sung-Joo Han, eds. *Regional Dynamics: Secur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Jakarta: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0), pp.40-41; Sheldon Simon, "The Regionalization of Defen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5 No.2, (1992), p.122.
- 21 相關論點參考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1998), pp.144-172.
- 22 王德仁,〈歐洲格局的四次大變化〉,《世界知識》,第24期,1992年,頁16-18。
- 23 Gary 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194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66-69;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48), p.718.
- 24 Geoffrey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8), p.138.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 2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p. 3-18.

- 26 Tim Huxley, "ASEAN Security Co-operat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Alison Broinowski ed., *ASEAN into the 1990s*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85-95; Arnfinn Jorgenson-Dahl,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82), pp.45-64.
- 27 陳治萍,《東協國家的區域性政經發展》,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頁33-40。
- 28 綜合參考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著,閻學通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160-177;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4-27.
- 29 Suzanne Berger,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s*, Vol.3, (June 2000), p.45.
- 30 綜合參考洪財隆,〈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內容與效應〉,《當代中國研究》,第4期,2005年,頁15;Mohamed Jawhar Hass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3, 1995, pp. 508-517; Jorn Dosch & Manfred Mols, "Thirty Years of ASEA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1, No.2, 1998, pp.167-182; Jose T. Almonte, "Ensuring Security the ASEAN Way," *Survival* (Winter, 1997), pp.80-92.
- 31 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機遇與挑戰〉,《腦庫快參》,第42期,2005年,頁10。
- 32 Richard Higgott, "De Facto or De Jure Regionalism: The Double Discourse of Regionalization in Asia Pacific," *Global Security*, Vol. 11, No. 2, 1997, pp. 65-83.
- 33 綜合參考洪財隆,〈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內容與效應〉,前揭書,頁17;劉昌黎,〈日本積極推進FTA/EPA的政策措施〉,《現代日本經濟》,第3期,2008年,頁37-40。
- 34 林若雪,〈東協整合與兩岸關係〉,《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3期,2001年,頁55。
- 35 Benjamin Miller,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Should be Redefine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 (June 2001), p.16.
- 36 Mohammed Ayoob,"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 *World Politics*,Vol.43, No.2, (January1991), pp.219-220.
- 37 Leszek Buszynski, "ASEAN's New Challenges," *Pacific Affairs*, Vol.70, No.4, 1997, p.555.
- 38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 C. R.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pp. 10-14.
- 39 Derek da Cunha, "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Future Security Role in Its Backyard," in Jonathan D. Pollack and Richard H. Yang, eds. *In China's Shadow: Regional Percep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 RAND, 1998), p.115.
- 40 綜合參考Ar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Asia Pacific Way'?" *Pacific Affairs*, Vol.10, No.2 (1997), p.319-346; Shaun Narine, "ASEAN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3 (1999), p.63; Michael Leifer, "Review,"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3 (2001), p.485; Estrella D. Solidum, *Towards a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y*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Press, 1974), p. 172; 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2, (1991), pp.495-538.
- 41 錢理群,《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
- 42 Shaun Narine, "State Sovereignt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17, No.3 (2004), pp.423-450.
- 43 Michael Antolik,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New York: East Gate, 1990), p.142.
- 44 綜合參考Tobias Ingo Nischalke,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The 'ASEAN Way', a Realist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2, No.1 (2000), p.95; Nayan Chanda, *Brother Enemy-The War After the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pp.348-349.
- 45 David M. Jones & Michael Smith, "ASEAN's Imitation Community," *ORBIS*, Vol.46, No.1 (2002), pp.93-109.
- 46 Sheldon Simon, "Security Prospects in Southeast Asia: Collaborative Efforts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Pacific Review*, Vol.11, No.2 (1998), p.196.
- 47 何耀光,《西太平洋海洋秩序》,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頁473-474。
- 4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Southeast Asia*, Vol. XXI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p.444.
- 49 John Subritzky, *Confronting Sukarno: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1965*(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9), p.103.
- 50 〈得到西方暗中支持 蘇哈托推翻蘇加諾〉,《環球時報》,2001年8月17日,第11版。
- 51 林若雪,〈東協整合與兩岸關係〉,前揭書,頁55。
- 52 相關論點參考陳奕平,《依賴與抗爭: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 53 綜合參考Joseph A. Camilleri, "Alliances and Emerging Post-Cold War Security System," in Richard Leaver and James L. Richardson (eds), *Charting the Post-Cold War Order*(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pp.84-94;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Military Technology*, Vol.30, No.1 (2006), pp.321-323.
- 54 Lselotte Odgaard,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s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China," *Security Dialogue*, Vol.34, No.1 (2003), p.22; Tobias Ingo Nischalke,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The 'ASEAN Way', a Realist Spirit or a Phantom?" op. cit., p.98.



- 55 Michael A. Glosny, "Heading toward a Win-Win Fu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2, No.1, (2006), p.25.
- 56 Zalmay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p.xiii.
- 57 Evelyn Go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www.fpif.org/articles/china\\_and\\_southeast\\_asia](http://www.fpif.org/articles/china_and_southeast_asia).【2009.05.13.】
- 58 Dominik Heller, "The Relevance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for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7, No.1 (2005), pp.138-141.
- 59 Xuegang Zhang, "Southeast Asia and energy: Gateway to Stability", *China Security*, Vol.3, No.2, (2007), pp. 18-35.
- 60 綜合參考張錫鎮,〈印尼民主轉型和民主化軟著陸〉,李文主編,《東亞:憲政與民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90-191;Alan Collins 著,楊紫涵譯,《東南亞的安全困境》(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館,2004 年),頁96-117;Jrgen R?land, "The Nature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Security Dialogue*, Vol.36, No.4, (2005), p. 555.
- 61 宋鎮照,〈中國積極提升在東南亞區域的政經主導權〉<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134-1967.html>【2009.12.15.】
- 62 綜合參考Nicole Ball, *Security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The Security Legacy of 1980s and the Third World," in Thomas G. Weiss & Meryl A. Kessler, eds., *Third World Securi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1), pp.19-34.
- 63 李美賢,〈印尼新秩序時期的威權政治機制與官僚體制〉,《東南亞季刊》第1卷第4期,1996年,頁46。
- 64 David Brown,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161-163.
- 65 亞洲開發銀?,〈崛起的亞洲:變化與挑戰〉(北京:中國?融出版社,1997年),頁2;Amitav Acharya, "Southeast Asia's Democratic Moment" *Asian Survey*, Vol. 39, No. 3, (May - Jun., 1999), pp. 420-421.
- 66 綜合參考顧長永,《東南亞政治學》,前揭書,頁57-61;Leonard Wantchekon, "Clientelism and Vot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Beni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3, April 2003, pp. 399-422.
- 67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p. 8-27.
- 68 綜合參考陳佩修,〈泰國的軍事政變與政治變遷〉,《東吳政治學報》,第27卷第3期,2009年,頁65-106;Paul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15; Giles Ji Ungpakorn, *A Coup for the Rich: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Bangkok: Workers Democracy Publishing, 2007), pp.39-41.
- 69 Amitav Acharya, "Southeast Asia's Democratic Moment," op. cit., pp. 423.
- 70 David Held,"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political community: Rethinking democrac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Richard V. Ericson & Nico Stehr, eds., *Governing Modern Societ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p.42-59.
- 71 Paul Kennedy,顧淑馨譯,《創世紀》(台北:天下文化,1993年),頁156-171。
- 72 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前揭書,1999年,頁64-65。
- 73 綜合參考李文,《東亞社會變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年),頁112;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74 綜合參考Guillermo O'Donnell &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aniel Treisman,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76, No. 3, June 2000, pp. 399-457.
- 75 薩塔諾夫斯基,〈恐怖主義的全球化及其後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恐怖研究中心編,《恐怖主義與反恐鬥爭理論探索》(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頁63-64。
- 7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2007*, April 30, 2008;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05904.pdf>【2008.06.12.】
- 77 綜合參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 Norton & Co., 2004), p.559;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p. 102-103.
- 78 Angel M. Rabasa, *Southeast Asia After 9/11: Regional Trends and U.S. Interests*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pp. 8-9.
- 79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op.cit., pp. 405-411.
- 80 Greg Fealy and Virginia Hooker, *Voices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 A Contemporary Sourcebook*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6), p. 7.
- 81 綜合參考Gilles Kepel,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64-265;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 Qae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Melbourne: Scribe Publications, 2002), p. 179; Simon S. C. Tay,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9/11: Primacy and Partnership in the Pacific,"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28, No.1, 2004, p. 123.
- 82 綜合參考John Esposito, "Islam's Southeast Asia Shift, A Success that Could Lead Renewal in Muslim World", *Asiaweek*, 4 April 1997; S. Ahmad Hussein, *Islam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1969-1982: The Dynamics of Competing Traditions*, Ph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28.
- 83 綜合參考Dennis P. Walker, "Conflict Between the Thai and Islamic Cultures in Southern Thailand (Patani) 1948-2005," *Journal of Islamiyyat*, Vol.27, No.1,(2005), pp. 85-86 ; Astir Suhrke, "Loyalists and Separatists: The Muslims in Southern Thailand," *Journal of Asian Survey*,Vol.17,No.3,(Mar.1977), pp.241-242.
- 84 方金英、馬燕冰,〈泰國南部動亂的來龍去脈〉,《國際資料信息》,第7期,2004年,頁28。

- 85 綜合參考張麟徵，〈分離主義的內省與外觀〉，《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10期，1994年，頁2-5；Syed Serajul Islam, "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op. cit., pp.441-442.
- 86 綜合參考Adam Schwarz,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1994); Peter Chalk, "Militant Islamic Extrem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Paul J. Smith, ed. Terrorism and Violence in Southeast Asia: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o Stat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New York: M.E. Sharpe, 2005), p.19.
- 87 綜合參考宋國友，〈東亞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與美國霸權的變遷〉，《世界經濟與政治》，第7期，2004年，頁57-60；〈東亞區域主義的虛實〉，《中國時報》，2004年12月3日；Siow-Yue Chia, 〈東南亞經濟整合在東亞所扮演的角色〉，「FTA/RTA與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9月3日；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9; Erja Kettune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ASEAN Countries," in Leo Van Grunsven, ed., Regional Change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Regional and Local Responses to Changing Competitiveness (Aldershot, UK: Ashgate, 1998), pp. 43-53.
- 88 綜合參考榮勇，〈東亞「融風」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前掲書，頁59；J. Soedjati Djiwandono,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 ASEAN Perspective, in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The 1985 Pacific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83; Mancur Olson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 Seiji Naya & Michael G. Plum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fter 30 years of ASEA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4, No.2, (Nov. 1997), p.119
- 89 David A. Baldwin,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 4, Autumn 1980, pp. 477-481.
- 90 綜合參考Liu Fu-Kuo, "Beijing's Regional Strategy and China-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 Brief, Vol. 8, Issue 10, (May 13, 2008), pp.6-7;李國雄，〈「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政治經濟分析〉[http://www.crossstrait.org/version1/subpage7/200503/digest\\_list.php?number=14](http://www.crossstrait.org/version1/subpage7/200503/digest_list.php?number=14)【2007.04.23.】；洪讀，〈東協為核心的區域經濟整合及對我國的衝擊〉，<http://old.npf.org.tw/monthly/0401/theme-112.htm>【2009.12.10】。
- 91 綜合參考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懷藝出版社，1997年），頁251-252；Emma Chanlett-Avery and Bruce Vaughn,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i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Indi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7 January 2008, p.CRS.1; Myrna S. Austria,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pproaches and Process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p.8.
- 92 綜合參考〈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組自由貿易區對我國之影響及因應對策〉，[http://ekm92.trade.gov.tw/BOFT/OpenFileService?file\\_id=26a75a416e950825ac2beb096c81b384&context=83ee4cf785ad25a257533d1ac7c3b82f](http://ekm92.trade.gov.tw/BOFT/OpenFileService?file_id=26a75a416e950825ac2beb096c81b384&context=83ee4cf785ad25a257533d1ac7c3b82f)【2010.02.22】；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86, No. 4, July/August 2004, pp.2-16.
- 93 吳玲君，〈東協國家與東亞經濟合作：從「東協加三」到「東亞高峰會」〉，《問題與研究》，第46卷第2期，2007年，頁117-118。
- 94 綜合參考蔡東杰，〈大國各自盤算 東亞共同體前途未卜〉，《青年日報》國際安全論壇專欄，2009年11月12日，第7版；Myrna S. Austria,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pproaches and Processes, op. cit., p.5; Ted G. Carpenter, "From Interveno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 after the Miracle(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8), p.294.
- 95 金熙德，〈「10+3」框架與中日政策取向〉，陳喬之主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06。
- 96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op. cit., p. 103.
- 97 綜合參考王廣武著，姚楠譯，〈東南亞與華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205；何國忠，〈政治和文化語境下的「馬來西亞華人」語義辨析〉，李元謹，〈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2002年），頁48；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p.16-17.
- 98 綜合參考肖歡容，〈地區主義：理論的歷史演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8；Joseph Y. S. Cheng,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pp. 83-126.
- 99 David M. Jones & Michael Smith,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Summer 2007), p.184.
- 100 邱垂銘，〈東協發展的評估〉，《國際關係學報》，第2期，1979年，頁80-81。
- 101 綜合參考Peter Lewis Young,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in the South Sea," Asian Defence Journal, November 1995, p.26; Lee Lai To,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8, No.3, 1995, p.541; "KL Developing Resort in Spratly Islands," Straits Times, May 4 1991, p. 2; "Too Much Made of Problem with Spratlys—Mahathir," Straits Times, August 22 1993, p. 17; Eric Morris, "Brunei Seeks Security in an Unstable Region,"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25, No.10, (October 1992), p. 938; The Fourth 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urabaya, August 23-25 1993, pp.18-19, 97.
- 102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Ltd., 1961), p.2. 103 Carlyle A. Thayer, "Southeast Asian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NBR ANALYSIS, Vol.18, No, 5, April 2008, pp. 5-14.
- 103 Carlyle A. Thayer, "Southeast Asian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NBR ANALYSIS, Vol.18, No, 5, April 2008, pp. 5-14.

# 美國海軍憲法號軍艦

著者／翟文中

海軍官校74年班【美國能源部桑蒂亞Sandia國家實驗訪問學者(2002年)】  
歷任海軍總部情報署、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戰略規劃室與整合評估室服務  
現為海軍備役上校

當前，許多國家海軍由於經費不足或是外購管道受阻，致使海軍戰鬥序列中仍保有艦齡超過半個世紀的老舊艦艇。前者，在非洲與拉美等第三世界小型海軍國家經常可見；我國海軍迄今仍在使用老舊的茄比級（Guppy class）潛艦則被歸屬為後者。然而，對於世界首強的美國海軍而言，其戰鬥序列中仍保有一艘兩百餘年的木質船身帆船，自然令許多人感到不解。然而，若對這艘老舊帆船與美國海軍甚或國家歷史間的連結有所瞭解後，上述的疑問就可獲得滿意的答案。這艘名為「憲法號」（USS Constitution）的木質船身三桅重巡防艦，係由美國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命名，該艦一共經歷了四十餘次海戰，屢建奇功從未戰敗，她是美國「力量、勇氣與自由」的象徵，更是美國海軍傳統與海權歷史的最佳見證。

1785年後，由於缺乏經費維持海軍艦艇，新成立的大陸海軍（Continental Navy）在將最後一艘軍艦出售後，已無任何軍艦可以使用。這個年輕剛成立的新生國家，在其後的九年間幾乎形同沒有海軍存在。然而，就在這段期間，美國航行於非洲北岸的商船多次遭到阿爾及爾（Algiers）非法扣留，因此，當

時的財政部長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遂要求美國海軍對航經地中海的美國商船提供必要保護。其後，美國國會對此要求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並於1794年3月通過了海軍法案（Naval Act of 1794），批准撥款建造「憲法號」在內的六艘巡防艦，這是美國海軍最早一批建造的作戰艦艇。「憲法號」由漢佛瑞斯（Joshua Humphreys）設計，麻州波士頓的哈特斯（Edmund Hartt's shipyard）船廠負責建造。該艦於1794年11月安放龍骨，1797年9月舉行下水典禮，1797年10月正式啟用。

「憲法號」的重要諸元如下：排水量2,200噸，船長204英呎（62.2公尺），船寬43英呎6英吋（13.3公尺）；船艏吃水21英呎（6.4公尺），船艉吃水23英呎（7.0公尺）；前桅高度198英呎（60.4公尺）、主桅高度220英呎（67.1公尺）、後桅高度172英呎6英吋（52.6公尺）；風帆面積42,710平方英呎（3,968平方公尺）；最大航速為13節（24公里/小時）。

「憲法號」的主要武裝包括了30門24磅砲與20門32磅砲，1797年成軍時編制員額450人（含55名海軍陸戰隊），現有編制計軍官與士官共60人，艦長為海軍中校。「憲法號」的設計相當獨特，其採用圓滑的水下船線設計，如此有



助提升該艦的航速與機動性。船體結構係以橡木建造，此橡木產於喬治亞州的外海小島，為一材質緊緻建材（每立方呎重75磅或每立方公尺重1,201公斤）。「憲法號」的船體厚度為530mm，約與現代魚雷直徑相埒，遠較當時其他國家巡防艦的船體厚度460mm為厚。

1798年5月，美國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下令海軍所有艦船出海執行巡弋任務，用以確保美國的海商貿易不致遭到法國私掠船的干擾。當時，「憲法號」由於尚未完成武裝無法及時出海，遲至當年7月22日，其才在艦長尼可爾遜（Samuel Nicholson）的指揮下執行了首次任務，於紐約與新罕布夏（New Hampshire）間的水域實施巡弋。其後，「憲法號」被指為旗艦，率領數艘軍艦前往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水域，搜尋法國武裝船舶並為航行此一水域的美國商船提供保護。此時，美國航行於地中海的商船亦經年地遭到海盜襲擾，加上摩洛哥（Morocco）、阿爾及爾、突尼斯（Tunis）與的黎波里（Tripoli）等北非國家，要求進入此等水域的美國商船必須向其進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遂決定派遣軍艦至地中海水域保護美國商船。1803年8月，「憲法號」離開波士頓前往地中海水域，此行她擔

任普雷布爾（Edward Preble）上校的旗艦，主要任務係對的黎波里港執行封鎖與岸轟時的火力支援。1805年4月，美國海軍陸戰隊攻陷並佔領了的黎波里，同年6月，雙方於「憲法號」上簽署了和平協定，此後美國商船毋須向的黎波里進貢。其後，「憲法號」等數艘美國艦艇亦對突尼斯進行了短期封鎖，雙方亦於8月14日締結了和平協定。至此，困擾美國多年的北非海盜襲擾與強迫商船進貢等陋息宣告終結。

1812年5月開始，美國與英國間的緊張關係日漸地升高，美國於6月18日對英國正式宣戰。7月12日，「憲法號」在艦長赫爾（Isaac Hull）指揮下出海加入由五艘戰艦組成的羅傑斯（Rodgers）支隊。7月17日，赫爾在新澤西州艾格港（Egg Harbor）外海發現五艘戰艦，他最初以為這是羅傑斯支隊，等到翌日清晨，赫然發現這是由「風神號」（HMS Aeolus）、「非洲號」（HMS Africa）、「貝爾維迪拉號」（HMS Belvidera）、「奎爾里耶號」（HMS Guerriere）與「夏儂號」（HMS Shannon）等五艘戰艦組成的英國海軍支隊。這時，「憲法號」由於風力太弱無法快速機動，幸賴艦長憑著機智加上船員齊心協力，英艦在追擊了57個小時後仍被「憲法號」逃脫並安全地返回波士頓港。

8月19日，「憲法號」與英艦「奎爾里耶號」於聖勞倫斯灣（Gulf of Saint Lawrence）東南水域再度相遇。在這次戰鬥中，「奎爾里耶號」雖然先發制人的發出了第一砲，然而「憲法號」在艦長赫爾的卓越指揮下，僅用了35分鐘就贏得了這場海戰的勝利。在雙方接戰過程中，英艦擊中「憲法號」的砲彈竟破其厚實的船體彈了回來，一位美國水手不禁驚呼：「她的舷側是鐵製的！」（“Huzza! her sides are made of iron!”）經此戰役，「憲法號」獲得了「老鐵甲艦」（Old Ironsides）的綽號，在歷經戰火的初次洗禮後，這艘三桅帆船亦開始了其在美國海權史上的傳奇之旅。

同年12月中旬，「憲法號」抵達巴西附近水域，執行拿捕英國商船與破壞英國航運的任務。12月29日，「憲法號」與英艦「爪哇號」（HMS Java）相遇發生激烈戰鬥，「爪哇號」與「奎爾里耶號」屬於同級巡防艦，在這次戰鬥中遭到重創毀損，「憲法號」再度獲得了海戰勝利。由於，「憲法號」與英艦接戰取得了一系列勝利，英國海軍部（British Admiralty）遂下令禁止英國巡防艦與美軍重巡防艦進行一對一的接戰，英軍必須擁有數量優勢時方得對美艦發起攻擊。1815年2月20日，

「憲法號」在馬迪拉群島（Madeira Islands）外海與英艦「賽安因號」（HMS Cyane）與「利菲特號」（HMS Levant）遭遇，經過四個小時激烈鏖戰，「憲法號」再次取得對英國海軍的勝利。

其後，「憲法號」被安置於麻州波士頓港內。1820年4月，海軍查爾斯頓造船廠（Charleston Navy Yard）廠長赫爾指示對其進行改裝，當時「憲法號」正備便前往地中海水域執行任務。1821年與1824年，「憲法號」兩度擔任美國海軍地中海支隊的旗艦，這兩次海外部署的時間均長達三年餘。1828年7月，「憲法號」返回母港波士頓，這時她在海軍的服役時間已超過了31年，遠遠超過木質船身軍艦預期的15年服役年限。在這種情況下，海軍部長約翰·布蘭奇（John Branch）遂要求對「憲法號」進行一次總檢，根據海軍查爾斯頓造船廠廠長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估計，該艦的大修費用約需15萬7,000美元。1830年9月14日，波士頓的新聞媒體揭露了一個訊息，該報導錯誤地指出海軍準備將「憲法號」拆解，兩天後作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發表了一篇名為「老裝甲艦」的詩作，喚起了美國社會大眾對這艘軍艦的記憶與感情，最後國

會同意撥款對其進行重建，「憲法號」於是幸運地被保留了下來。

1835年8月，「憲法號」再度前往地中海水域擔任支隊旗艦，在海外部署的兩年間，她的主要任務係例行巡弋與港口訪問。1839年3月，「憲法號」成為美國太平洋支隊旗艦，負責於南美洲西岸執行巡弋任務。1844年至1845年間，在普西瓦爾（John Percival）上校的指揮下，「憲法號」進行了美國海軍的首次環球航行，此次航行總里程為52,279英哩（45,400海哩），「憲法號」在海上共航行了495天。其後，「憲法號」三不五時地出國進行港口訪問，她曾至中國廣州訪問。1848年12月，「憲法號」加入地中海支隊，在歐洲從事港口訪問時，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與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二世（King Ferdinand II）均曾登艦參觀，並接受廿一響禮砲致敬。1851年1月，「憲法號」被置於海軍布魯克林造船廠（Brooklyn Navy Yard）。1853年3月，該艦離開造船廠加入非洲支隊並至賴比瑞亞（Liberia）進行港口訪問。1855年6月，「憲法號」除役並被安置在海軍樸資茅斯造船廠（Portsmouth Navy Yard），正式卸下擔任國防第一線的重責大任。

1850年代，美國海軍開始引進蒸汽推進系統，風帆推進的船舶多轉為執行訓練任務。1857年，「憲法號」被移做訓練艦，美國內戰結束後，該艦被移至馬里蘭州安那波里斯（Annapolis）的海軍軍官學校，做為訓練未來美國海軍軍官航海技能的教具。在此期間，「憲法號」於每年六至八月載著官校學生出海進行航行訓練，其餘時間則泊於港內做為學生見學之用。1871年，「憲法號」的船況日漸惡化，該年九月其退出訓練艦行列，並被拖至海軍費城造船廠（Philadelphia Navy Yard）進行安置。1878年，「憲法號」被賦予一項特殊的任務，該艦負責將美國的參展品運至法國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Paris Exposition of 1878）會場，這是該艦最後一次海外航行。1881年，「憲法號」由於缺乏經費進行必要的維修，該艦於是除役結束了近百年的服勤生涯，其後「憲法號」長期泊於海軍樸資茅斯造船廠供人參觀。1896年，麻州國會議會費茲傑拉德（John F. Fitzgerald）要求國會撥款整修「憲法號」，使其能夠重返麻州波士頓的母港。1897年9月，「憲法號」被拖船拖回波士頓並歡度其百歲生日。然而，「憲法號」未來何去何從仍然充滿著許多變數。



1900年，美國國會授權對「憲法號」進行整修，但是並未編列任何經費用以執行這個計畫，因此這段期間，該艦的維護經費多來自於民間捐款。1905年，海軍部長波拿多（Charles Joseph Bonaparte）提議將「憲法號」拖至外海做為靶船，此訊息披露後引發了社會大眾的強烈反對，為了化解這漫天而來的抗議聲浪，美國國會同意撥款10萬美元對「憲法號」進行重建。1907年起，「憲法號」成為一艘博物館船（museum ship）並且開放社會大眾參觀。1924年2月，海軍軍令部長艾伯爾（Edward Walter Eberle）上將指示海軍檢驗組（Board of Inspection and Survey）對「憲法號」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發現其船體結構已經嚴重地毀損，若要保留該艦必須進行深度大修，預估費用為40萬美元。海軍部長韋伯（Curtis D. Wilbur）遂向國會提議這筆經費可向民間募款，其亦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執行「憲法號」重建的相關業務。

最後，「憲法號」的重建費用為94萬6,000美元，民間捐款超過60萬美元，不足部份由美國國會撥款支應。1931年7月，「憲法號」重建完成再度成為現役軍艦。其後，根據海軍部長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當初

的規劃，「憲法號」展開了訪問全美各個港口的行程，在為期三年的時間中，該艦訪問了美國東西兩岸超過90個的城市，範圍涵蓋緬因州（Maine）至巴拿馬運河區（Panama Canal Zone）的大西洋海港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各個城市。1934年5月，「憲法號」返回母港波士頓，其後她成為軍艦博物館對外開放，每年吸引約10萬名的觀光客造訪。1940年，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指示，「憲法號」不得除役永遠列於美國海軍戰鬥序列。麥格魯德（Bruce Magruder）將軍更將「老裝甲艦」的稱號賦予美國陸軍第一裝甲師（1st Armor Division），用以向「憲法號」致上最高的敬意。1954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要求海軍部長負責「憲法號」的保養維修。1973年4月至1974年4月間，「憲法號」再次入塢進行了大修，全部工程皆以維持其於1812年時的構型（configuration）做為目標。

1976年4月，「憲法號博物館」（USS Constitution Museum）成立並由私人經營，這個博物館每年吸引了眾多的旅客前來參觀「憲法號」軍艦。1992年，「憲法號」入塢對整體結構做了下水以來最嚴密的檢查，由於兩個世紀以來，「憲法號」執行的任務由最初的

戰艦，到其後的訓練艦甚或兵員接收艦，許多原始設計與組件已被移除或是經過多次改裝。為了回復「憲法號」的原來面貌，美國海軍歷史暨傳統司令部（Naval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的波士頓分遣隊 於1993年時檢視了漢佛瑞斯的原始設計，並對該艦的五個主要結構組件進行確認，用以預防船隻出現中拱現象。除此之外，美國海軍還運用了超音波與非破壞檢驗等現代科技，對「憲法號」外部無法以肉眼觀測到的隱藏缺陷進行檢視。1995年，「憲法號」的重建工程全部完成，這次大修共花費了1,200萬美元。

1997年7月，做為慶祝其200週年活動的重要項目，「憲法號」在睽違大海116年後再度揚帆出海，其藉著風力在麻州外海以六節的速率自力航行，當時隨「憲法號」出海航行的貴賓計有美國海軍部長、海軍軍令部長、海軍陸戰隊副司令與參議員甘迺迪（Ted Kennedy）等顯要。翌日，「憲法號」在海上接受美國海軍「雷米吉號」飛彈驅逐艦（USS Ramage, DDG-61）、「哈利伯頓號」飛彈巡防艦（USS Halyburton, FFG-40）與海軍藍天使飛行特技小組的致意。當前，「憲法號」的官兵配合各種典禮、教育課程與特殊事件的運用與講解，

將「憲法號」締造的輝煌歷史傳遞給一代又一代的美國社會大眾。今年是「憲法號」贏得1812年海戰輝煌勝利的兩百週年紀念，艦長波納（Matt Bonner）中校在內的全艦官兵目前積極地準備，希望能以揚帆出海的方式慶祝這個意義非凡的紀念日。兩個世紀以來，「憲法號」以其英勇事蹟譜出美國歷史上最動人的史詩，她不僅是美國海軍與海權的締建者，無疑地更是美國國家光榮的見證者。👁️

## 參考資料

- 1 "USS Constitu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USS\\_Constitu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USS_Constitution).
- 2 "USS Constitution - formerly IX 21, formerly OLD CONSTITUTION, formerly CONSTITUTION - The oldest commissioned warship in the U.S. Navy," <http://navysite.de/ships/const.htm>.
- 3 "Naval Act of 1794,"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val\\_Act\\_of\\_1794](http://en.wikipedia.org/wiki/Naval_Act_of_1794).
- 4 「憲法號」<http://baike.baidu.com/view/749885.htm>.
- 5 「永不退役永遠守護美國『憲法號』軍艦傳奇」<http://ocean360.net/?action-viewnews-itemid-689>.
- 6 「尖端科技軍事資料庫」

# Re-examining the U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著者／張競 Ching CHANG 陳玉珍 YuJane CHEN<sup>1</sup>

海軍軍官學校72年班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1998年班，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海軍中權軍艦艦長  
目前為中華民國榮譽國民，並任教於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與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海軍管屬

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系主任

The “Six Assurances” is an extremely unique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It literally creates a viable international norm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urther, given the origin of such unilateral political statement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it also establishes an alternative format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since it never has the formal codification, signing, ratification and depositary process generally adopted for pledging th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Authors of this paper intend to re-exam the nature of the Six Assurance from the angle of realpolitik because of its fundamental pragmatism. Various versions taken by different parties that satisfying their individual political preference is also a point to be noted in the paper so that to certify its utilizations. Nevertheless, examples and arguments will be suggested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statements noted in the Six Assurances. Issues regarding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will be discussed sin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uch assurances are driven by a US-PRC communiqué regarding the US arms transactions to Taiwan.

Moreover, whether the US would have the legitimate position to have such assurances will also be reviewed so that to assess the genuine functions of such political statements. Perspectives of various US administrations towards the Six Assurances are another dimension worth of review. The stances defined by the US Congress after it had aware of

such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may possibly reflect the potenti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in the futur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ve a genuine conviction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is not only the valuable political asset for both the U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a value human wisdom ever addres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and political practitioners in the sphere of diplomacy. To some extends, it also benefits Beijing as it may still have certain reluctances to corner Taipei into some track that the communist regime would never wish to happen simply because it may actually terminate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Facing some political commentators in Washington advocate to review the Six Assurances,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d a good reason to exam it again so that suitably arguing why such a practice is still a cornerstone support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Even such a political promise may not so perfect in its original design, yet, it does act as many parties involved originally expected. By the standards or criteria generally adopted 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t is never a perfect design. But its perfection has been validated by the executions in the past years. Authors of this paper are most willing to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udiciary arrangements and realpolitik.



###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 Six Assurances was originated b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s negotiating the third US-PRC diplomatic communiqué regarding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an extremely unique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It has literally created a viable international norm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ix Assurances is not perfect in its original design, yet, it does act as many parties involved originally expected. By the standards or criteria generally adopted 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t is far from a flawless design. But its perfection has been validated by the executions in the past years.

Notwithstanding the Six Assurances was promised by the Reagan government and some wordings within the original text has somehow become irrelevant to the reality, the political promises have been followed by subsequent US administrations with variation in the degree of emphasize between each administration. Although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was the request from Beijing to terminate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the Six Assurances can, to some extent, also serve Beij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y may still have certain degree of reluctances to corner Taipei, thereby forcing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simply due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sup>2</sup>.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original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since, unlik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no written preamble to the Six Assurances had ever existed to specify the purpose of these

political terms. It was a set of political statements unilaterally given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adership on Taiwan shortly prior to signing the US-PRC joint communiqué regarding the premises of terminating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The initial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was verbally delivered on July 14, 1982, to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by James Lilley and a message attached to these statements may more or less reflect the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 message is known as "I want to point out ..... this decision on a joint communiqué is based on a PRC decision only to use peaceful means to resolve the Taiwan issue. On this point, the U.S. will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PRC says, but also will use all methods to achieve surveillance of PRC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The intelligence attained would be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If there is any change with regard to their commitment to peaceful 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the U.S. commitments would become invalidated",<sup>3</sup> which at least reflects the origi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reason for signing the coming US-PRC communiqué on US arms sale to Taiwan.

Whether certain messages delivered by James Lilley on July 26 and August 16, 1982, to President Chiang can be also be viewed as the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is a matter of judgment. According to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messages of reassurance from President Reagan together with the Six Assurances such as "U.S. side has no intention of setting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he U.S. does not agree to the PRC's demand to have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m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predicated on one thing: that is, that the PRC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only to use peaceful means to settle the Taiwan issue”, “The U.S. will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PRC says, but also will use all methods to achieve surveillance of PRC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The intelligence attained would be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If the PRC agrees to the U.S. suggestion and issues the joint communiqué, the U.S. would contin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sell such military items as Taiwan really needs”, “any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will of course change our judgment of Taiwan’s defense needs” and “Our only interest in this matter is that any resolution of these issues be accomplished peacefully. We will do nothing to jeopardize the abil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deal with this matter in their own way” had been delivered to Taipei during three James Lilley’s visits to President Chiang.<sup>4</sup> Nonetheless, all these messages could only implicitly express the goal of the Six Assurances. However, according to James Lilley, the Six Assurances was simply a sign to Taiwan that it was not being abandoned b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up>5</sup>

Theoretically,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is unilaterally init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up>6</sup> there was no legitimate space lef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add their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shape the final result of these statements. Otherwi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would have prepared terms much favorable to its political preferences, should it own the privilege to put its wo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dministration’s mouth at that time. Nevertheless, Taiwan undeniably had the concession of a prior notice for the coming US-PRC joint communiqué

as well 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ultation on the contents of the Six Assurances before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It indicated that mutual trust did exist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during that period of the US-ROC diplomatic history. Yet, the influence of Taipei could not compete with the pragmatic interests that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needed from Beijing at the time. Otherwise, Taipei would simply pay its greatest effort to stop another US-PRC communiqué that would fundamentally damage its security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it took James Lilley three visits to settle the whole issue,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certain reconciliations were needed then. We may believe that certain inputs from Taipei to shape the final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should not be totally groundless.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categorized the format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non-paper employed by the US Foreign Service for American diplomacy.<sup>7</sup> As defined in his article, ‘As used in American diplomacy, a “non-paper” is a document on plain bond paper, without seal or signature, intended to convey a position or policy in an informal but nevertheless authoritative manner’. Despite this, we may still believ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Six Assurances is undeniably official. Nonetheless, the Six Assurances had never ever gone through any formal codification, signing, ratification and depository process generally adopted for pledging th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in charg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therefore should not expect the Six Assurances would have the same capacity like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has not been as solid a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yet, these statements unquestionably reflect U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from the beginning. Fur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addressed as the US policies by various actors who own the authority to say so. For example, immediately after the 1982 August 17 US-PRC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s was settled, at a hearing on August 18, 1982, titled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 Hous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contents of the Six Assurances, “did not agree to set a date certain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no mediation role for the U.S.”, “nor will we attempt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no change in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 Chinese at one point suggested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e revised. We have no plans to seek any such revisions” and “should not be read to imply that we have agreed to engage in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Beijing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are addressed in the prior prepared statement offer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hn H. Holdridge though some phrases were not completely identical.<sup>8</sup>

Holdridge’s statement at this hearing was later adopted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Stanley Roth on May 15, 1998, to reassure the validness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U.S. policy by a written statement noting the administration upholding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articulated by then-Assistant Secretary Holdridge in his 1982 testimony to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to questions posed at a hearin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May 14, 1998.<sup>9</sup> Moreover, on March 8, 2001, at a hearin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U.S. Foreign Polic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 explicitly noted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remained U.S. policy to Senator Jesse Helms an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ould never favor consulting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sup>10</sup>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has assur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ould continue to follow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policy so that ex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 mediation and putting pressure on Taiwan to go to the bargaining table as attending the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in March 2002.<sup>11</sup>

Also, it is believed that President Bush himself did not respond to the linkage of reducing missile deployment targeted at Taiwan to a restraint of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proposed by PRC President Jiang Zemin at the U.S.-PRC summit in Crawford on October 25, 2002, was based on policy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the Six Assurances.<sup>12</sup> The Six Assurances is also accepted by researchers to be an essential element like the three communiqué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guiding the US policies on Taiwan.<sup>13</sup> In spite of such a perception, the Six Assurances is not listed in the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bu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ree US-PRC communiqués are indisputably included.<sup>14</sup>

Interestingly, the Six Assurances is sometimes believed existing in a form of formal document that directing th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sup>15</sup> Yet, there was no formal codified version ever published by any agency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as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were initially stated. Actually,



the Six Assurances was delivered by James Lilley in his capacity as the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in the form of a blind memo with no letterhead or signature to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through Fredrick Chien,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up>16</sup> Yet, readers of this study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is on the other hand perceived as a relevant part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up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sup>17</sup>

Nonetheless,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can be emphasized as US policy but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may also urge certain political maneuvers which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s the con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For instance, at the hearing titl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hosted by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then reiterated the Six Assurances as the US policy<sup>18</sup> whilst actively advocating Taipei and Beijing to dialogu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ithout preconditions”.<sup>19</sup>

From the answer of a question taken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at November 10, 2004 Daily Press Brief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d been indisputably again affirmed by the statement, “There is no change in U.S. policy, including regarding the Six Assuranc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and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up>20</sup> This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d been interpreted as prai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President Chen’s initiative of cross-strait peace proposals delivered in a national security meeting in Taipei.<sup>21</sup> Nonetheless, the Six Assurances is addressed to be th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once more.

The next surge of address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ppened in 2007 as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dramatically deteriorated by President Chen’s political maneuvers at that time. It was reported that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on June 14, 2007, to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at an opportune time while meeting with Raymond Burghardt, the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President Chen believed that it was essential to prev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downgrading Taiwan’s sovereign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up>22</sup> It was reported that Raymond Burghardt did not directly respond to President Chen’s request then.<sup>23</sup> Likewise, there is no response to President Chen’s request from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administration at all.

The ROC Representative to Washington Joseph Wu later paid certain efforts to retrieve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Six Assurances from President Reagan’s archive a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variants of the so-called Six Assurances. According to Wu, the record of the Six Assurances is restricted as state top secre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no one would have the access to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Nonetheless, Joseph Wu also claimed that he failed to access the file left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 he could not acquire the true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sup>24</sup>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eclined to respond to President Chen’s request of restating the Six Assurances, it more or less proved that these political propositions are essentially the privilege exclusively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dition political interactions around Taipei, Beijing and

Washington.<sup>25</sup> Allowing others to acquire political leverage from addressing the Six Assurances would be fundamentally unimaginable.

President Chen's pledge of restat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d initiated the interest of review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after so many years. As argued by Randall Schriver, a former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ven if Taiwanese leaders got their wish, would they in fact be convinc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so-called assurances are appropriate for their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sup>26</sup> certain assurances contained within the Reagan's Six Assurances can only reflect to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in 1982. A set of "six new assurances" is proposed by Randall Schriver in the same article, but no response from the US administration by any means but his perspective has been positively responded by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with written statement.<sup>27</sup>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o mention that Randall Schriver himself had never reviewed the validness of the Six Assurances during his service for the US government and charging affair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Further, on June 16, 2011, within the testimony provide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apacity of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Randall Schriver still questione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honors this elem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to express his concern of *"not to give prior consultation to China on potential U.S. arms sales to Taiwan"*<sup>28</sup> in his written statement though he had ever criticize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ix Assurances before and never mentioned any

word with this regard in his version of "six new assurances".

The Six Assurances was mentioned again in early 2011 after the second joint statement issued by President Obama and Hu Jintao. Three communiqué and Taiwan Relations Act are separately noted by Secretary Clinton and President Obama. Nevertheles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greed that U.S.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during Raymond Burghardt visit in Taipei for discussing the joint statement with President Ma on January 25. It was reported that Burghardt reaffirmed the Six Assurances in his press conference afte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Ma.<sup>29</sup>

Another wave for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emerged at the two hearings titled "Why Taiwan Matters" hosted b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eparately held on June 16 and October 4, 2011. It is such a surprise to read the record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se two hearing sessions that certain experts could misunderstand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o inaccurately whilst criticizing Secretary Powell's statement. It is recorded that Ms.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Miami and Senior Fellow a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ever said, "In 2003,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blished a handbook entitle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If I had a cell phone, I would be typing OMG. After that, Colin Powell, a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is not a sovereign state.' Violation of six assurances in Taiwan Relations Act—well, he misspoke".<sup>30</sup> Whether or not did Secretary Powell's statement

violate the Six Assurances 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a matter of personal judgment, yet, no Six Assurances was ever not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certain. Nevertheless, Ms. Dreyer's real stance still can be clearly verified by her written statement attached in the record. In her written statement, a non-existent linkage between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d not been again created.<sup>31</sup>

It also need to noted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as addressed by congresswomen Ileana Ros-Lehtinen,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in her opening statement 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on June 16, 2011. Meanwhile, Randall Schriver, in the capacity of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orally expressed his perspective on the Six Assurances, "*we have six assurances that we still allege to honor*",<sup>32</sup> in this hearing session hosted by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ogether with a written statement already mentioned abov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was held on October 4, 2011. The Six Assurances was reaffirmed several times by Kurt Campbel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Beijing on US arms sale to Taiwan was also addressed repeatedly.<sup>33</sup>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r. Kurt Campbell did not specifically reply to a request by congresswoman Karan Bass by stating "I knew you had said several time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a part of U.S. policy. As a new member, I was just asking if you could reiterate what the Six Assurances are". It was initially answered by Kurt Campbell as "They are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no prior consultations about arms sales" but immediately confessed with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variants of those and I would be more than pleased to make sure that in a private consultation come up and provide you greater clarity on those issues*".<sup>34</sup> It had actually touched a spot of controversy on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since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were not formally codified initially.

###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ix Assurances. Each of them may reflect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r political preference or even aspiration of future political destiny.

According to the "ROC Statement o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released on August 17, 1982,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offered by President Reagan to Taiwan on July 14, 1982 are:

In negotiating the third Joint Communiqué with the PRC, the United States:

1. has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2. has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3. will not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4.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6. will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RC.<sup>35</sup>

Another version is noted by Ambassador Harvey Feldman in various articles. It stat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1. Had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Had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



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3. Would not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4. Would not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d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6. Would not exert pressur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up>36</sup>

According to Feldma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initially expressed to President Chiang on July 14, 1982, by James Lille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1. Had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Had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RC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3. Would not play a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4. Would not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d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6. Would not exert pressur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sup>37</sup>

This version is indeed similar to other versions from all possible official channels except several wordings used here.

There is another version claimed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hn H. Holdridge propos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sted as below. Nevertheless, this version has been strongly defied by Harvey Feldman in his article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and is never consistent with the version publicized by Taipei on August 17, 1982. Even the testimony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delivered by Holdridge himself at the hearing on August 18, 1982, titled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sup>38</sup>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ext shown as following:

1.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t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2.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the term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3.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engage in advance consultations with Beijing before deciding on U.S. weapons transfers to Taiwan.
4.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rve as a mediator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5.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f Taiwan (that is, while we would continue to regard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the question of reunification would be left to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ith our only stipulation being that reunification be by peaceful means.) Nor would we exert any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6.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formally recognize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sup>39</sup>

Based on Holdridge's statement, the website of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listed a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below,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July 1982

In 1982, during negotiations for the Third United States - China Joint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the Taiwan government presente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ix points that it proposed the United States use as guidelines in conducting United States - Taiwan relations. According to former Ambassador John Holdridge,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these points, conveyed this assent to Taiwan, and, in late July 1982, informed the Congress of the agreement. The six points are:

1.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t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2.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the term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3.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in advance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4.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mediat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5.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its position abou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which was, that the question was one to be decided peacefully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nd would not pressure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6.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formally recognize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sup>40</sup>

This version is accepted by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and publicized on their official website.<sup>41</sup> Likewise, it is noted by Kerry Dumbaugh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 his report.<sup>42</sup> This version was also adopted by Ms. Dreyer in her prepared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hearing titled "Why Taiwan Matters" hosted b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held on June 16, 2011.<sup>43</sup>

To be hones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any consensus on the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many versions are actually followed by communities with various political preferences. Different versions already turn to be basis for political accusations. Any effort to reach reconciliation on the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will be most likely inconclusive since there was no codified version at the very first beginning.

Nevertheless, on September 14, 2011, Chairwoman of the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Ileana Ros-Lehtinen introduced H.R. 2918,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it contains a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noted as below,

SEC. 106. CONTINU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S GUIDELINES IN CONDUCTING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Notwithstanding any communiqués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assent to the six assurances provided to Taiwan in July,

- 1982, includ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
1. has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2. has not agreed to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3. will not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4.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 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will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up>44</sup>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text of the Six Assurances formally codified by a branch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t may provide much authoritative clarification of the text noted for the Six Assurances, regardless whether this bill may eventually pass or not. The process of codific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has been already completed by an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th no immediate objection from any agency charging th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uthors of this study would further argue whether the text of the 1982 Six Assurances may still be meaningful according to the text shown in the draft of the bill.

### ***Text Analysis of the Six Assurances***

To conduct a text analysis on the Six Assurances, it may inevitably notice that there are mainly two forms for the beginnings of each assurance, “has not” and “will not”. Most likely, items start with “has not” should reflect to the immediate political event, i.e. the coming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 to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ubstantial wordings

of these four assurances,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are two item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arms sale but the other two statements,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re only in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Nevertheless, these four statements are seemingly reflecting the US stances at the moment right before signing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 to Taiwan. These four assurances were very unlikely designed to address long term US 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phrases they have adop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other two statements,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nd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well present long-lasting US policies on Taiwan and China. Regardless of the implication of the phrases chosen at the moment, all these six statem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US persistent stances toward Taiwan eventual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hoosing such wordings turned to be insignificant in any way.

If we scrutinize each assurances noted in the Six Assurances by realities accordingly, we may apprehend that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are not still so consequential since the dynam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d already reshaped the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se political propositions. First, the promise of excluding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 tight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ent noted in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If the US-PRC Communiqué signed on August 17, 1982 ha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certain premises of terminating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then how can we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nfirm that the situation becomes mature and all conditions requested have fully been satisfied already? Setting a date before the realities can be totally satisfactory is literally reversing th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It therefore needs no worry on whether any date will be selected to stop arms sale to Taiwan befor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can be completely settled.

The second assurance about never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is also a matter in no way needs to worry about.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sultation of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First, any items included by the arms sale may naturally contain military significance. In another words, all these articles may be lethal thus causing damages or even fatalities to soldi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hould any armed conflict really happen in the future. If that is the case, who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may have the authority and dare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to allow these products becoming assets own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med forces that potentially producing deadly effects to their military personnel? The political stake is simply unbearable. Given the political calculations mentioned here, all the answers for the consultation of any item existed in the arms sale shopping list for Taiwan should be “no”. If no other responses may possibly be issued by Beijing, then it is virtually meaningless to engage in any prior consultation. In essence, it is totally logically irrational to imagine such kind of consultation. Although a briefing to the PRC officials on arms

sale to Taiwan after the decision already made is a sensible and understandable diplomatic gesture, yet, it should never be confused with the prior consultations.<sup>45</sup>

Second, adding the PRC’s perspectives to the US arms sal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can only increase the overall complexity of the process. The arms sale itself is an inter-agency task that requiring extensive reconciliations and consensus-buildings within the US administration. No segment in the whole task force managing arms sale may have the privilege to override perspective of other agencies. It simply reminds us that all cases of arms sale need to go through scrutiniz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agency involved for the decision to pass unanimously. Hence, no agency in the arms sale process would impart its privilege to a foreign state and risk damaging its professionalism and reputation by foreig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y arms sale containing foreign intervention will certainly undermine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supporting US security interests. It is extremely unlikely to blend any external factor into such national security formula. If the closest US allies do not have a say in associated arms sale processes to their neighboring nations, how can a potential strategic competitor possibly gain such a privilege? Can the leadership in Washington afford the political damages caused by potential accusations of surrendering such an exclusive right to foreign states?

Third, allowing PRC’s involvement in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is essentially opening the Pandora’s Box. There are many sets of countries containing tensions may easily lead to armed conflicts but maintaining arms sa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a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rms sale to Taiwan, then how can Washington decline the same request from Israel regarding arms sale to surrounding Arabic states? Likewise, Greece, Turkey, India and Pakistan may also deliver similar requests to the United States. Given the potential of such terrible consequences, a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Beijing on arms sale to Taiwan is an untouchable red line that one should never ever attempt to cross. Beijing may request Washington to comply simpl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fundamentally intends to negate every military item to Taiwan through arms sale channel. Hence, this request is in essence a pseudo-proposition which should only deserves a straightforward answer - no.

Regarding the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 was unquestionably a correspondence to Beijing's request prior to the discussion for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This was signified by Holdridge's testimony, “the Chinese at one point suggested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e revised. We have no plans to seek any such revisions”, right after signing the communiqué in 1982.<sup>46</sup>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lly followed this assurance i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and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If we insist that the term “revise” means a comprehensive overhaul, then such an act has never taken place so far. However, if we adopt a more flexible definition of “revise” to include amendments made by other legislation bills passed by the US Congress, as well as certain US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s of which had substantially altered the practices note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 then this assurance has not been perfectly follow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all the alternations

regard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re apolitical in nature.

It is clearly n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de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s been amended through various schemes including follow-on acts and US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s.<sup>47</sup> Particularly,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 13014 of August 15, 1996 titled Maintaini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signed by President Clinton has purposely and substantially altered certain practice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up>48</sup> Acts changed the practice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re specifically titled as “Amending laws” by the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Popular Name Table.<sup>49</sup>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all these amendments or alternations have never changed the main theme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aims establish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1979. Many amendments were made to influenc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that none of these amendments or alternations had been achieved prior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It therefore was reasonable to grant an assura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1982. Hence, this may indirectly demonstrate to the readers that the four assurances started with the phrase “has not” was made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 up to the point prior to signing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rather than a permanent guarantee as many people would rather choose to believe.

The statemen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political statement.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any legitimate US proclamation that defines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Many propositions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actors an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o address US stances over Taiwan. Even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frequently reaffirmed but the comprehensive context of the policy is still more or less untold. Further research to cover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arguments is required to address the US position on Taiwan's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the fundamental issue remains that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owns any legitimacy to decide Taiwan's political destiny.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have any legitimate right to decide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then Washington will need to bear the obligation to explicitly express its stances over the matter. Possessing the influences is attributed to the sphere of *realpolitik* but ownership of the legitimacy is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Given the power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stance to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aiwan is of undeniable importance. Yet,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gaged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several decades as it substantially exercises the possession over the territory of Taiwan, no diplomatic objection had ever formally delivered to the ROC government in Taipei, it is difficult to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ny legitimate right on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did uphold its own stances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three Baltic States as they were occupied by the Soviet Union but Washington did not have any legitimate position to intervene the matter. There are many similar cases still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decline to accept many political realities. But disagreements on these political

actualities do not justify the right for intervention. Neither the surviv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r the political destiny of Taiwan can merely rely on this assurance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legitimate right to decide upon th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In terms of *realpolitik* over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 is unquestionable. But the legitimacy is the factor that really matters. Anyway, this political statement is the core element that made leadership in Taipei and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repeatedly addressing the Six Assurances over the years without really considering its true implications.

The last two assurances started with "will not" can be reviewed together. The two statements,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nd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th have seemingly lost their significances in light of the intensive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negotiations at the moment. Started from September 12, 1990, since the first cross-strait agreement titled Kinmen Accord regarding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was signed, over forty formal negotiations had taken place and thirty-eight cross-strait agreements or equivalents were established.<sup>50</sup>

As we consider the categories covered by the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agreements, it is very hard to imagine that there is any space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unless the two sides approach into political negotiations in the future. Reluctances of political negotiations from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significant. As of now, conditions for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s have not yet matured. Even though, there is hardly any

expect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needed to “play an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ny more. On the same token,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exchanges and negotia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The 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se two assurances is extremely insignificant.

In summary, we have reviewed all the significances actually owned by each political terms contained by the Six Assurances for the moment. But the value of each assurance varies with time sinc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s fundamentally dynamic. Whether any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may become surprisingly important at certain occasion, the possibility can not be totally excluded.

### ***Conclu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x Assuranc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US, more precisely, President Reagan personally, to grant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was to alleviate the concerns from Taipei as Washington negotiated the arms transaction to Taiwan with Beijing. To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x Assurances, scrutin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nature and its subsequent implications of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is therefore needed.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US arms sale is never to satisfy the defens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curers but to serve the US security interests. It is obvious that all these arms transactions signifying a political

support to the regimes acquiring defense items, hardware or services, from the US since it represents these specific nations’ existence in the US security formula. In substance, the arms transactions may enhance the receiving states’ defense cap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symbolic contents may also boost the morale of these nations to keep their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ies parallel with the US security interests. It therefore needs to note here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does not guarantee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will automatically proceed with no objection from the US administration. As admitted by Admiral Keating in a seminar host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 July 16, 2008, the arms sale to Taipei could be frozen by the US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stabilization of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despite the risks of being criticized of violat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sup>51</sup>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case of Taiwan since Washington is the solely persistent arms provide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despite the interference from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well as security calculations over such period. Nevertheless, the US arms sale to Taiwan has been magnified by various administrations in Taiwan, particularly after 1979, as the political indicator of the US support to Taiwan. This highlights the rationale behind Taipei’s sensitivity regarding any potential US-PRC interaction regarding arms sale to Taiwan. On the same token, it justifies why a set of US assurances driven by the political bargai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arms transactions to Taiwan would be essential to the leadership in Taipei.



Another implications brought by the arms sale linkage is the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jointness between the procurers and the suppliers. In another word, interoperability can b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arms transactions since the process containing hardware, services and, in many cases, doctrines. Whether different armed forces can fight together and to defend common enemies shoulder to shoulder must rely on mutual understandings. To know features and thinking of your friendly forces is basis of establishing unity of effort and avoiding fratricide. The military exchanges may follow with the military procurements.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are vital elements in arms sale projects. Technical supports, logistics consult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establishment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arms sale. The possibility of expanding the sphere of military diplomacy to achieve high level officer visits, port calling, strategic dialogues and eventually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from simple military procurement relationship always exis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arms sale can be so essentia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What should be the right way to manage the Six Assurances for Taipei and Washington? Authors of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neither side should ever try to revise the Six Assurances, including any act that may seemingly enhance them, otherwise, such a political maneuver will inevitably deliver unnecessary political signal that may complicate th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f we never ask our partner to repeat the wedding oath from time to time as reaffirmation of their love, then similarly there should

be no reason for Taipei to ask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tate the Six Assurances. Sometimes, a lack of restatem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imply an invalidity of these political statements - it may simply imply an inconvenienc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either due to timing or political atmosphere, to do so. Forcing one's spouse to restate their wedding oath against their free will may ultimately lead to the failure of the marriage.

Taipei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US arms sale is never a relationship made to last forever. The origin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in essence circumstantial, especially, after Washington signed the third US-PRC communiqué in 1982. This stance was clearly addressed by the testimony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at a hearing in April 2004. It was told as Beijing meets the promise of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and subsequently adjusting its military posture accordingly, then in Kelly's own statement, "it follows logically that Taiwan's defense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sup>52</sup>

So Taiwan should never try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to clamp the US freedom of action and force Washington to restate them. It is most essential to keep Taipei's policies paralle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interests. All military leadership in democratic states knows in order to have the change to get the sword they want, they will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olitical masters can get the vote. Likewise, if Taipei would like to get the sword, they should support Washington to reach its objectives in the aspect of security. Is it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Authors here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expectation, no matter how illusive it may really be, is the basis of conviction,

and subsequently, commitment. Therefore, leaving the Six Assurances as it was actually may cause no harm, conversely any excessive action to challenge these cornerstones support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is totally unnecessary and may be dangerous. Perfection of political statements is achieved by execution, never its original text. 🇺🇸

## Reference

- Central News Agency.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affirm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June 16, 2007.
- Dumbaugh, Kerry.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877, July 23, 2008.
- Feldman, Harvey.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2-3: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 2007.
- . "Reagan's Commitment to Taiwan;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aiwan Communique." Th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23, 2001.
- .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American Asian Review 19, no. 3 (Fall 2001): 75-101.
- "H. R. 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ptember 14, 2011.
-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dited b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S. House, August 18, 1982.
- Hearing on U.S.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8, 2001.
-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estimony of Randall G. Schriver, Founding Partner, Armitage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16, 2011.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edited by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1, 2004.
- Kan, Shirley A.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341, June 24, 2011.
- Kan, Shirley A.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957, May 21, 2012.
- Kan, Shirley A., and Wayne M. Morrison. "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41952, August 4, 2011.
- Lilley, James, and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Lu, De-yun. "Bian Has Been Changing All the Time, Americans Will Not Be Taken in Any More." United Daily, June 16, 2007.
-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Record of Question - Daily Press Briefing on Taiwan -- Six Assurance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04.
- Presidential Documents 42963-42964. "Maintaini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Monday, August 19, 1996.
- Schrive, Randall. "Randall Schriver on Taiwan: Taiwan Needs 'Six New Assurances'." Taipei Times, August 22, 2007, 8.
- Snyder, Charles. "Us Praises Chen Shui-Bian's Peace Plan." Taipei Times, November 12, 2004, 1.
- . "Wu Rues Us Secrecy Issue." Taipei Times Jul 07, 2007, 3.
-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assurances.htm>.
-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http://www.ait.org.tw/en/key-documents.html>.
-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fapa.org/generalinfo/sixassurances.htm>.
-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Chronology of Meeting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2&CtUnit=2567&BaseDS D=21&mp=300>.
- . "Negotiated Agreement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4&CtUnit=2569&BaseDSD=7&mp=300>.
- The View from Taiwan. "Nelson Report: More on Arms Freeze." <http://www.michaelturton.com/blog/page/2/>.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mending Laws, Taiwan Relations Act,"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Popular Name Table, 2011 edition, 2011.
- . "Text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hapter 48-Taiwan Relations, Title 22-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2011.
- .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June 16, 2011.
- . "Why Taiwan Matters, Part 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ctober 4, 2011.
- Wortzel, Larry. "Wh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16, 2000.

- 1 \*Dr. Ching CHANG is th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ROC Society for Strategy Studies; \*\*Dr. YuJane CHEN is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 2 The occasion of delivering the Six Assurances has been specified by the "ROC Statement o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recited from Shirley A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341, June 24, 2011), 39 and note 101.
- 3 Harvey Feldman, "Reagan's Commitment to Taiwan;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aiwan Communiqué," *Th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23, 2001. (recited from the archive of the newsmag.com website, accessed: 2012/06/15, <http://archive.newsmag.com/archives/articles/2001/4/24/221517.shtml>).
- 4 Harvey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 2007), 2-3.
- 5 James Lilley and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note 101.)
- 6 Harvey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American Asian Review* 19, no. 3 (Fall 2001). (accessed: 2012/06/12, <http://ehis.ebscohost.com/ehost/detail?sid=d82c6d4b-9355-41c4-982d-c93815917fed%40sessionmgr12&vid=1&hid=6&bdata=JnNpdGU9ZWwhvc3QtbGl2ZQ%3d%3d#db=aph&AN=5719658>). In Feldman's pap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oldridge's statements claimed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initiated by Taipei has been strongly rebuked by Feldman.
- 7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2.
- 8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d.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S. House (August 18, 1982).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42-43 and note 111.)
- 9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42 and note 111.
- 10 Hearing on U.S. Foreign Policy, ed.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8, 2001).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26 and note 73.
- 11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27.
- 12 *Ibid.*, 21-22.
- 13 Shirley A. Kan and Wayne M. Morrison, "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41952, August 4, 2011), summary page and 4.
- 14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Key U.S.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for the Region," <http://www.ait.org.tw/en/key-documents.html>.
- 15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4.
- 16 Lilley and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 17 Shirley A.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957, May 21, 2012), summary page.
- 18 Please see the texts excerpted from state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Kelly at the hearing titl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hosted by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72-73.
- 19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ed.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1, 2004).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27 and note 75.
- 20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Record of Question - Daily Press Briefing on Taiwan -- Six Assurances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04). (Record is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4/38081.htm>).
- 21 Charles Snyder, "US Praises Chen Shui-bian's Peace Plan," *Taipei Times* November 12, 2004, 1. (accessed: 2012/6/14,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04/11/12/2003210698>).
- 22 Central News Agency, "President Urges US to Reaffirm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June 16, 2007). (accessed: 2012/6/2014, <http://www.roc-taiwan.org/UK/ct.asp?xItem=38543&ctNode=3244&mp=132&nowPage=2&pagesize=50>).
- 23 De-yun Lu, "Bian Has Been Changing All the Time, Americans Will Not Be Taken in Any More," *United Daily* June 16, 2007. (translated by AIT in a cable titled "Media Reaction: U.S.-Taiwan Relations", sent on June 18, 2007, revealed by Wikileaks, data accessed: 2012.6/11, <http://wikileaks.org/cable/2007/06/07AITTAIPEI1381.html#>).
- 24 Charles Snyder, "Wu Rues US Secrecy Issue," *Taipei Times* Jul 07, 2007, 3,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07/07/2003368445>).
- 25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proposed to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to counter the impact possibly caused by a white paper regarding Taiwan policy relea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ough 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Six Assurances might not be necessarily opposite to the text of the PRC white paper. Please see Larry Wortzel, "Wh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affirm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16, 2000),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00/03/reaffirm-the-six-assurances-to-taiwan>).
- 26 Randall Schriver, "Randall Schriver on Taiwan: Taiwan needs 'six new assurances'," *Taipei Times* August 22, 2007, 8, (accessed: 2012/6/1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07/08/22/2003375330>).
- 27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4-5.
- 28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estimony of Randall G. Schriver, Founding Partner, Armitage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 CEO,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16, 2011), 3, (accessed: 2012/6/11,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scho61611.pdf>).

- 29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81 and note 221.
- 30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Serial No. 112-42 (June 16, 2011), 11-12.
- 31 Ibid., 13-17.
- 32 Ibid., 18.
- 33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Part 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Serial No. 112-70 (October 4, 2011), 10, 30, 37, 43;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59.
- 34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Part 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43.
- 35 Recited from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39 and note 101.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in noted 101 by Shirley Kan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fifth assurance noted in Chien Fu's memoirs is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support the PRC'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However, comparing statement "no change in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shown in the testimony given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hn H. Holdridge at a hearing on August 18, 1982, titled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 House and the "ROC Statement o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it is more likely an extending elaboration.
- 36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 37 Feldman,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2.
- 38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 39 Feldman, "Taiwan, Arms Sales and the Reagan Assurances."
- 40 Please note that there are still few differences in the version of the Six Assurances publicized by the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website and other Holdridge's versions. Please see Taiwan Document Project,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assurances.htm>.
- 41 Please see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The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http://www.fapa.org/generalinfo/sixassurances.htm>.
- 42 Kerry Dumbaugh, "Taiwan: Text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 - China Communiqué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96-246, July 13, 1998).
- 43 Ms. June Teufel Dreyer: Prepared statement submitted for the hearing i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16 and note 2. Please see the original text introduc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ttp://www.hcfa.house.gov/112/ROSLIH\\_065\\_xml.pdf](http://www.hcfa.house.gov/112/ROSLIH_065_xml.pdf); also see "H.R. 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112th Congres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ptember 14, 2011).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hr2918/text>); also please see Bill Text, 112th Congress (2011-2012), H.R.2918.IH, H.R.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Introduced in House - IH), The Thomas system of the website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12:1:./temp/~c112vtPQub:e14240>:
- 44 on Foreign Affairs, [http://www.hcfa.house.gov/112/ROSLIH\\_065\\_xml.pdf](http://www.hcfa.house.gov/112/ROSLIH_065_xml.pdf); also see "H.R. 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112th Congres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ptember 14, 2011). (accessed: 2012/06/11,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hr2918/text>); also please see Bill Text, 112th Congress (2011-2012), H.R.2918.IH, H.R.2918, Taiwan Policy Act of 2011 (Introduced in House - IH), The Thomas system of the website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12:1:./temp/~c112vtPQub:e14240>:
- 45 Notifying PRC officials about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is already a practice that confirmed by Secretary Panetta on October 23, 2011. Members of US Congress also subsequently agreed that the notification itself does not explicitly violate the Six Assurances but it should not develop into any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ee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60.
- 46 Hearing on China-Taiwan: United States Policy, "Prepared Statement of John H. Holdridg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 47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ext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HAPTER 48-TAIWAN RELATIONS, TITLE 22-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United States Code, 2011 edition (2011), 1100-01, (accessed: 2012/06/12. <http://www.gpo.gov/fdsys/pkg/USCODE-2011-title22/pdf/USCODE-2011-title22-chap48.pdf>).
- 48 Presidential Documents 42963-42964, "Maintaining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 13014 (Monday, August 19, 1996), (accessed: 2012/6/12, <http://www.gpo.gov/fdsys/pkg/FR-1996-08-19/pdf/96-13014.pdf>).
- 49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mending laws, Taiwan Relations Act,,"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Popular Name Table, 2011 edition, 2011), 1213.
- 50 For the record of formal cross-strait exchange and negotiations, please see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Chronology of Meeting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2&CtUnit=2567&BaseDSD=21&mp=300>. More complete record is available on the Chinese edition website of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06&CtUnit=2541&BaseDSD=21&mp=19>. For the cross-strait agreements already established, please see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Negotiated Agreements,"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4384&CtUnit=2569&BaseDSD=7&mp=300>. Again, more complete record is available on the Chinese edition website of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10&CtUnit=2083&BaseDSD=7&mp=19>.
- 51 Please see the website of The View from Taiwan, "Nelson Report: More on Aarms Freeze," <http://www.michaelturton.com/blog/page/2/>; Kerry Dumbaugh,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877, July 23, 2008), 1, 15; Kan,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48.
- 52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Next 25 Years," April 21, 2004, recited from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op. cit., p.29 and note 151



## 更正啟事

本刊於上期32卷2期因人員校對疏失將「Re-examining the U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一文中第二作者陳玉珍教授及註釋碼漏登，在此本刊致十二萬分歉意。今取得二位作者諒解，於32卷3期再補登此篇文章以示本刊負責之誠意。

另本文上期稿費已支，此次不再另支。

# 海軍軍官

## 讀者意見調查

A. 本期刊物哪些文章或題材合乎您的興趣且內容令您滿意？

---

B. 您希望本刊後續選擇以哪些題材為主題？

---

C. 您覺得本刊全新改版之之整體編輯設計、編排方式是否令您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意見：\_\_\_\_\_

D. 本刊吸引您閱讀的原因是（可複選）

☐可增進新知 ☐可供資料蒐整 ☐與本身職務相關 ☐文章內容引人入勝

其他原因：\_\_\_\_\_

基本資料（本欄僅為統計之參考，請放心填寫）

姓名\_\_\_\_\_職業\_\_\_\_\_職務\_\_\_\_\_電話\_\_\_\_\_

海軍軍官 季刊 第32卷第3期 中華民國102年08月 Quarterly No.3, Vol.32 2013.08

### 徵稿簡則

- 一、本刊為海軍綜合性刊物，提供本校教官（師）、學生及本軍學術研究及寫作園地，藉以促進研究風氣，培養術德兼備及具發展潛力之海軍軍官，達成本校教育使命，其宗旨如下：
  - （一）研究海軍學校教育、管理科學與人文科學，啟發人文思想與建軍理念。
  - （二）研究海軍科學、作戰、戰術與戰具等，提升國防科技，切合海軍「建軍備戰」、「教育訓練」之目標。
  - （三）介紹科學新知、海軍知識、生活資訊及一般報導等。
  - （四）砥礪學生品德與忠貞節操，培養並推廣本軍寫作與研究之風氣。
- 二、來稿以創作為主，且優先選登，或譯作以不超過每期篇幅50%為限，來稿內容應慎防涉及軍事機密，並恪遵保密規定；請勿一稿兩投或抄襲。
- 三、來稿以五千字至八千字為度，如原文過長，得由本社考量分期刊出。
- 四、來稿請以稿紙橫寫或A4紙張直式橫書印製，字跡務請繕寫清楚或附電子檔案，如附圖片請以清晰為要，電子圖檔解析度300dpi以上以利印刷，稿末請加註姓名、身分證號、學歷、經歷、現職、聯絡電話及地址；譯作請另附原文影本。
- 五、本刊對文稿有刪改權，投稿一律不退還，稿酬從優，每千字870元，圖片一幀230元，一經採用，未經本社同意，不得翻印、抄襲或挪作其他運用。
- 六、來稿請寄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海軍軍官季刊」收，或逕送本社。
- 七、凡學術型稿件請依以下「註釋體例」纂稿：
  - （一）所有引註均需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其他論文、著作，須另行註明，不得逕自錄引。
  - （二）專著須依次列出作者、（譯者）、書名、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格式如下：  
中、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專書：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X or PP.X-X
  - （三）論文、雜誌、期刊等須依次列出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出版書局、出版年份、（版次）、頁碼。（期刊出版地、出版者可省略）格式如下：  
中、日文論文：作者，〈篇名〉，編輯者，《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西文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redacto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X or PP.X-X。
  - （四）第一次引註須註明完整之資料來源，第二次以後得採一般學術論文之省略方式，為全文使用方式應相同。

郵票黏貼處

813

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

海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季刊編輯）收

海軍軍史館徵集

海軍早期文物

文件、照片、器物、圖冊、旗幟、衣物等

歡迎捐贈，請洽本刊

海軍官校

校區開放

實施對象：本校學生及官、士、兵、師、聘雇之親友

成功門開放時間：每週六、日08：00-21：00

歡迎洽詢